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子樟 先生

從猶太少女形象敘述探尋新逃離動線

研究生：蕭韶儀 撰

中華民國 96 年 8 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蕭 韶 儀 君

所提之論文 從猶太少女形象中探尋新逃離
動線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論文口試委員會：

杜明明

(口試委員會主席)

許建崑

張子輝

(指導教授)

論文口試日期：96 年 8 月 20 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一式二份經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教務處註冊組存查。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_____組 96 學年度第___/___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 從猶太少女形象敘述探尋新逃離動線

指導教授： 張子樟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蕭韶儀

簽名： 蕭韶儀

中華民國 96 年 08 月 24 日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 系(所)
組 96 學年度第 一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從猶太少女形象敘述探索新逃離動線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下列單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	☐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張子梅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鄭郁儀 (親筆正楷)

學 號：1593006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6 年 8 月 23 日

1. 本授權書 (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 請以黑筆填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授權國立科學技術資料中心者，請個別再寄論文一本至台北市(106-36)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702 室。
3.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C'est La Vie 這就是生活

逃，或許正是我心底的吶喊，而這股被壓抑的心念，竟意外的被熟識已久的阿樟老師發現！在我茫然尋不著方向時，老師每每以俠客之姿伸手拉我一把！當然，我始終不曉得我要逃向何方，只是當我在老師丟書、拋話給我時，於字裡行間找到些許出口，讓鬱悶的心情有了轉嫁的場域，同時，更成為我心中最大的支柱！無論說上幾百次「謝謝張老師！」或許都顯不足。我永遠會記得是誰在我遇及關卡、頹喪地選擇放棄時，打上一通電話、說上兩句話、聽我唉唉叫的發牢騷，然後，給我最大的信心和勇氣重新面對生命！阿樟老師！謝謝您！在心裡一直說著感謝！還有，謝謝師母，師母那「舒服就很迷人」的氣質也讓我好喜歡呢！哈！不管啦！我還要繼續去吵吵老師！

東部的土地真的很黏人！從花蓮到台東，我遇見生命中最多的美好，感謝大家讓半大不小的我以「班上年紀最小」的資格持續耍賴中。謝謝嫚姐一直在我身邊陪著（Hey！我們就是愛演）；Amigo 姐姐的疼惜與支持的力量（最愛姐的笑聲）；詩玉在地海中展現的光明引領我渡過黑暗；雅雅姐永遠有大海般的包容；棋子老哥後現代的精采生命力；琇姐那最有力量的擁抱與魅力；玉蓉姐姐不間斷的問候與關心；式寧山海般的熱情與活力；佩珊珊一如往昔的純真與關懷；方儀的紫微解惑與迷人丰采；姿婷認真地打造超有個性的生活；怡吟的聰慧與親切；秋和老大的穩當踏實；廷理跳躍式的可愛思考；明瑤的吉普賽情調；晴雯媽咪的理性與感性；梅媽咪的爽朗與質樸；燕招送我大頭儀的可愛綽號；東方維納斯的麗秋；優雅風的素梅；始終有驚人之語的瑩君；好久不見的怡慈與欣姿……。

最愛聽彥芬媽咪叫我小孩；和育汝一起瘋生活；丹丹的不斷線關心，對了，還有給我很多養分的老師們：阿修老師的電影世界給了我生命新視角；建崑老師拼命性格讓我積極的想跟隨；郭老師的巧手喚化了細膩；杜老師的研究室給我K書的氛圍；阿寶老師的悠遊人生……，慘了啦～好像講不完！這是從清晨森林公園的鐵馬騎向大海的月光溜冰場所紀錄的滿滿回憶，台東小鎮有我很不捨的依戀，而今年的蟬鳴又特別大聲，聽來分外有感覺，因為，我將揮手暫別，走回原鄉的路子，謝謝最疼我的家人，老爸老媽的愛，阿弟阿妹的情，阿公阿媽最老的關心，遠在美國的麻吉幸儒，一籬筐的大小朋友們……。在我聽見掌聲時，我知道也是你們給我的禮物。當然，謝謝自己！謝謝生命給我的機會！說好了，我們要一直High下去，來吧！唱首夏夜，跳支綠光！YA！

從猶太少女形象敘述探尋新逃離動線

摘要

二十世紀，是一個快速更迭的年代，歷史上留下許多邊緣與中心對抗的傷痕，故藉由重新檢視的方式尋找修補的可能。納粹時期，希特勒為非亞利安族群的猶太人，帶來了大屠殺的浩劫，在求取存活機會的當下，逃離納粹與戰爭的陰霾為其首要信念，空間上的移動與隱匿的居所為舊有的脫逃路線與方式。然而，當戰後的檢視再起，對於族群、性別及當時所留存的意識形態有了新的討論空間。

歷史的紀錄觀點中，多以男性作為出發，女性角色的呈現及發聲向來易為人們所忽視，是故欲探究在文化霸權漸之成形的意識形態及特有的歷史元素底層下，居處雙重邊緣的女性，如何為自己找到生命的方向及出口，並形塑個人的主體意識。

在此，將藉由以大屠殺為背景的青少年作品開啟這段成長與啟蒙的旅程，並從文本中對於猶太少女的形象敘述來探尋邊緣個體的求生方式、生命的成長與認同、意識形態的除卻、及書寫反制的可能，進一步形構出有別於舊有空間移轉的逃離方式，透過書寫的言論抗衡帶來新的逃離動線，讓居處相近狀況的人們，亦能有更為寬廣的視角面對生命。

關鍵詞：猶太少女、意識形態、逃離、認同、少年小說

Exploring the New Escaping Way from the Silhouette of Jewish Girls

abstract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era full of many rapid changes. There were many scars established by the conflicts between interiors and superiors. Surveying these scars is an affirmative way to heal these scars.

The Jewish people were confronted to the havoc of Holocaust. Struggling to survive and escaping from the haze of the Nazi and the war was their priority. The spacial mobility and the obscure shelters were the old escaping courses and ways. However, after the reflection on the Holocaust, people have a new view about the races, the sexes, and the ideology that pervaded in the Nazi period.

Most history records are based on what the male thought of or concluded by the male, and the presentation and the voice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are frequently ignored. Therefore,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tudy how women – especially the ones suffering both racist and sexist discrimination – never gives up to explore and develop their lives and personality, while struggling to survive in an era full of cultural ideologies and dynamic historical changes.

Through examining the young adult novels with Holocaust as the setting,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s on the Jewish female characters, the researcher probes into the surviving ways of the marginal ones, the growth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life, the efforts to eliminate ideolog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ounteraction from writing, trying to construct a different escaping way instead of a traditional spacial escaping one. Hopefully, this new eacaping way from the counteraction of the writing can inspire people to face their lives with more courage and broader views while facing threats or challenges as devastating as what the characteres in these works have been through.

Keywords: Jewish girls, ideology, escape, identification, young adult novels

目 錄

第一章 1933 序曲	01
第一節 凝結的空氣	01
第二節 展開行動	09
第二章 只剩黑色天空的日子	18
第一節 逃亡的開始	18
第二節 協助與落難	26
第三節 出賣與背叛	34
第三章 剪去不同顏色的頭髮	42
第一節 為什麼是我	42
第二節 是她	51
第三節 逃離與認同	59
第四章 在陰鬱的天空之後	68
第一節 國家機器的瓦解	68
第二節 集中密室的開啟	75
第三節 黃色星星的摘除	84
第五章 1945 尾聲	90
第一節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傷痕	90
第二節 結論	99
參考書目	104

第一章 1933 序曲

第一節 凝結的空氣

一、書頁中的探尋

何謂歷史？歷史，是一連串事件的組合，而組合的要素中，「人」是首要關鍵，「時代背景」則形塑了歷史的發展，無時無刻我們不感受到歷史正在記錄，前一分、前一秒在下一刻開始前，已經成為過往，藉由時間的推演已然成形，回不去也改不了。面對流動如此快速的氛圍，是這個時代所賦予的特質，然而，轉嫁到另一種時空中，曾經，有一種瀰漫的空氣是凝結的，是停滯的，那股令人窒悶的氣息正透過書頁漫來……。

二十世紀，是一個快速更迭的年代，世紀初，國家、民族在戰火中你來我往，蕞爾小島上的我們亦經歷了這個階段，也留下許多觀看生命的角度，究竟，「生命」該如何詮釋其本質？抑或如何被對待？「回溯」是一種方式，然而，在這樣的過程底下，實際上是一種「再經歷」，好的、良善的一面是值得低迴品味；惡的、殘酷的則夾雜許多複雜的情緒，畢竟，人總是難以輕易再將瘡疤掀開來審視一番，也許是不願回憶，甚或不夠準確。

以我們現存的時空而言，戰後多年的此刻，人們開始對過往重新檢視，許多曾經壓抑的聲音已然浮現，如同從禁錮的空間釋出，希望許多回憶不再只是回憶，而能從邊緣的形象中找回正視的目光。其中，描述戰爭背景的作品，是居處在和平時代的我們所無法理解的，因為戰亂時所留下的遺跡、歷史或記錄，就像一個個極具感官刺激的鏡頭或畫面，但是，這不應該像是在電影院裡接收刺激，然後走出之後就全然遺忘。戰爭，是人與人之間的爭奪，同時，戰爭背後其實還留下許多意識認同的爭戰，我們無從得知戰爭是否會再回來，但是，「意

識」卻總是在人與人的互動圈中繼續上演著，甚至擴大到族群、國家。在現今的這個世代裡，人們遊走在邊緣與中心，筆者好奇的想知道，當同屬邊緣的生命體面臨時空中的難題，究竟可以如何面對，或是為自己找到出口，於是筆者試著從閱讀中尋找答案。

Peter Gay 在《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中提到：讀小說時就像擺盪在大與小之間，然後探索其交互作用的道理。這像一面反應現實世界的鏡子，是沿著公路移動的一面鏡子，有時甚或是一面扭曲的鏡子。¹在作品中創造現實如同馬賽克拼貼，偶有闕漏的區塊，也有破損的一角，但亦不難發現貼近真實面的部分。為此，當人們開始回過頭去面對那曾是真實歷史的一環時，文學作品略帶距離的審視較之於史學家的考據，或許有近似中和味蓄的同等功效。過去的事件不代表真的過去，仍有不少伏流流竄在現存的空間，於是，我們將這面檢視的鏡子移向他處，透過另一個場域的呈現，試圖以客觀的方式探究後再行反思，並對個體現存的空間尋找生命的出口。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大屠殺為背景的作品正接連出版，人們可從中檢視國族、家園甚或個體自身的認同，繼而可窺探對比於此的國家機器及其意識形態。時至今日，空間場域已然不同，但是，不難覺察這股漫燒的煙硝味在以色列與巴基斯坦間仍嗅聞得到，無疑的，是潛伏於底層的「意識」，讓身處其中的人們隨時有喪失判決的能力。此刻，當記憶開始回溯，藉由重返當時的時空背景，在反思的力量中尋找對此一歷史事件的新視角。

以筆者的閱讀經驗而言，相較於成人作品，青少年作品具有成長與啟蒙的特點，而戰爭頻仍所帶來的動盪，往往在生命本質上的成長提供了更為直接的選擇，因為，為了生存，為了活下去的簡單意志，是為一種本能上「活著」的基本反應，於焉，生命被迫激盪出更廣大而深沉的能量。近來，以戰爭題材及

¹ 彼得·蓋伊(Peter Gay)著，劉森堯譯，《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Savage reprisals: Bleak House, Madame Bovary, Buddenbrooks*) (新店市：立緒文化，2004)，頁 15。

大屠殺為背景的少年小說陸續出版，如艾登·錢伯斯(Aidan Chambers)《來自無人地帶的明信片》(*Postcards from No Man's Land*)，這是二次大戰期間的荷蘭，透過少年賈克的尋根之旅，交錯在過去與現在的時間軸上，在戰爭的時空底層裡，思考著生與死的議題、個體與群眾意識的抗衡。繼之，因惹·卡爾特斯(Imre Kertesz)的《非關命運》(*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帶來集中營的記實生活，任何看來迥異的情況都會在集中營裡上演，食物永遠不夠、自由永遠被剝奪、在生命氣息衰落的同時，起碼要留存活著的信念。而以《送信到哥本哈根》(*I am David*)躍上大螢幕的作品是改編自安娜·洪(Anne Holm)的原著小說——《我是大衛》(*David*)，非猶太人的他意外地脫逃出幼年生活中即已相當熟悉的集中營，在他展開逃亡的路程時，亦是個人生命的追尋之旅，末了，與母親的相逢是為內心深沉的歸家渴望。烏里·奧勒夫(Uri Orlev)的作品《快跑！男孩》(*Run ,Boy, Run*)，描述的是猶太男孩蘇利克為了自由與食物，不想待在猶太隔離區等待死神的到來，於是主動抗衡、設法逃離，藉著變異姓名與信仰的方式，以換取存活的机会，同時呈現出掙脫意識枷鎖的可能。而他的另一部作品《鳥街上的孤島》(*The Island on Bird Street*)，我們看見鳥街七十八號是一棟被棄置廢墟，也是艾力克的孤島，他以魯賓遜之姿憑著勇氣與智慧開始這段孤獨的生活，在破敗的此地等待父親來接他的約定。而艾力克—埃馬紐埃爾·史密特(Eric-Emmanuel Schmitt)的《被收藏的孩子》(*L'enfant de noe*)，寫的是七歲的猶太男孩喬瑟夫被彭斯神父收留時，總是期待著每個星期天的「拍賣會」，希望有個能收容他的溫暖之家，然而，他卻意外發現了神父「收藏的秘密」，發現他亦是「猶太文化」中的收藏品之一，對此，也讓他重新看重自己的生命價值與感受人們所給予的愛。

另外，有別於上述作品，以猶太女孩或少女的形象敘述為創作的文本，舉凡路易絲·羅麗(Lois Lowry)的《數星星》(*Number The Stars*)、尤漢娜·雷斯(Johanna Reiss)《樓上的房間》(*The Upstairs Room*)、凱瑟琳·溫特(Kathryn Winter)

《親愛的卡塔琳娜》(*Katarina : A Novel*)、米爾雅·培斯樂(Mirjam Pressler)的《瑪卡·麥》(*Malka Mai*)和《狗兒沉睡時分》(*Die Zeit der Schlafenden Hunde*)、米夏·狄芳絲卡(Misha Defonseca)的《與狼共存》(*Survivre avec les loups*)等，皆以此一時空背景出發，藉由書寫者本身或人物角色的塑造，形構出「她者」的觀察角度，當然安妮·法蘭克《安妮的日記》(*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更是不能被忘記，此作品於戰後出版時，更形成對該時空背景的特有反擊。

上述作品中處理的議題各有其手法及特色，而當中的主角為孩童乃至少年，同時兼有族群及性別的差異。由於歷史的紀錄觀點裡，多以男性作為出發，女性角色的呈現及發聲向來易為人們所忽視，在文化霸權漸之成形的意識形態底層下，相較於白人的主流社會，當時身為少數族群的猶太人，自有邊緣特性；同時相較於納粹社群以男性為主體發展的對應關係，女性兼有猶太身分者，則形構了邊緣的形象，或許有其可供探究的意義，故本論文將於作品中針對「猶太少女形象敘述」進行討論。

因著納粹迫害，當中的人物有逃離、隱匿，亦或處於協助者的角色，在作品裡，為了進一步確立主角人物的「少女」形象，先藉由生理年齡來做區分，可以看到主角年齡分布上有其落差，如《親愛的卡塔琳娜》中，卡塔琳娜已上小學，年齡約8~12歲；《樓上的房間》的安妮6歲、姐姐西妮16歲；而《與狼共存》的米夏7歲、《瑪卡·麥》中的瑪卡9歲、《數星星》的安妮10歲；《安妮的日記》裡，安妮已14歲。但由於大屠殺背景所帶來的逃難與求生的過程歷時數年，故這段期間內心的成長儼然已大幅超越了生理年齡，可說是一種跨越的成長，成為作品中獨特之處。此外，以文本敘述形式來看，《安妮的日記》為日記的記錄方式，有別於其他作品以小說呈現，將以此為主，並佐以其他角色的人物交叉比對，嘗試從猶太少女的形象敘述做出發，一窺邊緣個體求生的方式，進一步檢視生命的成長與認同，同時，探究對時空環境所隱含的意識形態除卻，構築出書寫反制之可能，讓個體不再被侷限於空間的移動意象，由舊有

的逃離方式——逃離納粹與戰爭的迫害，轉變成逃出族群或性別的繫絆，探尋另一種「新逃離動線」。

二、作者與作品

《安妮的日記》作者安妮·法蘭克，1929年生，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的她，父親奧多原為貿易商，於希特勒當政的1930年代初期遷至荷蘭，在此地渡過短暫而和平的生活。然而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荷蘭被德軍佔領，1942年因為納粹政令的關係，無法順利脫逃境外的安妮一家人，只能留在阿姆斯特丹，於是在父親公司職員及友人的協助下，決定隱藏到面對普林森運河的一所古老辦公室內的一隅，即是「隱密之家」，當時同住的還有范丹一家人及杜塞爾先生。她在這兒渡過13歲到15歲的時光，同時經歷了青春期的生理階段，然而，因著隱密之家所帶來的空間限制，人際互動圈也因而縮小，在這個迷你的小型社會裡，從自我個體意識的形塑出發，進一步拓展到與家人還有范丹先生一家的互動中，我們見到青春期孩子所會面臨的疑慮，例如生命意義的歸向、對異性的好奇、家國意識的認同等，思考的層次有了新的跨越，於是，藉由日記記錄了她對於生命、戰爭、情感等想法，留下成長的過程，戰後出版時，讓許多人對當時生活及時空背景有了新的觀點。

與《安妮的日記》同樣以隱匿空間做為避難居所的作品——《樓上的房間》，是尤漢娜·雷斯根據童年經歷所寫出的傳記式小說，主要呈現的是安妮與姊姊西妮面對納粹迫害時，先在漢寧克家避難，後來轉往農夫約翰家開啓長達約三年的隱匿生活，與約翰一家人的互動亦成為此過程中的記錄。當時的安妮，只是個6歲左右的小女孩，透過她童稚的眼光，見到德國人對猶太人的限制與歧視，母親的病危與父親需將其交由他人託顧的決定，以及後來連一同隱匿的姐姐西妮也想要離開約翰家，開始尋找自己人生的路——到農場幫忙，是故，親人們的離散與

陌生環境的生活，為她帶來的是被迫提前長大。這段期間，隨時得面對德國人的追查，提心吊膽之餘亦無法自由行動，那雙慘白、走起路來歪歪扭扭的腳與陰暗的壁櫥，為留存在記憶中的恐懼抹上一筆灰無色調。

凱瑟琳·溫特的《親愛的卡塔琳娜》，是斯洛伐克境內小村莊的故事。當奧匈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瓦解，帝國的領土分裂為許多小國家，捷克亦是其中之一，當時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讓少數民族成立自己的國家，可以避免將來再一次的世界大戰，於是，1939 年德軍攻佔捷克西部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區時，斯洛伐克趁此宣告獨立，成為受德國控制的傀儡政權。故事中的主角卡塔琳娜的父母親其實是個「缺席」的角色，由蓮娜阿姨及泰歐姨丈取代養育之責，然而，當時為了想取得匈牙利的居留權，於是蓮娜阿姨以「腳傷開刀」的理由將她交由他人託顧，但是卻未依約來接她，為此，託顧者瑪麗西卡受到責難，甚至遭到父親毆打，於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告訴卡塔琳娜必須自己去尋求生路。國境內族群間的爭戰與動盪的政體，其實也反映在宗教信仰的尋求上，以卡塔琳娜而言，對於身分認定的猶太教亦是擺脫不去的陰霾，而先前家中的幫傭——安卡，為她帶來聖徒的故事，天主教的聖徒卡片在這段逃難路途成為她精神上的支柱，後來，新教的卡爾曼諾夫博愛之家是為她另一個避難居所，不難看出宗教信仰的變異在這段過程中意外地提供她獲得庇護的機會，內容對信仰議題做了更深入的討論觀點。

米爾雅·培斯樂為《安妮的日記》的譯者，而《瑪卡·麥》與《狗兒沉睡時分》均是她的創作。延續猶太女孩的視角，在《瑪卡·麥》中，我們見到母親漢娜原為德國籍猶太醫生，但當國籍被迫除卻後，不得不帶著女兒米娜及瑪卡逃亡，途中瑪卡因病，同行的逃難者擔心她的身體狀況會拖累大家，於是說服漢娜將她交託一名猶太人照護，否則如此一來母女均將無法順利脫逃，母親不得已只好接受建議。然而，後來漢娜並未在依約的時間見到瑪卡，因為瑪卡已被離棄，被迫走上自己的求生之路。這段路程中遇見了曾被母親援助過的德國士兵，他將

瑪卡帶回家照顧，而士兵的妻子德蕾莎付出的關懷，讓瑪卡重新感受家的溫暖，也與他們的孩子安德克——一個需要特別照顧的孩子，在餵他吃飯、陪他玩、照顧他的過程裡留下新的生命體驗，後來因為她的猶太特殊身分引來「注意」的目光，不得不重新踏回逃離的生活中，卻也因為當時在森林小屋中的這段美好生活，讓她後來見到人性的冷漠與殘酷時，尚不忘「生的意義」。作品的敘事主線分為兩部分，於瑪卡託顧他人的這個時間點之後，母親及姐姐米娜為一，另一則為瑪卡，交錯敘寫，並從中可互相比對母親與瑪卡因著環境的差異，所帶來不同的心境。

另外，與瑪卡年紀相仿的米夏，同樣經歷了逃離戰爭與納粹迫害的生存動線，這是《與狼共存》的主角，也是米夏·狄芳絲卡的自傳體作品。作品中記錄了猶太女孩身分的她因著父母親付出大筆金錢將她託顧，以求能在戰火中存活，但是卻換來一段自己求生的過程，因為女主人瑪格立特想將其交付納粹，於是她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靠著自己堅強的信念，獨自走過許多國境邊界，而在這段返家的路程，她渴慕見到援助的力量，然而「她母親的上帝」卻隱退缺席，在信仰的支柱動搖後，她又見到人性的殘酷與冷漠，同時，卻也意外地進入狼群，甚至因著狼群的幫助存活下來，為此讓她更覺動物的真誠，人與狼的形象，究竟何者較為可怕……。

有別於從「猶太少女的形象敘述」所書寫的作品，改由德國少女的觀察角度重新面對這段歷史，以她者（他者）的立場做思考，提供不同的思維空間，這是米爾雅·培斯樂的另一部作品《狗兒沉睡時分》。內容描寫德國女學生約翰娜，在參與一項訪談作業時，意外發現她的祖父當年以不法手段獲得時裝店，然而爺爺先前也無預警的自殺身亡，為這段歷史留下迷團。對此，她想從父母及爺爺的兄弟姐妹等親友中探尋當年的歷史，在她追溯過往罪責時，也對時裝店當年的猶太負責人雷文·梅塔一家感到相當自責，而她所採用面對罪責的方式是否能平撫這段歷史，是作品呈現的方式，並將此做為討論的主題。

1994 年紐伯瑞金牌獎的作品《記憶傳授人》(*The Giver*)是本膾炙人口的佳作，而它的作者路易絲·羅麗所著的《數星星²》亦曾於 1990 年獲得此獎，這是她根據友人安妮·波萊堤的親身經歷所改寫。內容描述主角安妮·約翰生一家人協助猶太人身分的鄰居艾琳全家，由丹麥逃往瑞典，因為受到德國政權影響，丹麥境內亦有驅逐猶太人的行動，當時，許多地下反抗人士藉由漁船的暗艙，協助不少猶太人脫逃到中立國瑞典，作品呈現出人們為了救助猶太人所表露的卓絕勇氣。縱然年紀只有十歲的安妮，卻為了幫助朋友，不因環境的變異而棄絕自我的道德意志，與家人們一同捍衛著人性的尊嚴，是為隱藏的正義。

此刻，伴隨這股正義之聲所留下的作品正藉由閱讀的過程，展開發聲的平台與思考的空間，藉由作品的閱讀，為了進一步了解文字間所形塑的場域，對於當時的時空背景認識有其必要性，下一節即是由此部分形構，並試圖從中發覺出可供探尋的思考脈絡，如同漢娜·鄂蘭所說：「我們以現在獻祭，並以此召喚過去，從其間卻升起『思想』的致命撞擊，跟過去的傳統與權威對撞。³」在如同鏡域般的穿梭中，更深入地思考著現在。

² 路易絲·羅麗(Lois Lowry)著，汴橋譯，《數星星》(*Number The Stars*) (台北市：國語日報，1991)。2007 年，新出版譯本為史茵茵所譯，譯名為《細數繁星》，(臺北市：哈佛人，2007)。

³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鄧伯宸譯，《黑暗時代群像》(新店市：立緒，2006)，頁 258。

第二節 展開行動

時空背景的重塑，是對閱讀情境的再造。回溯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14 年那一代的人們受到宗教意識與科學理性的約束，基本上還停留在信仰榮譽與國家的層級，而 1933 年的彼端，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因著戰爭與經濟崩潰的驚嚇，正如安妮·法蘭克在日記裡所寫的：「你無法想像，我們時常陷入絕望，因而產生懷疑：『戰爭究竟有什麼作用？為什麼要破壞人類的和平，破壞平靜的生活？究竟是為了什麼？』⁴」於是，在殘破的家園中，絕望的人們尚在尋找新的生命出口，當美好的承諾出現時，人們服膺於新的意識裡，還來不及思考可能落入的困境，轉而服從於激情甚或價值判斷扭曲的窒息氛圍裡。所以，當 1933 年希特勒正式掌權後，為猶太人帶來的是凝結的空氣，但對德國人民卻充滿了新時代的想像！

極端的年代中，因著軍事失敗及經濟崩潰的基本創傷，幾個世紀以來，由破碎的封建領地組成的德國，再度面臨分崩離析的場面。戰後所遺留的社會混亂各國皆是，因著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經濟結構的轉變與民主途徑的行進，人類的歷史有了新的發展。以德國而言，新的民主動線與舊有君主體制正在進行拔河，此種糾結狀態，形塑其政治動向的基本面，伴隨後起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成為醞釀集權主義的溫床。

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本質上是以主導經濟秩序作出發，在領土擴張時，民族國家意識的滲入，為的是在殖民母國與殖民地間留有相接連的臍帶，歐洲是種族集團多樣的場域，而為了將各族間的優越情感提高，卻也留下種族衝突，間接鼓勵種族主義的出現。達爾文生物學觀點中的「自然選擇、遺傳、為生存鬥爭、適者生存」等術語，被挪用至社會生物學上作解釋。影響德國至深的張

⁴ 安妮·法蘭克 (Anna Frank) 著，張淑懿譯，《安妮的日記》(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台北市：志文，1998)，頁 263。

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⁵，這位意識形態的戰士是亞利安人至上論和德國種族中心論的主要先驅者之一，他與華格納聲稱耶穌是亞利安人，基督文明乃亞利安人所創，再造白種人基督文明更是為亞利安人的職志。此外，在相近的時間水平中，如叔本華、尼采的哲學思維，佛洛伊德與榮格的心理學創見等，均在此般動盪的環境下進行一場思想上的革命，野心家卻也進而斷章取義地援引，雜揉成特有的意識。

回到集權主義出現的背景，除了是對工業快速發展的一種回應，尚隱含了一種特有的 20 世紀式的傳統宗教信仰，也可以說是宗教生活於世俗間的對應物。《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一書中提到：「人們被迫服從規範的生活方式，而沒有選擇和個人自由的可能性，這意味著透過制度化的壓制對自我人格最終的侵犯⁶」。再者，探索的角度，如果從結構性而言，簡單的區隔為上層與下層，在這建築體的上層結構，搭築了葛蘭西的「霸權」或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虛假意識」，國家、政治體甚或意識形態，即採取制高點的視角開始對下層主體意識進行深化，甚至可以感受到集權主義某些時刻已跨越了意識形態的表象界線，也就是說，我們隨時隨地皆可發現意識形態的蹤跡。大眾的支持助長野心家的氣焰，野心家透過言論塑造其對「特定」歷史演進的煙霧彈，人們屈從於其「專門修正」的想法之下，在內外皆動盪的社會環境中「重新安置」思維模式，不啻為一根「新的」救贖性浮木。

這股「重新安置」的思潮，也意味著德國境內即將形成的氛圍，對於非我族裔將進行驅逐行動，當然肩負此項工作的士兵們擁有相對的權利，所以供給食物等基本物資的需求，是為一般民眾的責任，而當食物需要重新安置，也意味國家進入備戰狀態。如同我們在《數星星》中讀到的：

⁵ 此張伯倫非英國首相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故附註其英文名。

⁶ 《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頁 19。

媽媽順著安妮的目光看到牛奶。她說：「『阿花』的牛奶。大舅每天在出海以前都要先擠牠的奶。」

「還有奶油。」

「平時大舅也沒奶油吃，不過他設法藏了一些給我們。」

「幹麼要收藏？」安妮往大花碗裡倒牛奶，「難道說德國兵也要『重新安置』奶油？」她對自己的笑話笑起來。

雖然媽媽也笑起來，但是這不是笑話。媽媽說：「你不要笑，德國人真會重新安置奶油。他們把農人的奶油都重新安置到德國兵的肚子裡去了！假如他們知道大舅這兒私藏了這麼點兒奶油，他們一定會派一隊兵來把奶油押走。⁷」

這是藉由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描述，貼切而具體的呈現出即將引動的風暴。而究竟要「安置」到何處，絕非積極的鼓勵或寬容的勸說，就像「派一隊兵來把奶油押走」的這段文字，人們也將成為物化的貨品送往集中營或滅絕營的倉儲密室。

在德國，自由企業的擴張受制於國有企業下，整體發展中的優勝劣敗，皆脫離不了國家的保護傘，人們被鼓勵為公共利益付出，而不是為個人或自我利益工作，顯示特有國家社會主義原型。透過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引領，歌德和其他德國詩人的德國消逝了，冷酷無情的「現實主義德國」即將出現⁸，至此，軍事力量的成功讓托馬斯·曼小說中的馮·斯塔特將軍成為新偶像，生活本質在「權力」之中的觀點更加鞏固，而「1914年的思想⁹」強調德國為一有機整合的社群，即是將社會各個階層的差異凝結於社會體系中，所以，階級衝突與分配

⁷ 《數星星》，頁 81。

⁸ 《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頁 27。

⁹ 「1914年的思想」一詞乃由蒙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約翰·普蘭格發明的，他匯集了無數著名的知識份子，努力發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時德國文化和墮落的西方唯物主義之間的差異。此由《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頁 28 引注。

公正的社會問題應被修正，同時整合到保守的秩序當中，以維持團結與秩序，這樣的觀點在希特勒後來的言論中以更為激情的言語老調重彈一番。

另外，經濟起飛來自於工人階級的奮鬥，但為了穩定整個社會，在普魯士破碎封建領土上吸納社群間的支持力量，「民眾國家化」是必要的手段，於焉，知識份子所組成的泛德意志同盟支持合併主義政策、宣揚北歐種族的優越性、呼籲東進，急切地渴望救世主式的領袖降臨，甚至「把德國人從猶太人的威脅解救出來」。讓人不禁要問，這種對於種族主義的偏頗觀點究竟是如何被提出，其實，在西方世界中，聖經所影響的層面太廣、太深、也太久遠。幾個世紀以來，猶太人背負著「殺害基督」的原罪，處於相對立場的社群人們各自擁有專屬的意識形態，猶太人被排除在基督教會之外，因為受到了排除，久而久之也認定自己是受到排除的一群，產生拒絕參與所在國家社群的文化生活，當然，這也許不是絕對，僅是一種普遍現象，直到十八世紀，少數的猶太人開始逐漸參與歐洲社會的文化生活。

然而歷史最大的諷刺之一在於「最緊密的關係經常孕育出最大的仇恨，並且，在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不同的關係中，德國人和猶太人的關係最為密切。¹⁰」兩者之間有相近似的特點，以宗教、種族性和語言起源等而言，皆屬跨國的民族，而依靠精神層面的追求取代政治實體的性格，讓德國成了詩人與哲學家的重鎮。另一方面，猶太人抽象思維的發達展現在科學、教育、商業等的成就，若以諾貝爾獎為例，其所佔比例為其他族裔無法企及。然而，政體本身卻決定了更廣的層面，畢竟，政治是一種直覺性的、融合了預見力等判準的雜合物。以德國政治的推演進程來看，「威瑪共和」才是猶太族群所樂於見到的政治型態，但是日漸高漲的集權主義聲浪是急欲將此民主芽根折毀的，面對這樣的時空背景，許多猶太的知識份子以局外人之姿審視這波思潮，這種「局外人」性格也常將自身所歸屬的社群孤立，與其他族群保持一種疏離狀態，因而持久地

¹⁰ 《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頁 33。

維持著某些獨一無二的精神與外形特徵，哪怕嘴裡說著由中世紀高地德語所演變來的意第緒語，但許多極易被識別的外形特徵、音色、心理、行為等，早已內化成一種印記。當時，人們心中被灌輸這樣的想法：「一個人假如在做上帝的工作，就是要抵制猶太人。¹¹」這種與其他西方民族格格不入的藐視與仇恨除了來自種族的差異、生理遺傳的觀點外，有人認為猶太知識份子的優異表現所帶來文化差距亦成為世人攻訐的方向。於是，這個古老的、有注釋經文習慣的靈魂體因著自我所含納的特有猶太性，相較之下極易匯聚種族偏見的觀點。「我們不應該忘記希特勒是怎麼掌權的：就是經濟的不穩定和疲軟的馬克。嗯，對了，還有偏執與種族偏見。但是經濟穩定與貿易強勢是一個健全國家的重要關鍵。¹²」人們的基本溫飽脫離不了經濟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一個失落的社會集團尋找怨憤的出口時，猶太人在商業上令人羨煞的表現，讓這隻合適的代罪羔羊隨即附加其上。此外，希特勒吸取學術界與公共界中被廣泛接受的思想，掌握鬥爭的淘汰定律，援引更多強者做為納粹思想的代言人，他認為以德國為故鄉的雅利安人應該被進一步淨化，而被摒棄的猶太人、吉普賽人、亞洲人或身體有殘疾等等的人們，皆應走向毀滅一途。

岌岌可危的威瑪共和，從右翼到左翼，政黨接連成立，每一個黨派擁有各自的支持者與基本理念，納粹黨的前身「德國工人黨（亦有譯為德國勞工黨）」在啤酒屋間開啓了吸納力量，擔任招募及宣傳角色的希特勒認為有組織的群眾聚會及示威活動才能將黨的力量壯大，並輔以軍事路線開始拓展。在情緒緊張與出乎意料中進行的每一次演講都是一場精采的表演，而表演中最重要的是「認同聽眾的痛苦」。為了吸引更多追隨者，他讓不同集團的人意識到：他們可以信仰同一種意識形態的信條¹³，「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後簡稱為國社黨）」於焉而

¹¹ 《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頁 38。

¹² 艾登·錢伯斯(Aidan Chambers)著，陳佳琳譯，《來自無人地帶的明信片》(*Postcards from No Man's Land*) (台北市：小知堂，2001)，頁 202。

¹³ 《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頁 161。

生。戰火過後所遺留的老戰士們重新在這兒找到舞台，帶有強烈種族主義意識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等，均有可供依附的核心，反社會人物有了新的出口。

政治荒野的時空裡，戰敗後的人們除了對生活的不確定感之外，整個社會離經叛道的事情層出不窮，犯罪的事例一再出現：

柏林處於國內戰爭的狀態。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仇恨突然之間在所有地方爆發了。在街角、在餐館……；在午夜、早餐之後……。

刀鞭、啤酒杯、椅腿、灌鉛的大棒四處飛舞。子彈……將海報牆上的廣告畫射得千瘡百孔。在擁擠的大街，一個年輕人遭到了攻擊，衣服被扒，被痛打一頓，血灑在人行道上。僅僅 15 秒鐘，一切就過去了，襲擊者消失得無影無蹤¹⁴。

這一幕上演在威瑪時期的柏林內戰，黨的發展過程中，犯罪事件被允許，無形中助長了黨員的氣焰，人們吞下包裹著糖衣的縱慾毒藥，喝下希特勒在權力掌控前的伏特加，麻痺了自我意識，同時，成為日後習以為常的一種認知與現象，「是的！希特勒萬歲！」的口號將在大街小巷中高喊。

當時，民主思潮湧入歐洲，各國皆以其自有的方式實行民主制度的推演，為了推翻威瑪共和，希特勒也採取半民主的進程，1932 年，為了在國會中佔有實權，集會、選舉的戲碼接連上演。然而，選票除了有階級上的關係，也受到集團偏見的決定，連負責黨意識宣傳的約瑟夫·戈培爾亦哀嘆：「假如國家社會主義在不久的將來不能獲得權力，他們將在選舉中被拖死¹⁵」。一度低迷陷入「永遠的壞運」時節的納粹卻在保守主義的中堅份子擁抱下起死回生，這是一群圍

¹⁴ 同上註，頁 244。

¹⁵ 《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頁 318。

繞在總統興登堡旁的主要勢力。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正式被任命為總理，「合法」的獲得了權力，國會大廈燃起的那把大火宛如「天堂來的信號¹⁶」，也是德國人在納粹時代首度表現出可怕的集體軟弱性格¹⁷，那把火燒去了憲法所保障的個人自由及公民尊嚴，絕大多數的德國人相信這是共產黨的行動，而政府有權採取強有力的干預手段，於是「臨時修憲案」的提出即是國會與民主的徹底消融，「授權法案」進一步鞏固了納粹所擁有的權力，權力核心掌握在希特勒手上。

終極權力的形成，讓希特勒擁有掌握人們生死的權柄，形塑出一種近似宗教形式的變異形貌，聖經上說：「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針孔還難。」，但希特勒相信駱駝穿針孔比普選發現偉大的人物來的容易，而他願意如同偉大的神為大家帶來新世紀的禮物。「那年三月總共帶來四樣東西，最後製造出堅不可摧的納粹政權。它們分別是：恐怖措施、慶典和慷慨激昂的宣言、變節行為、集體崩潰。¹⁸」「波茲坦之日」的慶祝活動象徵第三帝國的來臨，舊德國與新德國和解，普魯士精神與國家社會主義融合，興登堡與希特勒這對老元帥與新下士正在開創「和平」的新進程，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引領人們歡呼萬歲。但是，在這表象世界存在的真實意志背後，納粹政權正對於異議份子採取保護性居留或政治勢力肅清等行動，成為此一元首國家建立時的正當防衛，許多沒來由的犯罪事件被允許為合理，如同對叛離納粹的內邦人所做出的行動，甚或日後對如猶太一類的「局外人」所加諸的一切。實際上，群眾畏懼的反應從「三月陣亡者」的集體湧入參與國社黨可以窺見，人們紛紛尋求保護傘的庇蔭，亦成為一個個被烙上印記的無意識麵糰。

圖書館也展開焚書行動，舉凡「非德意志精神之十二項議題」的作品均列

¹⁶ 同上註，頁 345。

¹⁷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1914-1933 回憶錄》（*Geschichte eins: die Erinnerungen 1914-1933*）（新店市：左岸，2005），頁 154。

¹⁸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1914-1933 回憶錄》，頁 158。

爲「被除名者」，比方安妮·法蘭克的父親奧多·法蘭克最喜歡的詩人海爾·瑞許海涅（Heinrich Heine）的詩作〈女妖蘿蕾萊〉（*Lorelei*）每個小學生都熟記於胸，但在未來的教科書上，這位巨匠將以「不詳詩人」的面目示人。海涅在百年前即寫過一句話：「無論他們在何處焚書，他們最終亦將焚燬人類。」¹⁹

當我們進一步觀察時，這對應於宗教的世俗化展現，在許多方面皆有跡可循。集會，是納粹運動最好的組織形式之一，它能形成共同的意志及對領袖的崇拜，如同禮拜儀式般進行一種思想上的改造。比方，能帶來幸運並隱含「崇拜」的宗教符號「萬字徽」像是曲折的十字架；納粹黨人的舉手禮、問候及命令語句的使用，宛如教會中聖餐禮的再現；牧師的長袍、主教的冠帽與玫瑰花環轉變爲黨員制服、軍旗、勳章、指揮棒等...。此外，給於象徵物及神話的需要可以壯大並集中人們的信仰服膺，例如：老鷹立於其上的盾牌是飄揚在衝鋒隊行動時的代表旗幟；「醒來吧，德國！」的「愛國」口號則激發出更多的熱情。

在紅色中，我們看到了這一運動的社會理想；在白色中，我們看到了民族的思想；在萬字徽中，我們看到了為雅利安人勝利奮鬥的使命，同時，也看到了創造性工作的思想的勝利，這一工作在本質上是而且一直是反對猶太人的。²⁰

此刻，猶太人的宗教性爲其種族性所取代，1933年4月1日，納粹在「德國人！保衛自己！勿向猶太人購物！」的口號下，於全國各地展開抵制猶太人商店、醫師及律師的行動。雖然有些人不顧此威脅恫嚇仍逕自照著原意生活，但卻被強迫在臉上蓋上「叛徒」的戳記，遭到世界輿論撻闕，後來雖一度「暫停」行動，但這股伏流依舊流竄。1935年《紐倫堡法案》（*Nürnberger Gesetz*）

¹⁹ Melissa Muller 著，張茂芸譯，《安妮的故事：納粹鐵蹄下的純真靈魂》（*Anne Frank :the Biography*）（台北市：遠流，2000），頁 48。

²⁰ 《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頁 166。

的宣布後，帶來追溯既往的民族大清算達到排猶高潮，同時再度扼殺猶太人融入德國社會的生機，至此，即將引領出一場新的風暴。

「國家機器」隆隆聲響地不停運轉。在政治話語中，沒有灰色的地帶，只有肯定或否定、愛或恨、對或錯、真理或謊言²¹。無怪乎真正恐怖的事情是，用這種簡單得可怕的方式即可創造歷史。雖然時至今日，的的確確，我們的生活中也不停的環繞充斥這屬於「意識形態窠臼」的一切，小自學校，大到社群運動等，無所不包，揮不去也擺脫不掉，當然，對於當時的人們亦如是，所以，這一趟新的檢視過程，對我們而言反而更稱得上是更有歷史意義的。接著，我們將從凝結的空氣走入只剩黑色天空的日子，試圖找出新的逃離動線，以揮別陰鬱的天空。



²¹ 同上註，頁 226。

第二章 只剩黑色天空的日子

第一節 逃亡的開始

一、 逃亡的原因

收音機裡說出事了，一個猶太男孩殺了一個德國人。這真糟糕！但是讓人們在夜裡跑上德國的街道，對猶太人做出那些慘忍的事情，也很不好。那個晚上被人叫做：「碎玻璃之夜」。

「爸爸，碎玻璃之夜，是什麼意思呢？」

「噓！安妮，我在聽呢！」

在那些日子裡，爸爸對我說的話就是那些了。我不喜歡這樣！他以前對我說的話可多著呢！如果他不回答我的問題，我怎麼能了解事情呢？²²

這是從《樓上的房間》傳來的聲音，安妮與父親正守著收音機聽取關於德國與猶太人之間的新聞，因著一個猶太男孩的行動，成為導火線的引爆點。隨著《紐倫堡法案》的公佈，那是歷史上首次以當事人上一代的猶太教信仰來認定是否為猶太人的法案，據此，納粹進行一場追溯既往的民族大清算，其實是全然扼殺了試圖融入德國社會之猶太人的生機²³，於是，1938年11月9日的夜晚，德國各地的猶太教堂遭人縱火、猶太商店被破壞、猶太人的住家被入侵……，碎落滿地的玻璃映照出水晶般的光芒，是的，是那帝國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亦譯作「碎玻璃之夜」），此後，德國的排猶措施轉為全面性、系統化，其手段更為粗暴慘忍。然而，我們可以先對「帝國水晶之夜」事件的發生原由是否被平衡報導做檢視，如同先前的引文，或許安妮的疑惑尚未釐清，就像父親一樣只能做單向的

²² 尤漢娜·雷斯（Johanna Reiss）著，莫莉譯，《樓上的房間》（*The Upstairs Room*）（台北市：智茂，1995），頁22-3。

²³ 彭滂沱著，《天擇：猶太人的故事》（台北市：商務，2001），頁82。

訊息接收，於是，政府當局的一舉一動成為人們對於生存路線安排的關鍵，每一步都引領著向那夜空走去，因為，碎玻璃光芒的背後的黑色夜空，即是猶太人將要面臨的新生活，恰如《安妮的日記》所提及的：

1940 年 5 月以後，好日子迅速地消逝，首先是戰爭，其次是荷蘭投降，緊接著德軍的到來，也就是我們猶太人艱苦的日子開始了！反猶太人的法令接二連三的公布：猶太人必須在衣服上綉一個黃星星，猶太人必須交出他們的腳踏車，也不能坐電車和開汽車，只能在下午三點到五點在指定的猶太商店買東西，八點左右便不能在外面逗留，八點後甚至也不能坐在自己的花園中乘涼，猶太人不准去電影院、歌劇院及任何娛樂場所，也不准參加公開的運動活動，游泳池、網球場、曲棍球場和其他運動場都不准進入，猶太人也不准和基督徒來往，猶太人只能到猶太學校唸書等等，還有其他許多嚴格限制猶太人的法令。²⁴

此刻，舉凡所有與猶太人相關的事務皆歸猶太人，猶太醫生醫治猶太人、猶太人不得雇用基督徒為傭人等，但即便如此，害怕，有時是種模糊的感受，其實很容易被自我說服或是壓抑，人們莫不嘗試給予自己的想法一種新的解讀，「那不會是我，起碼我是個德國公民」、「服膺政令，至少情況不會太壞」，恰如《瑪卡·麥》中，瑪卡的母親漢娜曾經試圖扭轉自己的身分，藉著上大學、當醫生，她以為有了新的身分，就會讓德國人用完全相反的態度對待，然而，這一切卻成為一種喟嘆：「喔！爸爸！漢娜現在想著，我真的無法想像，我要的那麼多，要達成的那麼多，只為了成就某個心願，而達成後卻又必須重新回到原點，只因為我是猶太人、猶太女兒的母親。²⁵」。

²⁴ 《安妮的日記》，頁 8。

²⁵ 米爾雅·培斯樂（Mirjam Pressler）著，陳慧芬譯，《瑪卡·麥》（*Malka Mai*）（台北市：玉山社，

然而，當時的政令還宣揚了純淨的意識，即是「別讓外人的血玷汙了德國的血！」爲了達到種族純淨的境界，所以法規中定義了所謂的「雜」的團體：非猶太人的白種人(Aryan)、猶太人、有四分之三猶太血統的人、或與猶太人結成親家的人，總之，這些就不是「純種的德國人」，縱使原先的地位或國籍爲何，這些保護傘將一一除卻，法律甚至是准許迫害猶太人的！如此一來，光明正大的成爲一種「全民運動」，於是當生存的空間被壓縮、當自由空氣愈見稀薄，或許都還能存活，但是希特勒意識下所欲推展的成果不僅僅如此，他要的是種族「純淨」的境界，在那被孤立的生活下一步即可能演變成殺戮。螻蛄般的生命四散而去所引動的不只是一方的勝利，因爲那如同追捕的動物本能，在血脈賁張的時刻有著瘋狂的驅策性：

德軍拿著名冊逮捕人，也經常搜索房子滿載而歸。偶爾也有較敏捷的人能夠帶著錢財逃走的，就像是古代追捕奴隸一樣。這可不是在說笑話，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並且那樣的悲慘。傍晚天黑以後，一群善良無罪之人，連小孩一起被德軍帶走，被德軍毆打，一個拖著一個。不管老人也好、嬰兒也好、孕婦也好，沒有人能夠得到赦免——所有人都向死亡之途前進。

（《安妮的日記》，頁 70）

透過《安妮的日記》這段文字，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當時的時空背景映證了蔡麗〈「文革」敘述中的暴力、情愛與歷史認知〉中所說的：「死亡的殘酷即在於對有充足『能量』的生命的殺戮。」²⁶ 縱然，其所談論的爲中國大陸文革時期所帶來的傷痕，卻也可茲印證了這些尙能呼吸並擁有生命能量的活人，在政令頒布的那一刻，亦面臨宛如喪鐘般的衝擊，無遠弗屆的讓每一個擁有猶太血液流竄的身體

2004)，頁 155。

²⁶ 引自蔡麗，〈「文革」敘述中的暴力、情愛與歷史認知〉。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臺北市：麥田，2005），頁 240。

不寒而慄。而實際上，納粹的行動在政令頒布前，即被較為敏感的人們所感知，《瑪卡·麥》裡，瑪卡的母親漢娜其實已經被告之：「邊境的德國人。他們在孟德爾亞伯拉罕和達維爾施諾爾那裡搜括了所有東西，就連還沒完工的西裝也一併帶走。這只意味著一件事，醫生，他們開始採取行動了。」²⁷」至此，人本能的求生意志將化為行動，面對被遣送、被追捕的行動，下意識的「逃」成為多數人的當下反應，而這些逃離的過程亦在文本中呈現。

二、逃亡的形式與過程

逃亡的形式在作品中是以空間上的移動呈現，這幾本以女孩為主角的作品裡，我們見到受限於面臨的情境、家人或自身為了存活所抉擇的方式，而有了不同的歷程。《數星星》是以一個協助者的角色所呈現的觀點，描述在逃亡的過程裡表露的勇氣，而《瑪卡·麥》、《親愛的卡塔琳娜》、《與狼共存》中的人物主角均因著家人無法自保，選擇由他人託顧的方式，以減緩逃亡的危險，但後來卻因為託顧者的背棄，被迫自行逃離求生，可看出其所移動的區域並不侷限在單一場域空間裡，小從行政體制劃分的地理區塊，大到橫跨多國國界，相較於此，《安妮的日記》即是自行選擇藏匿在隱密空間中，而《樓上的房間》呈現的為受人託顧期間，也以隱密空間做為避難的居所，於下將簡述並分析之。

因著納粹追逐的逃離，《數星星》裡所呈現的是幸運的人們，我們見到主角安妮一家人協助猶太友人艾琳一家順利的逃往瑞典。在《瑪卡·麥》中我們見到，瑪卡的父親早已逕自前去比埃瑞茲－以色列，在母親漢娜的回憶中，我們得知這是夫妻離異的單親家庭，此刻，漢娜帶著女兒們欲逃往鄰國，途中卻因為瑪卡病危，於是交託他人，然而約定的時間到了，卻見不到瑪卡，因為瑪卡早已被離棄，展開自己的逃難旅程。《與狼共存》中，主角米夏先是由父母將她託顧他人，卻因

²⁷ 《瑪卡·麥》，頁 22。

爲人性的變節，而讓她開啓自己的求生之路，過程中對人性產生不信任感的同時，卻意外受到動物的接待與照顧，從狼的身上學習在極端環境下的生存方式，於是，那雙遊走國境邊界與森林之間所扭曲變形的腳帶領她走過死蔭幽谷。在《親愛的卡塔琳娜》裡，卡塔琳娜原先與蓮娜阿姨及泰歐姨丈一起逃離，但爲了取得在匈牙利的居留權，他們讓卡塔琳娜暫時託付他人照顧，同時給了她一個天主教徒的新身分，但是早已過了依約時間卻不見蓮娜阿姨，她在被父母親及親人的遺忘中，藉著宗教信仰的庇護踏上逃的路程。

而「逃」的另一種形式，或許就屬「藏匿」最爲貼切，逃不了，好歹還能殘喘些許時日，對於生命的最低限度就是「活著」。這是《親愛的卡塔琳娜》裡，卡塔與阿姨、姨丈躲在胡賽先生的穀倉的描述：「我們爬到穀倉的角落，儲放水桶的地方；我先將表面漂著蟲屍和草屑的水潑到一旁，然後才舀起乾淨的水來。胡賽先生和他太太，胡賽嘉，只有偶爾想起才會過來換水。²⁸」離開穀倉兩個月後，卡塔仍習慣用很小的聲音說話，「我張開我的嘴巴，想要大吼大叫，可是從喉嚨裡傳出來的，卻微弱得像是被人扼住脖子的嘶啞嗓音。²⁹」，因壓抑而形成的畏縮行爲轉嫁在她的夢境中，她拒絕同伴打球的邀約，甚至要將變得殘缺的雙腿隱藏起來，實際上，她的腳並無任何異狀，這是空間所營造的幽閉恐懼，但起碼生理的需求尚屬無慮。我們看到受到他人的庇護時，夾層、閣樓、穀倉均爲可能的求生空間，於是走向《樓上的房間》後，白天需要拉下窗戶的簾子、離窗戶遠一些，遇到有可疑人物來查訪，就得躲入壁櫥噤聲，既使那雙長期無法曬太陽、走起路來直晃且過於慘白的腳也已變形，「我撲到床上，這才是屬於我的地方，而不是跟別人一樣在樓下。³⁰」雖說「床」有著放鬆而舒展的意象，然而，當其轉換成活動的單一空間時，幽閉而禁錮的特質隨之而來，只因爲渴求呼吸與食物的餵養被滿足了，縱然家人四散，但各自在隱蔽的空間中求生，懷抱著希望等待相聚的時刻。

²⁸ 《親愛的卡塔琳娜》，頁 76。

²⁹ 同上註，頁 83。

³⁰ 《樓上的房間》，頁 326。

夾縫中與隔板間的求生，我們在《安妮的日記》中也讀到了：父親說：「安妮，如你所知，早在一年多以前我們便從家裡把糧食衣服和家具運送給別人，我們不希望我們的東西被德國人沒收，也不希望陷入德國人的魔爪，所以我們要在他們來逮捕以前先隱藏起來。（《安妮的日記》，頁 20）」1942 年 7 月 9 日，安妮搬入隱密之家，開啓連一步都無法跨出外面的生活，因為一被發現就是遭到殺害或是送入集中營，狹小的空間在白天得壓低音量，或者應該說「靜肅」是眾人平日所使用的語言，同時不得靠近窗邊，以防街上能自由活動的人們覺察有異，「無脂肪的特別食物」維持基本需求，但是不論如何：「每當我把我們在『隱密之家』所過的生活與其他得不到隱藏而被逮捕的猶太人相比，就覺得我們這裡是天堂樂園。（《安妮的日記》，頁 99）」縱然狹窄的空間有許多限制，從休息時間、用餐時刻、沐浴方式等需遵循范丹先生的「隱密之家規則傑作」，其中一句「為猶太人的休假而做的特別設施，全年營業。（《安妮的日記》，頁 67）」的註解，為這看似苦悶的生活帶來揶揄的苦笑。

然而，看到這個「休假日（戶外休假日）：無限期延期（《安妮的日記》，頁 68）」時，帶來的卻非歡愉，一年多後，安妮說出了自己的心情：

「這是世間的天堂，或是絕望的深淵。」我覺得歌德這句名言是再恰當也不過了，和其他猶太兒童比較，我能在此處生活真是幸運無比，如果這樣想，我會覺得此處是「人間天堂」。但是，今天柯普海斯太太來串門子，談到她女兒柯麗的壘球俱樂部、泛舟旅行、戲劇表演和交友等種種情形，我又墜入了「絕望的深淵」。（《安妮的日記》，頁 148）

在兩相比較的生活環境中，也牽引出內心的感受，自由自在、開心玩樂的生活在一夕之間荒腔走板了起來，花樣年華的少女所擁有的青春氣息，似乎也變得沒有活力，同時，這空間裡總存有一層隱憂：

「連一步都無法跨出外面的生活是如何的苦悶，我也無法像你說明，一想到會不會被發現而殺掉，我就好擔心，這種感覺很不舒服，白天我們都盡量壓低聲音說話，不敢發出聲音，走路也是靜悄悄的，不然會被樓下倉庫的人聽到而發生危險。（《安妮的日記》，頁 31）」

因為這是活著的機會，動輒得咎，但是對於想跨出狹小空間的渴望，卻都是隱藏不住的，於是，無法如同《樓上的房間》那居住在鄉下的西妮和安妮，讓約翰用蓋著粗糙毯子的獨輪車推送到麥田裡去曬太陽，所以俗話說的好：「紙比人有耐心」³¹，留在日記本上的文字書寫成了安妮·法蘭克逃向另一個空間的過門。

三、 逃亡的另一種解讀

歷史上猶太人曾有過的「逃」，無疑的是以摩西出埃及為先，對於猶太人的「逃」，不全然只是形式上的呈現，究竟該逃向何處，或許是更需要被界定的，若以「猶太人的生活區塊」做認定，回到神所應許之地，可以是存乎現實世界的耶路撒冷，亦可以是離世後的天堂。既之，事先逃走，無疑的，我們必須回溯當時的時空，移民，基本條件要有一筆足夠的資金，移民配額，也絕非無限擴充，而在意識上，「外國」對不少本質仍為農業社會的人們而言，更是遙遠而形象模糊的地方，「這是我的村子，我的家鄉，我的國家，我在這裡出生，我的祖先葬在這裡……」何況，人們天性上與內在的安逸，對於內心所認定事實卻有所變動，其實難以扭轉，所以在「空間」的移動上，有了一些基本的限制。

當時，服膺納粹思想的不只有德國人，因著戰爭的利害關係，相近的國家亦加入驅逐外來族群的行動中，以時空背景而言，從先前的戰亂所帶來的生活尚未

³¹ 《安妮的日記》，頁 7

回復原有的形貌，相較之下，經濟狀況較為富裕的猶太人無疑為社會帶來另一種目光，深怕猶太人會因著經濟而影響政治體本身，於是，縱使在概念上，猶太人的確離開了德國，但是，這一切的驅離並未告一段落，畢竟「意識」是臨駕在地理界線之上，但《安妮的日記》提醒了我們：「1945 年 1 月後，由於奧修維茲已能夠聽到俄國的礮擊聲，1 月 17 日，一萬一千個囚犯又奉令遷往德國，只有病人留下來³²。」這遷往德國的行動，即是「向東方移動」，移動至滅絕營中，終結生命。所以，在納粹意識的驅離與追趕後，未了，或許還是要以「滅絕」做為這完美的句點。

面臨身處的空間及其所營生的氛圍，如：對猶太人生活空間的侷限、淨化德國的種族意識、大規模的死亡逮捕行動等，我們不禁要問「如果空間是固態的，那黑暗的形狀是什麼呢？」也許，正是猶太人所背負的意識責難與死亡陰影。

作品反映現實，有幸運者與不幸者，無論何者均能嗅到死亡氣息，為了逃離、為了存活，有著各自的求生法則，而那些存在人們內心中原有的是非判準不只讓德國人難以澄澈清明，對於國家政令的服膺形成一種盲從，也矇蔽了人性原有的良善。另一方面，同為猶太的自家人亦為之動搖，畢竟，抗拒的臂膀容易曲折，對於未來所存有的希望又只是無止境的「等待」，於是，人們改變了信念，為求自保進而不肯伸出援手……。在不同的逃離方式中，我們更能貼近人性，因著對於落難者的協助，是動容而閃耀的美善，反之，出賣與背叛則成為難以一言蔽之的諷刺，而這一切可由居處其中的人物所欲採行的生存策略探究，並透過內心的對話的方式一一呈現。

³² 《安妮的日記》，頁 322

第二節 落難與協助

一、差異時空的落難

見到人們落入困境或遭逢難題時，「協助對方」是印入腦海的第一印象，接著，我們就有了所謂的協助方式需要策劃，但卻也同時有著考量的條件，而在這混雜特殊條件的時空背景下，面對人們的落難，究竟要如何抉擇，尤其，被援助者又是屬於對立陣線的身分時，是否需要為之伸出援手，在作品裡留著許多思考的空間。

漢娜·鄂蘭曾說：「奴役的先決條件就是限制活動的自由。活動的自由也是行動不可或缺的條件，唯有在行動中，人在這個世界上才算真正經驗到了自由。³³」於是，我們在《鳥街上的孤島》讀到：

我們從沒想過——到街上隨意走走、搭無軌電車出城、到大公園餵天鵝吃碎麵包或四處亂跑是一種特殊的權利。當然，在疏散開始前，猶太人區也有商店和遊玩的地方，這兒有一大片空地可以踢足球，我們也可以在廢墟裡玩。但始終有一條疆線——一條你不能越過的邊線存在。那就像是被關在一所監獄裡，只是這所監獄比多數的監獄面積稍大而已。³⁴

這是對於地理空間的隔離生活，也是生存空間被剝奪與限制的開始，人們失去了自由，如同陷入落難的情境中，因著時間建立的情感，似乎經不起政令的考驗，而生活的差異也讓人的互動變質，《親愛的卡塔琳娜》裡的一段敘述：「蓮娜小姐，我很抱歉，這絕對不是她個人的問題；卡塔琳娜是個聽話的好孩子，不過妳是知

³³ 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著，鄧伯宸譯，《黑暗時代群像》(新店市：立緒，2006)，頁 10。

³⁴ 烏里·奧勒夫 (Uri Orlev) 著，區國強譯，《鳥街上的孤島》(The Island on Bird Street) (台北市：臺灣東方，2006)，頁 61。

道的，我先生在公家單位工作，如果被別人發現有猶太人小孩在我家院子划冰，我們可是擔待不起……³⁵」我們見到人們內心的考驗正在上演，只是，自以為優越的人類，有時，複雜的性格往往不知從何信任起：「動物比人善良多了。動物不會想傷害你，牠們懂得報恩，你絕不會看到動物相互殘殺，一隻動物殺死對方，是為了果腹生存，但人可以不管什麼理由就殺死對方。³⁶」、「我逃離人類的世界時，只是個七歲的小女孩。他們叫我米施克，我是猶太人。³⁷」這是《與狼共存》的米夏，娓娓道出戰火下的求生記，初看之時，不禁讓人懷疑是否僅僅只是藉動物發聲的小說，然而，人與狼群共生的事件，並非首例，倘若將此疑慮暫且擱置，米夏所欲表達的是對於人性的質疑，她說：「人類接待你，然後把你遺棄。³⁸」這是在她經歷了人們伸出援手，卻又背棄時，內心留存的想法。事實上，我們並不否認人們良善的一面，然而出現在彼端的黑暗面亦是無庸置疑，良善有時過於脆弱，以致於禁不住負面聲浪的挑戰，於是，人類的獸性與動物的人性，在此灰色地帶中拔河。米夏內心對於人的「信任」從確信到幻滅繼之重建，這當中困難的程度早已凌駕在文字之上，慶幸的是此一過程裡，農場的「祖父」和瑪爾特、烏克蘭的好人米夏、丈夫莫里斯，讓她保有對人性肯定的曙光。

給不了實質的幫助，某些情況在於自己亦是落難的一方，如同《瑪卡·麥》裡的描述：

瑪卡站在街上，無法立刻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慢慢地、慢慢地，她意識到了自己是孤單的，孤單地置身於一個陌生的國度裡，孤單地站在一條陌生的街道上。波蘭婦人將自己戴上鐐銬的手放在瑪卡的腿上，說：「加油！孩子，想辦法讓自己活下來吧。以後，世界會變成另一個樣子

³⁵ 《親愛的卡塔琳娜》，頁 12。

³⁶ 米夏·狄芳絲卡(Misha Defonseca)著，孫智綺譯，《與狼共存》(*Survivre avec les loups*) (新店市：木馬文化，2006)，頁 35。

³⁷ 同上註，頁 7。

³⁸ 同上註，頁 112。

的。³⁹」

然而，世界究竟會變成如何？是更加善待或是更加殘酷？在這兒似乎沒有答案，只能懷抱著希望，畢竟，人們那雙協助的手並非常常能見到，尤其在滿是敵對力量與恐懼的場域裡，閃耀的良善光芒如同黑幕中的星光，太容易注意，也太容易隱滅、消逝。而安妮從隱密之家的窗戶向外窺探街景後，她在日記裡記下：

我們所想的事是永遠沒完沒了，從猶太人想到食物，從食物想到政治——有如走馬燈一般，不斷在腦子裡迴轉。說到猶太人，我昨天就看到兩個猶太人。因此，我懷疑自己眼睛是否有毛病，我覺得自己好像背叛他們，好像看到她們的不幸一樣，心裡很難過⁴⁰。

因著身處相似景況，縱然位居不同空間，也僅能留有意識上的相同對待，而堅守信仰的安妮，對於落難的此刻，誠如她想起友人麗絲，確信自己沒有能力救她，於是祈求上帝能將她送來，等待神的恩典前，我們更渴望在人的身上見到協助的感動。

二、在協助中追尋的意義

因著落難繼之而起的協助，對於生命所產生的意義價值，也許可以透過猶太醫師維克多·法蘭克在《意義的呼喚》裡回憶：「我們飢寒交迫，做牛做馬，但我們沒死。（我們當時是 25 人一組，每人每天多提供 2 湯匙，就能湊成 12 碗，所以每天有 12 個人可以多喝一碗湯）我永遠都忘不了集中營裡的這一課，學會同甘共

³⁹ 《瑪卡·麥》，頁 135。

⁴⁰ 《安妮的日記》，頁 79。

苦是生命裡最主要的課程。⁴¹」已身處集中營的他讓我們見到堅持的靈魂，的確，落難時分與飢餓時刻，讓大家看起來更像一家人，除了是面容上的，也在意識上盡可能保持對等，維持最基本的存活能力也才有向上構築希望的可能。因為面對看不見的未來，當信心被擊退時，放棄的腳步會以加倍的姿態奪取剩下的殘念，如同一個死結，解不開更惹心煩，身旁的人亦較平日更為容易受到影響，倘若不能及時遏止，連鎖效應於是乎展開，非生即滅。或許誠如猶太法典塔木德(Talmud)所說的：「誰拯救了一個靈魂，即使是一個，也應被視為拯救了整個世界。⁴²」因為，這些被壓迫的生命不該不分青紅皂白就一腳踩下，堅持生命該有的信念，恰如同為猶太人的維厄瑟爾在諾貝爾獎頒獎儀式當天回想到的：「為什麼是我？」，四月初，德國人開始撤空集中營。我再一次離大鐵門一步之遙。跨過鐵門，就是通向死亡的旅程。然而限額已經滿了，是誰在我之前跨過了鐵門，也許是取代了我的位置？⁴³這樣的回應似乎是讓留存的生命有著更為重大的使命，是為對那可能被隱藏的史實做出最有利的反擊與見證，於是，面對猶太人的落難，在尋求生命跡象維持的時刻，所伸出的援手展現了人性光輝中的勇氣，每每有著激勵的意味，除了是落難者自身堅持的信念，亦有來自親密的家人，來自同一陣線的族裔，甚或來自對立邊界的反動信念，形成對比的激盪。

在《親愛的卡塔琳娜》中，當卡塔琳娜的身份被識破時，瑪麗西卡因著眾人的輿論壓力，擺盪在是否將她送往秘密警察總部，或是協助並保護她的憂懼時：

「把她藏起來吧！...」

「把她藏在哪裡？...」

⁴¹ 維克多·法蘭可(Viktor E. Frankl)著，鄭納無譯，《意義的呼喚：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自傳》（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2），頁92。

⁴² 夏帕克(Georges Charpak)、宋笛蘭(Dominique Saudinos)著，邱大環、郭慧貞、李康文譯，《生命有如緊繃的絲弦》（臺北市：臺灣商務，1998），頁90。

⁴³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埃利·維厄瑟爾(Elie Wiesel)著，胡洪慶譯，《兩種聲音的回憶：密特朗與維厄瑟爾的對話》（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2000），頁106。

「我也不知道，儲藏室吧？我想。」

「孩子們會發現的，他們會說溜嘴的，到時候我們的麻煩就大了。」

「我會將儲藏室鎖起來。」

「你爸要是知道這件事的話，他會把你給殺了。而且我也答應托卜卡，我當著眾人面前向她保證，我們一定會帶卡塔琳娜去投案。」

「我辦不到，古波，我的良心告訴我不能這麼做。⁴⁴」

我們見到了堅持，堅持著自己的良心，或許惻隱之心與恐懼之心皆為人之常情，然而，若將同情與恐懼放在一起討論，這種因著被動所產生的心理反應，面對無任何行動力的關鍵時刻，其實內心很容易受到猶疑，如同見到別人痛苦，好像也會使自己感到恐懼一般，再不，就根本不敢去同情別人，深怕在恐懼中我們就只能同情自己似的，這樣的情形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斷上演。因著意識的對等，有了不分彼我的情況，恰如弗朗茲·卡夫卡在《日記》中提到：

任何人，活著的時候無法應付生活，就得擲出一隻手，多少去擋開一點命中注定了的絕望……但他還是可以用另外一隻手草草記下在廢墟上所看到的一切，因為他之所見異於旁人也多於旁人；畢竟，在他的有生之年，他雖然已死，卻是真正活下來的人。⁴⁵

這被記錄下來的是人性的良善本質，是人性的真誠悲憫。無疑的，那是個許多人
不願意再回憶的黑暗時代，相較於歷劫歸來的迫害對象，那最後亦嚐到失敗滋味

⁴⁴ 凱瑟琳·溫特 (Kathryn Winter) 著，鄭文琦譯，《親愛的卡塔琳娜》(Katarina: A Novel) (台北市：維京國際，2000)，頁 173-4。

⁴⁵ 《黑暗時代群像》，頁 224。引自內文，弗朗茲·卡夫卡，《日記》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的壓迫者，也有落難時刻，而那尋求希望與協助的，其實不分時地與對象，所以當德國攻打俄國失利的消息從收音機傳來時，在《樓上的房間》裡，協助藏匿西妮及安妮的約翰家也傳出這樣的聲音：「是這樣嗎？」當奶奶聽到消息時，「他們在逃嗎？這群可憐的東西。」「媽，他們是德國人。」「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他們也有媽媽。⁴⁶」這是對於敵對一方所釋出的人性悲憫，或許，對於這些差異時空的落難情況，除了有伸出援手的實際行動，或是意識上的對等心境之外，我們更在這種敵我兩方一正一反的同理過程中，去印證了生命的強度與能量。

三、落難時分的想望

活著，究竟是爲了什麼？活著，是爲了不讓猶太人成爲記憶中的民族，爲了回到神所應許之地，爲了回「家」。《性別、地方與認同》中提到：「離開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度的人來說，家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以及相關的國族認同和領域依附的問題，如同胡克斯所言，我必須離開我稱為家的空間，以便越過邊界，但我也必須再次返回……。⁴⁷」然而，對於落難者所給予的援助，不難發現最後的歸屬之地均有「家」的意象存在，流離的生命最初是因著迫害而改變原本穩定的生活模式，在許多人們提供的協助型態中，不少是因爲父母或親人的交託，如《樓上的房間》、《與狼共存》、《親愛的卡塔琳娜》、《瑪卡·麥》等，於是回「家」的信念成爲活著的渴盼，這即是來自存乎於人性中最原始的歸屬感。倘若，將空間區位放大時，即是以「國家」爲之的身分認同，然而，以當時納粹的政權意識而言，這外來的民族不應該存在「我們的家國」中，於是，曾爲荷蘭人民、德國人民等等的猶太人，被迫除去國籍，再度見到落難的開始，失去了認同，逃亡又起，以另一種層面而言，當年摩西的出埃及記終將上演，猶太民族再次開啓尋家及返家

⁴⁶ 《樓上的房間》，頁 164。

⁴⁷ Linda McDowell 原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臺北市：群學，2006），頁 127。

的行程。

無可諱言的，爲了生存、爲著追尋，行動本身有其目的與方向，走向《樓上的房間》前，安妮與西妮輾轉到了不同的「家」，如：漢寧克先生家、藏身洞等，而原先家中的成員，如：父親和蕾契兒前往各自的逃難處，甚或母親也在「醫院」的這個家走向亡者之家，此刻對「家」所留有的影像是四散而破碎的，但是，在她們的心中，卻期待當戰爭結束時能與家人團聚。反之，對於收留被迫害者而形成另一種型態的「家」其實隱含著畏懼與恐慌。農人約翰收留了安妮與西妮，但他的妻子迪安蒂說：「你們知道我們收留你們有多危險嗎？我們以前從來沒這麼做過，但是我們怎麼能對漢寧克家說不呢？」⁴⁸」此處所透露的訊息妥貼的反映在西妮的話中：「迪安蒂害怕了，她簡直等不及要送走我們。」⁴⁹」兩姊妹開始認清所處的情況，至此，協助者釋出的美善受到脆弱的攻擊，面對這樣的重擔而急欲擺脫，是當時不少人內心的寫照甚至未了化成實際行動，因爲相對於被迫害的一方，其實這些協助者也有自己的生命與家需要保護，這種區隔感，無疑讓落難者的內心形塑出「這不是我的家」，類似的情形亦出現在《與狼共存》的米夏身上，於是米夏選擇離開，爲自己尋找家：「我又開始想著媽媽。我好想和她在一起。……我的小羅盤和重見母親的信念會指引我。」⁵⁰」。

家，並非全然建立在外在形式上，不見得是高樓洋房或領土劃分，恰如安妮·法蘭克說到：

我們在這裡生活，的確有很多不自由之處，而且不自由的太多、太久了。

你我都一樣，我並非指物質而言，這方面我們還很豐富。我所指的是精神上的，我和你一樣都渴望自由與新鮮空氣。但是面對這種不自由，我卻得到充分的補償，這是今早我站在窗前時，突然領悟到的，這個補償也就是

⁴⁸ 《樓上的房間》，頁 136。

⁴⁹ 同上註，頁 137。

⁵⁰ 《與狼共存》，頁 65。

指精神上的補償。⁵¹

因著與家人尚能共處，因著情感的聯繫依舊存有，形成內在情緒的穩定，使家的樣貌有了不同的呈現。此外，誠如胡克斯所說：

事實上，家的意義本身會隨著去殖民化、基進化而有所改變。有時候，家是烏有之處(nowhere)。有時候，我們所知的家只有極端的疏離和異化。於是，家不僅只是一個地方。家是許多區位。家是能夠促成和促進多樣而不斷變化之視角的地方，一個我們可以發現看待現實的新方式的地方，是差異的邊境(hooks,1991b)⁵²。

也許，猶太人展開尋家與返家的行程時，面對「這不是我的家」的疑慮，除了投射在協助者的「家」之外，還有國籍身分的歸屬、宗教信仰「應許之地」的爭議，是聖地或是天堂等等，表面上看來，這些都成為每一個人返家目的地的選擇，然而，因著家而產生的歸屬與認同，其實已跨越了空間本身，成為更大的凝聚。

⁵¹ 《安妮的日記》，頁 188。

⁵² 轉引自《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127。

第三節 出賣與背叛

一、人性的考驗

因著落難時分，而有了逃離，姑且不論是否能逃到最終的歸屬，逃的過程或許形塑更為深痛的傷害，在這之中，不可否認人們所給予的協助匯聚了良善的光芒，但是相對的，我們見到更多不同的人性，如同出賣與背叛一般，為此，甚至帶來了對人或神等事物的質疑。

從作品裡，我們一再見到為了存活而將孩子交託他人照顧的情形，但是卻背棄了所該信守的諾言，讓這些生命繼續飄盪。在《瑪卡·麥》裡，瑪卡因為生病，母親將之交託同為猶太人的科普洛非西先生，然而：

科普洛非西先生並沒有將瑪卡帶往她期待的新的藏身之處，而是帶著她沿著街一直走向城裡。...他停下來，舉起手，指向城市。「你必須到那裡為自己想辦法了。」...「...你必須去找其他可以幫助你的人，我無法再為你做任何事。現在走吧，我不要让別人看見我們在一起。」他轉過身，匆匆跑回去了。⁵³

當漢娜請託的期限結束後，科普洛非西的信誓旦旦也化為烏有，並且將此責任如同鼻涕一般用手捏攥、大力甩去，不想留有任何藕斷絲連的瓜葛，沒有人願意拿自己的項上腦袋做賭注，最重要的是「該到手的錢財」已落入囊袋，但這換來的卻是母親漢娜的自責與失望，還有瑪卡的無依和徬徨無助，讓生命的離散有了更多的變數。於是，當這樣的畫面再次浮現時，對於人性考驗的抉擇卻也關乎時間性與麻木性：

⁵³ 《瑪卡·麥》，頁 123-4。

隔天瑪卡去井邊時，看到街上躺著一個死掉的小孩，他的下半身在排水溝裡，上半身在人行道上。從遠遠的地方看過來，這個小孩像是被丟棄的衣架，引起了她的注意。...死人身上的所有東西，例如大衣、靴子和圍巾，其實都不再需要了，所以可以把他們身上所有東西都拿走。...她猶豫了很久。突然，她不是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兒了，她發現身邊站了許多人，他們注視著這個男孩。一個女人說：「他頂多只有十歲。這是多麼悲慘的時代啊。」一個男人生氣地說：「什麼叫做悲慘的時代？不是時代的錯，錯的是該死的德國人。」然後他彎下腰，解開了結，從男孩的脖子下面將圍巾硬拉出來。男孩的頭移到另一邊，現在，男孩張開的嘴巴碰到了地上的污泥。瑪卡失望地離開。這一次，她又太笨了。⁵⁴

瑪卡看著與自己年紀相仿的小孩，內心的感受除了是同情，也有同理，因為或許下一個就是她，當她見到小孩身上的衣物，潛意識的想要拿取，卻又被自己的理智壓抑，因為那不是屬於她的，而聚集在她身旁的人們見到這一幕，惻隱之心的牽引而說出的感嘆，也正引動讀著文字的我們心中的情緒，的確，這是一個悲慘的時代，只是，當男子俯身前去取走那死去的孩子身上的衣物時，原先的悲傷情緒卻被畫面中所流露的漠然取代，這當中的錯愕同是瑪卡與我們都感受了，但對於自己因為遲疑而未取走衣物的反應，瑪卡責備自己「笨」，就像我們低估了人性可能有的變化一樣。

《與狼共存》中，米夏的父母為了將她託付他人照顧，付上七萬五千法郎，然而女主人瑪格立特對她的態度卻無法與託付的金額等值，在來訪的友人面前，瑪格立特如牆頭草般的精明狡詐態度一表無疑：

⁵⁴ 同上註，頁 237-40。

她剛才把我「指」給她看時，就像指著一隻動物園的猴子，一邊嘆氣說：

「你現在知道我攬了一個什麼樣的擔子吧……」

我佯裝要回我的儲藏室，並等候她們繼續要說的話

「其實，如果德國人打贏了，我們就把她交給他們，打輸了，我們總可以說我們也幫了她。」

我才剛剛從祖父和瑪爾特身上學會如何能快樂。我從這個女人上所學會的是憎恨。⁵⁵

離開家人的心情已是沉重不堪，而再次落入她所不能選擇的環境時，也讓這個被迫長大的孩子起了想重新選擇自己人生方向的念頭，在離開的那一刻，因著人性所帶來的不信任感成為她在日後尋家的路程中不斷出現的陰影。

納粹，是屬於明處的敵人，然而，這些暴行之所以能持續，隱藏於其後的另一種敵人亦不能忽視，某些情況看來，我們甚至可以說那些告密的人比德國人還要可惡，表面上也許與人親近，甚至稱兄道弟，轉個身，卻在背後出賣對方，在《樓上的房間》裡，我們看到：「有人向德國人密報。」漢寧克先生說：「他們知道那些猶太人都在這兒，也知道他們的藏身處在哪兒。」他說話的聲音更低了。「而我知道這個人是誰。」⁵⁶最初，告密者因著出賣訊息向敵對的一方輸誠，亦換來了一頂保護傘，但是，當情勢有所轉變時，告密者被附加的不信任感，勢必更甚他者；或者可以說，沒有一個告密者可以全身而退。如同安妮·法蘭克所居處的隱密之家，後來於 1944 年 8 月 4 日位於烏特佩街的蓋世太保第四—B4 的猶太事務部接獲電話密告：一名操荷語的人說，有幾名猶太人藏匿於王子運河 263 號的加蓋屋中。謠言盛傳密報的是個女人⁵⁷。1963 年，當此案重新展開調查時，具嫌疑的拉馬特·哈托葛以及蓮娜·范布萊得倫·哈托葛均已死亡，退出人生舞台，退入生

⁵⁵ 《與狼共存》，頁 57。

⁵⁶ 《樓上的房間》，頁 284。

⁵⁷ 《安妮的故事：納粹鐵蹄下的純真靈魂》，頁 259。

之布幕後。⁵⁸

二、 背叛的靈魂

人性考驗的過程，會因著自我利益的攫取有程度上的區分，只是，當我們見到脆弱的人性時，某些時刻已經演變成靈魂的背叛，失去自我意識覺察的可能。當我們讀到《狗兒沉睡時分》時，約翰娜因著一項訪談的作業而接觸到猶太人身分的梅塔·雷文女士，她回憶到：「我父母很有錢，她說，非常有錢，在希特勒上台前，他們還很富有，我衣食無缺。我們擁有城裡最大的服飾百貨公司——海曼公司，就在市集廣場上，最好的地點，今天那家店叫做『利門史耐德時裝店』……⁵⁹」而當約翰娜追溯起過往的這一切時，她發現：1935 年，她的爺爺艾哈特·利門史耐德當上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代表，因著這層關係，即便當時付了十一萬馬克買下這家店，原先猶太籍的店主其實分文未得，究竟是誰拿走這筆錢？無疑的，是「國家」，在猶太商人瀕臨破產時，艾哈特以低價取走一切，從中牟利的背後，令人嫌惡的是其熱中納粹運動的醜態，靠著黨的幫助得來身外之物，但更叫人覺得不堪的是，當這些既得利益者穿著制服、趾高氣揚地高舉右手臂呼喊「希特勒萬歲」，因為，那正像是出賣了自我價值判準的靈魂，成為失卻靈魂的發條玩具。

當時，因著「猶太人都很有錢」的刻板印象，有人選擇成為「既得利益者」。一塊塊「德國人，別在猶太人的商店購物」的牌子處處可見，然後隨著猶太商店被抵制的政令宣傳，失掉了上門的生意，更失去保有基本家產的資格，能帶走的遠比想像的還要少，因為那些剩下的是國家的、是占領軍的，對於平民百姓的日常所需，完全是攤在陽光下任人予取予求，而對於較為有「經濟價值」的商店等，則是以變相買賣的手法取得，甚或可以說是以一貫的手法「合法」強行拍賣，這

⁵⁸ 同上註，頁 p319-20。

⁵⁹ 米爾雅·培斯樂 (Mirjam Pressler) 著，林倩葦譯，《狗兒沉睡時分》(Die Zeit der Schlafenden Hunde) (台北市：東方，2005)，頁 161。

些行動根據的是「德國商業清猶第一法」(First Decree for Eliminating Jews for German Commerce)。亞亨地方法院於 1939 年 5 月 4 日宣布：「依亞亨市政府契約紀錄第 169 卷，第 6724 頁，下令『比·霍蘭登公司』不動產強制拍賣。⁶⁰」這是我們熟知的安妮·法蘭克的父親所擁有的資產，當時除了住所、辦公室、員工餐廳、倉庫等估計約有十萬三千九百馬克，且戰前每年尚有近三萬三千馬克的收益，但出價最高者也不過只願出五萬四千馬克，同時也是唯一出價的買方，結束公司事小，更重要的是他們被奪走最後一道足以自保的屏障，因為那或許可以是一筆逃往海外的資金，只是，在納粹眼中，一隻羊是絕對不能只被剝去一層皮，更何況那是一頭「猶太羊」，多年來，猶太人一直不被允許擁有自己的財物，所以，未了，離開德國時，尚需付上「拋棄德國的應付稅款⁶¹」貢獻「祖國」。如同約翰娜看著祖父加入納粹黨政軍所得來的時裝店，內心爲了此不法手段起了厭惡與自責感受，另一方面也似乎是爲這背叛的靈魂告解，她認爲在時裝店的招牌下應再立上一座紀念碑，並寫上：「這裡曾是仕女服飾公司『海曼公司』的所在地，由莫利茲·海曼於一八九六年所創，他是梅塔·海曼的祖父，這位女士現今叫做梅塔·雷文，住在耶路撒冷。此店於一九三八年被約翰娜·凱塞琳娜·利門史耐德的祖父以某種不明的條件取得。⁶²」

然而，較之於德國人，猶太人對於同爲自家人的作爲，是另一種更爲不堪的出賣，在《瑪卡·麥》中描述到：

「你們不是第一批從波蘭逃出的難民，我的先生和約瑟已經帶了很多人的逃到那上面了。下面的山谷裡，距離皮利比科不遠的地方，有一間荒廢的碾磨場，裡面住了一位猶太人，他叫做沙姆·科普洛非西，他會繼續幫助你

⁶⁰ 《安妮的故事：納粹鐵蹄下的純真靈魂》，頁 102。

⁶¹ 而早在 1934 年起，任何想移居國外者，個人應課稅財產如超過 5 萬帝國馬克者，即必須上繳其中的 25% 給國庫。此外，再加上所謂的「猶太人財產稅捐」以及原本的移民費用。在《安妮的故事：納粹鐵蹄下的純真靈魂》，頁 101，及《希特勒草莓》，頁 52 中，均有提及。

⁶² 《狗兒沉睡時分》，頁 185。

們的，不過他會索取酬勞。」漢娜咋舌：「這種人就是會趁火打劫，我們那裡也有很多這樣的人。⁶³」

在當時的鄉野間，其實有不少對抗德國士兵的解放軍，而農家亦在當中作為中介者，只是，具有這些身分的人們並不全然有著高尚的道德意識，利益關係影響了他們的選擇，趁火打劫的這群人縱然在刀口上舔血，卻也可能有被消滅的危機。無疑的，人性再一次受到考驗，同時成為一種存乎民心的常態時，「道德」的天平也似乎再次棄置，因為自私、為己是從遠古時代流轉至今依舊撕不去的標籤。原先，人被賦予了自由意志，可以由此來選擇善與惡，不能否認的是，在這世上沒有徹底的善或徹底的惡，對於生存在灰色地帶的人們而言，於此之中，最為重要的是道德選擇權，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惡與善必須共存」，為此，才有行使道德選擇權的可能。

在這場殘暴而戲鬧的人間悲劇中，在每一個殘酷與冷漠的起落裡，出賣與背叛的抉擇，不單單只出現在那尚未送入集中營的人身上，還有那已經身陷逃不出鐵幕的人們，因著這暴力的陰霾，對於德國人而言，尚有另一層期待，那即是把猶太人送進火爐的必須是猶太人，除了是自我毀滅的寫照，也好讓這群劊子手省卻某種程度的愧疚，同時，更如同該隱一樣，手刃自己的兄弟。但也可以覺察其實德國人亦在規避罪責，倘若面對內心譴責時，「那不是我」的防衛機制於焉而起。在維厄塞爾的自傳體小說《夜》中，我們見到他對於集中營生活的回憶：

來接待我們的有好幾十個俘虜。他們手中拿著哨棒，沒有理由地見人就打。命令道：『脫光！快！快！只把皮帶和鞋子拿在手上。……』⁶⁴

伯拉卡茲，我們同城一個壯大商人的兒子……，因為他強壯，所以被選

⁶³ 《瑪卡·麥》，頁 73-4。

⁶⁴ 埃利·維瑟爾 (Elie Wiesel) 著，謝道峨譯，《夜》(台北市：時報，1983)，頁 50。

上，因此他也親自把他父親的身軀送進火葬爐。⁶⁵

死亡的氣息瀰漫在監禁的營區中，一個接著一個步驟讓送進來的人成了輸送帶上的商品，挑選、勞動、施壓、挑選……，在一個個重覆的環節中成了二十四小時的工作，也讓死亡成爲一種習慣，畢竟「做這種工作，不是第一天發瘋，就是會逐漸習慣。⁶⁶」面對這樣的夢魘，無論是無法擺脫自我內心罪責的或壓抑恐懼的，均會讓人麻痺地成爲意識下的流亡者，失卻了靈魂。

三、出賣與背叛後的意識

就當時的生還者而言，在回溯與檢視大屠殺的過程時，多數被認爲是「沉默的共謀」，人們之所以壓抑過去的經歷都各有自己的理由，也許是對已死去的親人感到愧疚，或者面對那恐怖的意象實在難以處理，抑或是對當時動盪不安的局勢、以及此刻迥異方式更迭的以色列世界有著說不盡的無助感，種種因素儼然讓這一切趨近沉默邊緣。至此，誰是生還者？亦有其定義上的模糊與爭議，不少人採取的方式即是「逃避」，畢竟，不逃避的人可能會有定義上的困難，「但那不是我」的心態成爲最好的解答。

不可否認，隨著時間的推移，潛伏在「集體記憶」當中的力量，能對真實面貌重新詮釋，在重溯與回憶中推演，人類問題需要從時間開始考慮，如同法農所說：「在理想情況下，現在總是用以打造未來。」⁶⁷，過去的事件不代表真的過去，縱使那是過去的事件，但揮之不去的是意識的留存，如同伏流一般流竄在現存的空間，法農嘗試讓我們以「第三世界的黑人囚徒」來做思考，在這幾個字中，其

⁶⁵ 《夜》，頁 50。

⁶⁶ 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著，李淑珺譯，《滅頂與生還》(*I sommersi e salvati*) (臺北市：時報文化，2001)，頁 64。

⁶⁷ 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5)，頁 70。

實已隱藏了意識上的認定，究竟第三世界或黑色大陸的認定是否來自白人世界所下的定論，此刻，透過禁錮在這些壓迫者所附加的意識裡，我們試圖用更中立的判準來看這一切，卻也彷彿迷失在絲毫沒有出路的氣氛中，而回到歷史的事件中再進行思考時，無疑的見到如同美國人對奴隸制度漫長的四百年歷史有著「國家失憶症」⁶⁸，而德國人對希特勒所帶來的風暴無疑亦罹患了此一症狀。

在 1946 年時，站出來反對集體罪責或為某些納粹黨人說話，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也因此遭到各種團體的非難。維克多·法蘭可醫師在《意義的呼喚》一書中對於納粹的集體罪責，提出了所謂的反對之聲：「我是集中營的受難者，囚號 119104，我能這麼做，所以我必須這麼做。人們會聽信我的，而這也正是一種責任。⁶⁹」對他而言，集體罪責如同集體意識一般，對納粹、對猶太皆是，但，歷史是需要記憶且再思考，面對既定的過往，並非過去就灰飛煙滅，當人們一再強調該將罪歸在誰的身上時，其實，就像是又犯了德國人在戰後的時空背景下將罪歸諸在猶太人一般。反之，猶太人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中，對於整個社會環境的確有脅迫的力量存在，因為相較於戰後的德國社會，經濟因素讓猶太人可能進一步掌握政權，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國，這種驅趕的本能是原始社會既有的，一如我們的國家境內在戰後亦延續了相似的情況，族群間的對立、省籍情結、政黨意識相左等，所以，行為的本身是能被理解，但殘酷的手段卻是人們所不願見到的，然而，這些規避權責的最終目的不應該是造成對立與不安，或是趨向毀滅性的事件，而是讓這樣的行動不要再次出現。

人們希冀苦難結束的時刻，縱使這樣的希望混雜了如同走在鋼索上的驚喜與擔憂，稍一鬆解便能讓敵人窺見或嗅聞愉悅的氣息，甚至無形中再次將自身曝陷在危險裡。但恰如安妮·法蘭克說日記上的一行字：「幸福的人也請使別人幸福吧，

⁶⁸ 簡瑛瑛主編，《女性心／靈之旅：女族傷痕與邊界書寫》（臺北市：女書文化，2003），頁 158。

⁶⁹ 《意義的呼喚：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自傳》，頁 174。

有勇氣和信念的人絕對不會在不幸中死亡⁷⁰」。或許，對於這些非人性的困倦，如同黑夜揮不去的等待，徘徊在出賣與背叛之間，落難時分的協助不應全盤抹滅，當樂曲在正拍上行走時，副拍的曲式是為另一種欣賞的角度，在逃離的過程中，人們延續生命的時刻，過往的美好回憶是成為一種支撐生命與延續希望的動力。「死亡，是生者的目光。⁷¹」在看見的那一剎那，我們知道該選擇的是什麼。



⁷⁰ 《安妮的日記》，頁 202。

⁷¹ 《兩種聲音的回憶：密特朗與維厄瑟爾的對話》，頁 63。

第三章 剪去不同顏色的頭髮

第一節 為什麼是我

一、為什麼是猶太人

族群間的基本意識認同，形塑出該群體的特質。猶太，亦是當中的一支，宗教的力量喚化了該社群，其特有的生活模式因著宗教而存在。但也在基督教世界中，成為異聲。相較之下，面對龐大的文化交流與歷史的形成過程，德意志民族保有其獨特性格時，實與其文化內涵相關：

德國歷史上最變種與最具破壞性的納粹統治，不能僅將之視為代表極端民族主義或反猶現象，而是，它的出現、發展壯大及至掌權，必須追溯至百年前國民性迷思的傳統，它與德國人思想中的文化(Kultur)內涵有著理念的關聯。

在德國文人菁英的眼中，文化無關於民主價值，……文化卻體現國民（das Volk）的原始純真性與純粹性，它表現於自然的力量與充滿活力的生活中，並且只能在種族的純粹血緣中感受到如此神秘的力量。⁷²

或許，正因為德國人的民族特點，於種族主義興盛的年代中，更助長其優越的意識，「純」粹的獨特性，也讓偏執的意識形態獲得支持。此外，由這段話中，我們同樣感受到每個民族對於族群意識的認同其實極為相仿，當族群之間無法融合時，強勢的一方起而驅趕弱勢的另一方。而此刻西方宗教史也面臨世俗化的演變歷程，世俗性的民族認同逐漸取代宗教性的認同，對於德意志民族或猶太人而言，

⁷² 吳錫德編，《世界文學／跨文化與比較文學》（台北市：麥田，2003），頁47。此為洪丁福在〈泛談德意志「文化」與「國民性格」的迷思——精英與庶民今昔的對照〉所提出之觀點。

兩者均未被異化，卻也無法同化，呈現的是強者驅離弱者。其次，以歐洲境內而言，神具有的是白種人的形象，而那以「神的子民」自居的猶太人所擁有的黃皮膚、深色頭髮，不僅有所差異，也顯得突兀。同時，當民生經濟的大餅被佔據時，有外來者身分的猶太人，無疑讓德意志民族凝聚了將其趕出境外的信念，對此，我們可以用來解釋納粹的行為，但是至今讓人無法認同的則是其殘暴的方式。族群之間，向來自有其獨特之處，對於外來文化的包容性也有所不同，如同一粒沙，可以蘊含窺見「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的美感，也可能成為眼裡所不相容之物，在透過一連串的刺痛後，選擇與淚流出。面對大時代的變遷，工業革命所帶動的影響力策動著歐陸國家甚至是世界各國走向另一個歷史新階段，因著生活型態轉變，人們在慾望滿足的時刻，內心的慾望不單單只是停留在滿足罷了，反而渴求更多權力操控的可能性，在不斷擴張的過程形成變異的形貌。

如果，當我們重新審視「猶太人」的資格界定时，其實，任何人若沒有誕生於「猶太傳統」中，就不是猶太人，也無法輕易變成猶太人。所謂傳統，必定是傳承而來，是數百年累積的產物，不能靠後天編造出來。但是要生存，就必須要有身分認同，也就是尊嚴。普利摩·李維在《滅頂與生還》中提到漢斯·梅爾 Hans Mayer（化名：吉恩·艾莫瑞 Jean Améry），對他而言，傳統與身分認同的兩個觀念是重疊的，少了其中一個，就必定喪失另一個⁷³。無可諱言的，時至今日，「猶太人」的身分認定和「猶太教」內不同教派的代表性問題，以及政治和宗教的界圍劃分，在猶太社群間仍難取得共識，於此，僅對文本中所傳遞的訊息探討之。

由《親愛的卡塔琳娜》裡，我們見到卡塔琳娜不只一次提出內心的疑問，即便她的蓮娜阿姨告訴她：「在我們的信仰裡，如果媽媽是猶太人，那麼小孩也是猶太人。」、「可是我媽媽不信猶太教，不是嗎？而且我們也沒有信猶太教？」、「而它不只是一個宗教信仰而已，猶太人擁有相同的歷史背景，相同信念、傳統等。

⁷³ 《滅頂與生還》，頁 145。

它是一種生活態度」⁷⁴。因著母親血統而來的身分，是存乎身體上的印記，可是，她們的生活中早已不再保有猶太生活的方式，如果以對話中的解釋而言，這樣還算是猶太人嗎？或者，爲了躲過時代風暴，是否可以拋棄身爲猶太人的血統認定，換來生命？如果可以，或許會得到不少允諾的回應。

「我從來不了解為什麼我非當猶太人不可，這種感覺就像，只有別人才能看到你身上可怕的殘缺畸形，而我自己卻視而不見。⁷⁵」卡塔琳娜提出存在生活中的現實疑慮，此乃因著他者的目光而來，但是，卻也深深的影響了她對於身分的認定，聽見「你是猶太人！」的名號時，伴隨而來還有嫌惡的表情，這隱形的殘缺，遠比看得見的傷口難以掩蓋，一時之間，縱然覺查出自己的視而不見，甚或想要一探究竟，但是，這些早已存入其中一方的集體意識，無法扭轉。對此，任何人都給不了任何答案，不管如何想、如何做，似乎都有於事無補的悲哀。即使德國詩人席勒說：「所有人類都是同胞。」可惜，連德國人自己都聽不進去，舉凡有再多博愛的想法、再多備受爭議的定義可以反擊，最後，全憑「當權者」的論定，一頂硬生生被扣上的帽子，如同金箍咒般牢固。所以，普利摩·李維說到：「是否身爲猶太人，對某些人而言根本不重要，但對納粹而言，人們的意見或傾向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的血統，他的血統就足以判定他不夠純淨，是德國文明的敵人。而這些在納粹手裡的猶太人都是『暫時假釋的敵人，即將被謀殺的活人。』」⁷⁶猶太人，此時此刻背負了沉重的枷鎖，這種「揀選」是萬中選一的命定所帶來的偉大的試煉嗎？抑或是想擺脫卻揮不去的無情悲哀？難道，這真的是萬能的主在安排人世運轉所預設好的軌道？神既愛人，又何苦讓他受難？《與狼共存》中米夏回憶起母親在失去信心時，帶著她做禱告的情形：

當媽媽說：「聽好，這實在是沒有辦法，我們不能出門，我們是猶太人，

⁷⁴ 《親愛的卡塔琳娜》，頁 20。

⁷⁵ 同上註，頁 275。

⁷⁶ 《滅頂與生還》，頁 145。

你要了解！但是我們會祈禱這一切趕快結束，事情會好轉，你要有信心。」

我和她一起禱告，雖然我不很理解禱告內容：

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ou, Adonai ehad

Baroukh chem keod malkouto, leolam vahed

聆聽永恆的以色列是我們的上帝，永恆唯一

讚美榮耀的主呀生生世世

也許命定的事實無法改變，藉著信仰的力量能帶來出口，然而，在堅守信仰的同時，米夏面對獨自求生的過程，生死存亡之際與無所依靠的時刻，她發出了質疑的聲音：我跟我母親的上帝說：「你根本就不存在！證明給我看你是存在的！給我東西吃……告訴我哪裡有農場！告訴我怎麼去！你什麼都不做！你是不存在的！」⁷⁷」從一連串真實與虛構的情節人物鋪陳裡、抑或親身經歷的日記文字記述中，一個又一個的疑慮一再從作品中發聲，給不了答案的當下，這一切隨即深深隱沒在「神啊，祢在嗎？」的吶喊中。

再者，有另一種假設的可能，那就是：「猶太人不可能是上帝的選民，因為德國人才是」。被撿選，有其相對的「獨特性」，何以如此優秀的德國人不能雀屏中選？有著反骨性格的希特勒是否在進行一項偉大的挑戰？許多被壓抑的不滿總該有宣洩的出口，端看被挑中的是誰罷了，而他對猶太人的憎惡在書上、在演講中一再重複出現，或許我們可以說這傲人的「偏執」不是納粹主義中微不足道的部分，而是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核心⁷⁸。

在《安妮的日記》中：

我們聽到很多人對猶太人改變態度的消息感到驚訝。聽說過去不曾這

⁷⁷ 《與狼共存》，頁 154。

⁷⁸ 《滅頂與生還》，頁 203。

樣想的人，現在也開始放出反對猶太人的空氣了。此種憎恨猶太人的原因，我可以了解，有時是出於人之常情，但甚不合理。基督徒責備猶太人說：把秘密賣給德國人、背叛援助者等，為了猶太人，很多基督徒受到恐怖的懲罰。（《安妮的日記》，頁 279）

這股偏執的想法也席捲了與德國為鄰卻冷漠沉睡著的各國，大家在戰火中為求自保，面對德軍的進逼也許做出了違背自己國家的事情，比方將秘密賣給德國人等等，但是，德國士兵殘酷的手段，讓人們不得不做出背叛輸誠的反應，而這也絕不會僅限於猶太人，但人們卻因著意識形態的影響，將責任規諸猶太人身上，難怪安妮要說：「一個基督徒所做之事由他一人承擔，而一個猶太人所做之事卻由全部的猶太人來承擔。⁷⁹」為自己的身分抱屈的同時，也讓我們見到當時的環境所帶給猶太人的意識迫害，這當然也在《瑪卡·麥》裡呈現：自從她必須帶上這顆星星之後，波蘭和烏克蘭的小孩都不跟她一起玩耍了。他們用手指指著她，在她背後尖叫：「猶太人，猶太人。」⁸⁰倘若，當基督徒也處於相同的立場，或是其他國家的人民，面對類似的情勢，人們的態度還會有什麼樣的回應？無怪乎安妮要道出：「人們為什麼要強猶太人所難呢？」⁸¹

二、貶抑的標籤

當時，政令規定為了識別猶太人，猶太人必須在衣服上別上一個黃色的六角星，《樓上的房間》中，有對於這顆星星的描述：

我想別人看我們的臉就能認出我們是猶太人，蕾契兒這麼說過，但是我

⁷⁹ 《安妮的日記》，頁 280。

⁸⁰ 《瑪卡·麥》，頁 29。

⁸¹ 《安妮的日記》，頁 279。

身上這顆星星也許會使我們更容易被辨認。現在每個人看到我們的胸前，都能認出我們，星星上面寫著「猶太(Jood)」，黃色的底，黑色的字母，而且它們還不只是普通的字母，它們是花體的，特別是字母的「d」。

82

對此，這一切正透過「物化」的概念，貶抑了人的地位，安妮在日記上說到「可憐的猶太人，就像一群沒人照顧而病勢不輕的家畜，將要被送往屠宰場宰殺。⁸³」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中對於自己的黑人身分，聽見「巴娜尼亞好棒」(C'est bon, banania)的話語時的反應，恰如此刻我們看見「猶豬」(youpin)⁸⁴的代稱，均是藉由優越心態的語言來實踐「矮化」的歷程，只是，標記是一方所給予的，相對的一方是否能「有意識」的除卻，是更為重要的，此部分之後將再進行討論。

《樓上的房間》裡，呈現出當時不少孩子對於佩帶識別的「黃色星星」存有美好的幻想，縱然當時的法令規定未到六歲的孩子可以不用戴，但單純的孩子卻將此視為新奇有趣的事物，還要求家人為之用硬紙板做了一個星星貼在玩具小三輪車上。也有人是開心的佩戴著黃星星搭上開往「勞改營」的火車⁸⁵，一群自願前去勞改、為德國人幹活的人們，殊不知其實是踏上亡者的墓地。當然，這成為下意識的習慣，連逃亡時的漢娜和瑪卡還要旁人提醒將代表猶太人的星星拿掉，不必讓每個人都知道她們的猶太身分⁸⁶。

霍爾(Stuart Hall)說：「族群認同遠非永恆固定於某個本質化的過往，而是受到歷史、文化和權力持續不斷的『操弄』」(plan)(1990:225)⁸⁷。在猶太古老傳說中，上帝給了以色列祖先大衛王一個六角形的標誌，第一個三角代表「上帝」：天父、

⁸² 《樓上的房間》，頁 55。

⁸³ 《安妮的日記》，頁 95。

⁸⁴ 《黑皮膚，白面具》，頁 234。此為引自書中探討沙特《對猶太問題的思考》看法之內文。

⁸⁵ 同註 79，頁 56-7。

⁸⁶ 《瑪卡·麥》，頁 53。

⁸⁷ 《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265。

聖子、聖靈；第二個三角代表「人」：精神、靈魂、身體，三位一體。兩個三角形的結合即代表了救世主彌賽亞。曾經，大衛之星是何許神聖，然而，在納粹政令中，成為識別猶太人的符號，同時，以「黃色」貶抑之。為什麼這顆星星一定要是黃色的，而且又不是像陽光、星辰般象徵希望與安定的那種金黃？在《安妮的故事》中提到，秘密警察高階警官佛迪南(Ferdinanad)給了一個答案：「這樣才看得清楚！」因為，那病懨懨像黃疸般的黃，是 1941 年 9 月才引進德國的顏色，一個意味著排外的顏色⁸⁸。「符號」所賦予的意義，是整體概念的簡化表徵，藉由符號，有其立即性的認知意涵，相對的，透過單一符碼的意義轉換，大衛之星在「逆轉」的過程中，全然的顛覆，隱含翻轉此族群的那股力量之大，讓猶太人僅能屈從。

而一旦認清現實的狀況之後，表面的摘除看來簡單，但意識中的卻相對不易，在《親愛的卡塔琳娜》裡，卡塔琳娜表示了她對這黃色星星的想法：「大大的黃色星星，是猶太族人應該穿在身上的標誌，就像是一種恥辱的象徵。我們村子裡的三對猶太老夫婦都穿著它，我阿姨和姨丈也會穿上它過節；我卻拒絕它、想要擺脫它，而且幾乎就要成功了。⁸⁹」在猶太人的心理，大衛之星從神聖的殿堂演化成恥辱的象徵，無疑是來自納粹的建構，當人們覺察到這是意識上的迫害，對於許多人而言已成為潛意識中的一部分，此番優勝劣敗的除卻心態，在另一項行動中，再一次被看見——納粹的生命之泉。

「生命之泉」計畫是納粹種族實驗的一部分，由納粹黨衛軍首腦海因里希·希姆勒發起，建立一系列莊園，作為繁衍金髮碧眼優良種族的種子農場，並提供支撐納粹帝國的純種亞利安血統⁹⁰。那存乎猶太人身上的傳統顏色，展現在臉孔、髮色、眼珠子等，間或有來自族群融合的「混血」情況，卻被視為是「玷汙」亞利安精英，這些「雜色」均不及亞利安的「純種」色調。如同法農所言：「我們是

⁸⁸ 《安妮的故事：納粹鐵蹄下的純真靈魂》，頁 p154-5。

⁸⁹ 《親愛的卡塔琳娜》，頁 277。

⁹⁰ 《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頁 89。。

上帝的選民，看看我們的膚色，其他的人種或是黑色，或是黃色，這是因為他們的罪。⁹¹」當膚色的區分成爲無法跨越的鴻溝時，是再次檢視人們意識的關鍵時刻，因爲如同法農的疑問：「顏色的高下是哪一方在決定？」，他也提出另一個深思的問題：究竟「放在哪一套象徵體系裡來評價？」⁹²」當一切的價值判準、意識形態等，一樁樁攤在陽光底下，許許多多解釋不出、無法更進一步「追根究柢」的事物，相對性的僅能化聚成一個又一個的問號，更或者因爲解決不了，人於是開始規劃進行一場角力賽，善與惡、黑與白、男與女、純與雜.....，求的是聽見「拍板勝出」的譁然巨響！

時至今日，二十世紀的小摩西，不再有上帝可以歸屬。他的流放，是脫離自我的流放，是脫離母親的流放，是脫離他生身國度的流放；以致依照亙古不變的心理律，他乃流落至內在的荒原，而且常將這內在的荒原投射到社會。他乃飽受低自尊之苦，自疑之苦，無處可以投奔之苦⁹³。或許，希特勒也是爲了減輕此番痛苦而有的狂熱反動，策動暴力的形式將苦痛轉嫁他人，於焉尋求釋放的可能。

⁹¹ 《黑皮膚，白面具》，頁 90。

⁹² 同上註，頁 48。

⁹³ Joanne Wieland-Burston 著，宋偉航譯，《孤獨世紀末》（新店市：立緒，1999），頁 117。

第二節 她者

一、「她的」形象所匯聚的生命力

在戰爭小說中，有不少以二次大戰猶太人被迫害為背景的作品，為了帶來啟蒙與成長的力量，猶太男孩與猶太女孩引領人們跨越時空的彼端，提供光明的希望。其中，《安妮的日記》，是藉由一個女孩的生活記錄與剖析，在邁向未知的死亡時間點，留下觀看歷史的角度。而同樣是猶太身分的孩童，如《島上的孤島》裡的艾力克，因惹·卡爾特斯的《非關命運》，再到《我是大衛》、《男孩，快跑》，不同性別的主角在作者的安排鋪陳下，選擇不同面對生命的方式，因著對男孩的刻板印象，作品中大多見到其主動抗衡之姿，如同孤島上的魯賓遜，對於「活著」的中心概念，以實質的求生行動展現。而女孩，則賦予狀似被動的形象，多數呈現其內心世界的鋪陳，從夾板間的藏匿描繪，再到與日記、洋娃娃或布偶等依附物的對話，不難看見作者透過女性慣常角色的印象做刻畫描寫，然而，亦有特例，《與狼共存》的米夏，以紀實形式展現對人性醜陋面的反動，吞忍遭逢的際遇時，亦釋出對於極端環境下生存的能力。而此節，將一探「她的」形象所匯聚與展現的生命力。

人口政策往往是國家強加其國族定義的關鍵方法。尤弗－戴維斯寫道：

一個人唯有生為某個集體的人，才能夠成為該集體的完整成員。……當種族的建構加入共同基因庫的觀念中，對於異族通婚的恐懼，遂成為國族主義論述的核心。(1997:22-3)」納粹德國的人口政策和婚姻禁令即是此一代表，而猶太認同必須傳自母親的宗教規定，在此刻更易為政治家拿來大作文章的好漏洞⁹⁴。

⁹⁴ 《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255。

當代的猶太研究呈現出「所有的猶太人都是女性化的，卻沒有女人是猶太人」的觀點，幾乎所有研究猶太文化的著名學者都投注心力在分析有史以來歐洲文化如何將猶太人視為女性化與墮落的女性者而加以迫害的情形，導致猶太女性不僅遭受作為猶太人與作為女人的雙重壓迫，甚至在學者將猶太人等同於女人的譬喻當中消失不見⁹⁵，於是乎對於猶太女性的自我認同視而不見。

我們先從尚未達到少女時期的瑪卡、米夏來看，在逃離的過程中，因著對於所面臨的困境，被迫長大的意味與狀況自不待言，為此，促成個體發展出自我的獨立性：

瑪卡站在街上，無法立刻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慢慢地、慢慢地，她意識到了自己是孤單的，孤單地置身於一個陌生的國度裡，孤單地站在一條陌生的街道上。奇妙地是，她並沒有真正感到驚恐。相反地，她卻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待在那個天花板傾斜的無聊房間裡，自己像是愚蠢的雞，現在終於從小窗戶逃脫出來，可以看見其他的東西了。⁹⁶

也許可以視這段「孤獨」的時光為成長的儀式化過程，夾縫、閣樓、穀倉等狹窄空間，是時代背景壓縮後所成的特殊形體，暫且除卻此一空間意象，這些女孩們無不急欲脫蛹而出，呼吸原本屬於這個年齡該有的自由氣息，然而，這並非唯一的想望，畢竟生命體的塑造絕非單一元素，因著環境所帶來的拒斥，形成此番的反動，如《與狼共存》的米夏所說：

「我父母讓我免於一同被抓的命運，所以我去找他們而走得起水泡，沒什

⁹⁵ 同上註，頁 90。

⁹⁶ 《瑪卡·麥》，頁 124。

麼好抱怨。...事實上，我正在處罰自己一個不是自己犯下的錯。我為他們的消失感到自責，因為我曾經在陽台上露臉，所以是我的錯...當然，錯不在我。但是，這樣不幸的童年，只會引起罪惡感。就因為這樣，我變成我現在這個樣子，對自己很苛刻。...⁹⁷」

在自責的意識中，我們看見這一個個居處在故事與事件中的發聲體，孤獨的氣息是不斷被嗅出的，倘若將孤獨視為一種「誘惑」，當中展現出的「渴望」，為的是彌補被排斥、被遺棄的感受，兼有著青春期所出現的自我價值衝突與自尊不穩固，然後再藉由個人生活體驗逐漸建立起穩固的自我認同，出現較為切合實際的自我評估，形成追求自我的成長歷程⁹⁸。

以女性主義政治理論家楊恩(Iris Marion Young)在《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中對於不正義的五種壓迫形式提出其面貌，分別為：剝削、邊緣化、失勢、文化帝國主義、暴力。倘若以歷史紀錄而言，女性被剝削了主體自由意志的發聲平台後，隨即引發後續的邊緣效應與失勢狀態，尤其於族群和性別的雙重關係中，更深深地被排除在社會參與之外，隱沒到既定的意識框架裡。此外，在《與狼共存》中，米夏目睹德國士兵強暴一名女孩的過程：

「然後，那男人站了起來，性器官都是血。那女孩已經失去知覺了。他把褲子拉鍊拉上，對她吐了一口痰。他拿出他的手槍，對著女孩的頭，冷冷地，開了一槍。我清楚地看到他每一個動作，一個接著一個很有節奏地進行著。……好像他一邊在數著一，二，三，四。……這不是戰爭，不像我所碰到的波蘭農民那樣，而是對著一個無辜的年輕女孩，毫無理

⁹⁷ 《與狼共存》，頁 74。

⁹⁸ 《孤獨世紀末》，頁 179。

由地謀殺，就像在進行軍事操練一樣。⁹⁹」

在這種直覺式的暴力形式中，女性物化的呈現更為具體，而文化帝國主義的關鍵機制更將「她者」限制在她們的身體裡。因此，「主導的論述以身體特徵來定義他們，並將他們的身體建構為醜陋、骯髒、敗壞、不潔、受污染或罹病」(1990b:123) 女人僅僅被視為「身體」¹⁰⁰。再看到《安妮的故事》裡，以營區內的「消毒」行動而言，首先得在眾目睽睽之下脫光衣物，接著把腋毛、陰毛與頭髮等毛髮剔除，據稱是爲了預防蟲子橫行，但真正的原因在於「羞辱」。對於安妮·法蘭克而言，頭髮，是她個性的表徵，而此刻這一個個被蹂躪後的個體對於納粹有著更為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讓猶太人成為一群沒有個性、沒有身分，供他們擺佈的玩物。¹⁰¹」既之，這些毛髮以一公斤五十芬尼(pfenning)的價錢賣給德國的紡織公司，被用來製作毛毯、管線絕緣體及其他紡織品，變相的標榜爲馬毛製產品。以現今的用語，該列爲「黑心商品」，但其背後的成因實是極爲殘暴而無人性的手法。無名的人們，在此番洗禮後，擁有了新的「品名」，即是左手臂上的「號碼」，被簡化的生命體失去了最基本的尊嚴，而這個新標誌是爲了方便「點名」以進行「篩選」，當然，也成爲死亡的序號。

然而，重生的可能性向來是不能被忽略的，縱使居處在邊緣的境地，我們終究還是能在作品中見到這一個個少女形象的生命體所帶來的新契機，無論是小女孩進入青春期，或是少女穿越青春期後的新階段，在生理成長背後，我們看到因著生理而伴隨的心理成長，同時也與女性特有的「孕育」形象相關，是爲「跨越的成長」。

⁹⁹ 《與狼共存》，頁 148。

¹⁰⁰ 《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243。

¹⁰¹ 《安妮的故事：納粹鐵蹄下的純真靈魂》，頁 280。

二、 跨越的成長

「戰爭的結束是未來很遙遠的事，就像故事一樣脫離現實。¹⁰²」在尚未見到戰爭結束的時刻前，這段時光已經經歷了生理上的成長，既之，安妮之於彼得、卡塔琳娜之於巴維爾，來自青春期的好奇或情愫，是為成長過程的一環，安妮對著日記本凱蒂說到：

「你知道我是一個正直的人，所以我必須把見到彼得所感覺的快樂告訴你。我想他也很希望讓我知道他隨時都在等待我吧。我能體會到他盡量控制不接近我，但是，見面的時候心理又跳動得很厲害，他一定也和我一樣，心裡有許多話要跟我說。」（《安妮的日記》，頁 198）

兩性關係構成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只是，狹隘的空間裡所能提供的互動圈也相當有限，彼得之於安妮是同儕，並兼具提供異性互動的角色，於是安妮對於初吻或未來婚姻的憧憬，多半投射在彼得身上。而姐姐瑪格特則從手足關係演變成同儕取向的替補關係，從「姐姐給我的信」可以得知，這也回應了安妮在讀過希斯·海斯提所寫的〈臉紅〉一文後，在那天日記的最後一行字：「啊，我真希望有個要好的女朋友。¹⁰³」與她分享成長的心情，而不是只有安靜的「日記」友伴，至於母親與安妮間的互動一直處於較為負面的狀況，某部分來自於安妮原先對父親存有的形象：「我所憧憬的是父親真正的愛情——不只是父親與孩子的愛，而是對安妮的肯定。¹⁰⁴」因為安妮原先從家人的互動中形塑了自我價值的認定，認為自己的表現不如姐姐瑪格特，所得到的也是差別待遇，而進入另一個成長階段後，異性的形象轉嫁到彼得身上，也讓她發現「母親把我和瑪格特當成朋友看待的成分

¹⁰² 《安妮的日記》，頁 233。

¹⁰³ 同上註，頁 157。

¹⁰⁴ 同上註，頁 59。

比女兒大的多……¹⁰⁵」的情況，扭轉了與母親互動的想法，發展出另一層同儕關係。同時，當生理改變所帶來的孕育機制，讓她進一步想塑造理想的母親形象：「我理想的母親形象，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到了我這樣大的時候，必須善於處理孩子的情緒問題。孩子哭了，並不一定是肉體的疼痛，或者是為了其他事情，做母親的不能隨便取笑。（《安妮的日記》，頁 18）」，不難發現，安妮想藉這理想的形象作為內心對於母女關係的修補。因著環境、因著生理改變，伴隨而來的還有個體的心理成長：「回想起前年的生活好像是夢境一般的感覺。那個時候有如在天國每日愉快生活的我和現在住在隱密之家愈來愈懂事的我判若兩人。（《安妮的日記》，頁 199）」這樣的覺察，是為自我認同的結果。

此外，這些作品中女性角色多有依託的物品，如：安妮·法蘭克的日記本、瑪卡的布娃娃玲瑟兒、卡塔琳娜的猴子布偶史提飛、祖父給米夏的羅盤、艾琳的大衛之星項鍊等，這些「物」是為與過往生命記憶的聯繫，另一方面，也在主客的交錯對話中，呈現自我內心的思維。從最純粹的記憶書寫來看，《安妮的日記》以日記體形式增強了敘述主體與凝視位置的交錯慾望¹⁰⁶。《瑪卡·麥》以月份作為篇章架構、《與狼共存》順序法的記錄觀點，恰如他版的安妮日記。而在書寫記錄的軌跡中，如同王德威在《紀實與虛構》的序文中所提到，有別於男性在意義的播散，女性則重行了「孕育」的契機¹⁰⁷。

在《親愛的卡塔琳娜》中，我們讀到：

當我將玩偶握在手中時，腦海裡突然浮現一個念頭：會不會有一封信嵌在用木頭刻的猴子頭部？這小女孩一定是替游擊隊送信，利用猴子來瞞騙我！我像是發現什麼似地撕開了玩偶，用力扯下他的頭。

¹⁰⁵ 同上註，頁 155。

¹⁰⁶ 引自〈李桂芳，現代圖式的形變——關於啟蒙、革命與頹廢的辯證，中國 1930〉。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臺北市：麥田，2005），頁 220。

¹⁰⁷ 轉引自王德威序〈海派作家，又見傳人——論王安憶〉。王安憶著，《紀實與虛構：上海的故事》（臺北市：麥田，2002），頁 15。

她立刻發出恐怖的尖叫；然後，緊握著拳頭猛力撲打我……。

真奇怪，這個小鬼差不多跟我兒子年紀一樣大，竟然還會這麼迷戀布偶。我猜，這也是戰爭對小孩子的影響吧。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可是事情真的是這樣：弗力茲下士兩個禮拜以來第一次放假的下午，竟然是坐在他的軍鋪上，拿著針線縫補一個玩偶。

「看吧，像新的一樣，完美無缺，沒有人會發現它曾經修補過。」

然後，我從來沒看過那樣甜美的笑容。¹⁰⁸

對卡塔琳娜而言，布偶其實是她與過往記憶連結的依附品，同時，此一客體的對話物兼具有受到主體保護的特性，於是，當德國士兵弗力茲對史提飛進行殘酷的「檢查」時，硬生生地將它身體撕開、扯下頭，卡塔琳娜恐怖的尖叫聲是為一種控訴、悲慘的嚎哭隱含著憤懣的淚水，直到弗力茲拿起針線縫補後，卡塔琳娜展現了甜美的笑容。然而，德國士兵對人們的殘酷作為絕對更甚於此，在此處，是藉由隱喻方式再現真實的情況，相較之下卡塔琳娜原始本能的反應不過是被壓迫者千萬分之一的愿慰聲響，那後起的笑容實是進一步匯聚了一股溫柔而強勁的反擊力量，之所以「甜美」，乃在於正義的到來。

同樣的，瑪卡在逃的過程中，因著布娃娃玲瑟兒減緩了不安，降低了孤寂感，接受老婦人希歐卡的照顧時，還為玲瑟兒清洗，卻也在匆忙離開時意外的將它落在希歐卡家，「突然之間，瑪卡對新而溫暖的衣物的喜悅消失了，她無法忍受自己失去了玲瑟兒，這比她所經歷的一切不幸還要更嚴重。¹⁰⁹」一個小小的布偶，實際上是維繫了她與過往的關係，成為苦難時刻支撐她的力量，亦是能平撫孤寂的對話體。曾經，在茲格穆特與德蕾莎的森林邊境小屋中，沒拿出布偶玲瑟兒來玩，

¹⁰⁸ 《親愛的卡塔琳娜》，頁 199-201。

¹⁰⁹ 《瑪卡·麥》，頁 191。

那段時光是瑪卡在這段行程中最開心的日子，雖然那不是她真正的家，但是因為「家」帶來的安全感與歸屬感成為其內心更為深層的支柱，是期盼回家，也期待被收容，德蕾莎所給的關愛一度超越母親漢娜在其心中的重要性。《瑪卡·麥》的這段文字敘述：

不要太累了，玲瑟兒，瑪卡輕聲地說，繼續跑吧，玲瑟兒。有時你會經過一條溪，你必須去那兒喝水，喝水比吃東西更重要，玲瑟兒，這是醫生常常說的。也許你會發現黑莓，你必須吃下它們，別忘了吃東西。……你必須小心蘑菇，整顆都是白色、肚子有鋸齒的八字型蘑菇，你不能吃，那些是有毒的。不過這些你都知道，你和我一樣知道哪些菇可以吃。跑吧，玲瑟兒，跑吧。你很快就回到拉弗茲內。今天、明天或是後天，……¹¹⁰

這殷殷切切的話語，如同母親慣有的叮嚀一般，事實上，布偶玲瑟兒此刻已經不在身旁，這段獨白式的對話，是自我的對話與渴望返家的隱喻描寫，也像是母親漢娜內心牽絆瑪卡的情緒表現與思緒縮影。在《與狼共存》裡，即使我們見到米夏堅強的對自己說：「我，並不覺得孤獨，因為我一直是一個獨來獨往的小孩。這就是我的任務。¹¹¹」但母狼麗塔的懷抱卻給了她最大的撫慰。哪怕如同瑪卡刻意地「爬進自己的體內，不讓人看見她。¹¹²」，也僅只是一種轉嫁的心態，因為最後當她聽見熟悉的聲音喊著：「瑪卡！」時，她卻喊著：「德蕾莎在哪裡？我要找德蕾莎。」我們深知這不是母親真正的名字，但那卻是這段苦難日子中所留有最美好的母親形象。

「家」的變形，其實是可以建立在母親原生、初始的形象之中，對於猶太，這如同「記憶」一般的民族，流離與失散的命運，渴望回到應許之地，不啻是歸

¹¹⁰ 《瑪卡·麥》，頁 205-6。

¹¹¹ 《與狼共存》，頁 80。

¹¹² 同註 107，頁 249。

家、回到母親的懷中，但更重要的是在被孤立的時刻，更強烈的感受到命運操縱在自己的手裡，如同安妮所言：「我必須堅強起來做自己的母親。¹¹³」。同時，因著這些尋返的過程，「母親」的缺席，能倚靠的是幻化而生的信念，縱然信念僅存有「模糊影像」，仍舊是為追尋的終極目標。

人類歷史故事中少有從女性觀點進行書寫及思考，被壓迫者其實也各有支撐的論述以做為對於該時代的檢視，一如王德威所說：「歷史的虛構性或記憶的權宜感，現在想想或許是昨日黃花的事。紀實與虛構果然是創作一體之兩面，所有的歷史與回憶不過是書寫的一種變貌。¹¹⁴」縱使因著政治體的差異性，而有不同的歷史紀錄方式，然而其主導權多半掌握在男性手裡，女性在歷史洪流中恆常只是底層的伏流，緘默的被食言，承載顯而隱晦的負擔，留下被遺忘的傷痛，身處族群與女性雙重邊緣的角色，在戰後的此刻，藉由文字成為其族裔發聲的場域，本論文中討論的作品，均以近似說故事的方式重新記憶，讓女性成為發言主體，亦是彰顯女性具有「為世世代代創造、歌頌、維繫、承擔並轉化文化」的能力¹¹⁵，或許，藉由女性新的視角出發，凝聚另一種觀點做為發聲的空間，甚或留下批判的力量。

¹¹³ 《安妮的日記》，頁 60。

¹¹⁴ 轉引自王德威序〈海派作家，又見傳人——論王安憶〉。王安憶著，《紀實與虛構：上海的故事》（臺北市：麥田，2002），頁 14。

¹¹⁵ 《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270。

第三節 逃離與認同

一、 逃離既定的認同與意識

「我不敢想像這個世界能恢復以前那樣和平的狀態。我們時常提到『戰後』這兩個字眼，但是，它就像空中樓閣，究竟何時才能實現呢？」¹¹⁶」當我們在《安妮的日記》中見到這段文字時，對於戰爭的景況只能臆測，透過文字的描寫，不是讓我們再造戰爭現場，而是去窺見於此生活背景的人們如何尋求活著的力量與方式。另外，當人們遇及自身力量無法解決的時刻，信仰成爲一種支持，而在此時空中，猶太人對於信仰所遇及的不單只有提供支持力量的層面，在面對等待被救贖的預言背後，尚有因之而來的責難所衍生的迫害，於是，人們在逃離與認同中抉擇。

猶太人與其他民族走向相同的死亡彼端前最大的差異，在於那一路跟隨死神而來的身分印記，而對於這個身分背後的信仰，我們看到：「這是什麼樣的叉路！往前直走是到活命的養老院，向左轉卻是先到西坦霍夫醫院，然後再被轉送進毒氣室！為了避開死亡的判決，婦人放棄了她的猶太信仰。¹¹⁷」無疑的，這正在進行逃離與認同的抉擇，渴望逃離以避開毒氣室「淨身沐浴」的直接滅絕，同時意味著背棄原先所認同的信仰以換取生存。也許，我們要說，這是「在神不可知的意旨與理性之間的衝突」，但是，在信仰上，見到被壓迫者所身處的情況，那有救贖力量的「神」，祇在哪裡？面對著無法抗衡的局面，尋求更上一層的力量，宛如一種常模，自始至終，仍然有人不願意相信這已存在心中根深柢固的信仰意識有幻滅的可能，然而，那驚恐且帶著高度質疑的聲音卻不斷縈繞耳邊。

¹¹⁶ 《安妮的日記》，頁 138。

¹¹⁷ 《意義的呼喚：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自傳》，頁 139。

我唯一學會慶祝的宗教節日，也是我唯一想要慶祝的，就是基督徒的聖誕節；任何一切和猶太人或猶太教扯上關係的事物，都是醜陋的、可恥的，就像我應該穿的那種傳統服飾，上面畫著大大的黃色六角星星。……像是我和蓮娜阿姨搬離布拉提拉瓦時，法令規定猶太人要穿的那種衣服。「我才不要穿，」我尖叫著，「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要當猶太人！」¹¹⁸

《親愛的卡塔琳娜》裡的這段文字，我們見到因著猶太之名倍受攻訐，索性選擇擺脫猶太身分的既定認同，尋求另一種「認同」對象或方式的可能性，於是，等待被既定且存乎於內在意識中的神靈拯救前，舉凡可以除卻猶太身分而活下去的機會，哪怕是來自普世人們伸出的援手、改名易姓、變更信仰、尋求其他可以交託的神靈等方式，均應牢牢緊握。以卡塔琳娜而言，她在面對難以理解的現實狀況時，那些繪著天主教聖徒的卡片成為落難時分訴苦與解惑的對象，聆聽她的心聲，因而讓她渴望成為天主教徒。後來，來到下一個避難所——卡爾曼諾夫新教博愛之家時，耶穌也在幾次關鍵時刻保守了她的生命，只是，「我愛瑪拉修女和馬丁修士，他們就像蓮娜阿姨經常提到的那種勇敢的人們，難道上帝會只因為他們信奉了新教，就把他們當作異教徒逐出天堂嗎？或者把蓮娜阿姨逐出天堂；只因為她是個猶太人？」¹¹⁹」於是，這些掙脫既定意識的舉動，尤其以信仰所帶來的衝突層面最大，因為，面對未知的未來，信仰所扮演的角色是超越常人能力，並形構美好的永生，此刻，當人們從原先的信仰改信其他宗教時，是否能被新的「神」所接納？而究竟是神揀選了我，還是我可以自己選擇我想信仰的？對信仰意識的焦慮又成為一股箝制的力量，讓人不禁想從中逃離。

不可否認，人終究要面對死亡，無論時空背景為何，生之起，死亦隨侍在側，所有的不安因著既存的生命模式而來，對此也就有尋求慰藉的方式，這樣的行動

¹¹⁸ 《親愛的卡塔琳娜》，頁 277-8。

¹¹⁹ 同上註，頁 274。

不啻爲一種逃離，急欲擺脫死亡的影像。戰亂時分，死亡的氣息隨時瀰漫，如同米夏獨自逃難時的心情：「我跑著，死神跟隨在後。我可以感覺到祂在那裡，在波蘭，到處有祂的影子，在屍體裡，在路上。」¹²⁰《瑪卡·麥》中亦有鮮明的描述：

她沒多想什麼，沿著大街開始跑，跑出猶太區，跑向鄰近的雅利安地區。這條街很寬敞，和另一條更寬敞的街交叉。瑪卡看見一群朝向她走來的猶太人，旁邊是把槍緊抵住肩膀的德國人。看見他們匆匆走過後，她跑過十字路口到另一邊。突然她聽見了槍聲，一轉身，看見一個猶太人舉起手倒在街上，就這樣，一點聲音也沒有，猶太人就像布娃娃一樣地倒下，只聽見機關槍的嘎拉嘎拉聲。¹²¹

生死存亡之際，那與死神共存的猶太人的身分，讓人們逃離的不單只有死神的陰影，還有人性殘酷的一面。瑪卡逃出的猶太區原是她熟悉的生活空間，其實早已留有認同的記憶，因著認同，方才有了歸屬感，但此刻卻變成刑場一般，一道槍聲之後竟改變了生與死的命運，人，不再單單是人，已成了沒有價值的物品，任人操弄，如同既定意識的幻滅，同時，當一具具的屍體如同布娃娃般倒下的那一刻，彷彿見到維繫生命的呼吸、心跳正被抽離。

然而，面對攸關生死的情形，爲什麼不事先逃跑或事先防止被抓？抑或起而反叛或反抗？倘若答案是肯定的，是否可以說是太過樂觀，無疑的，這是人們的既定意識。考量當時所要面對的環境條件，逃跑，實是困難而危險的，一旦逃不成，就走向集中密室或歸入亡者之家，既之，落入集中密室後，是否還有逃離的機會？其實，以當時許多先天權力被否決的時空，有許多的情況對我們來說是遙遠、陌生，而且奇怪的。對於「囚禁」不可避免所能聯想到的就是脫逃或反叛，

¹²⁰ 《與狼共存》，頁 123。

¹²¹ 《瑪卡·麥》，頁 178。

在這種不合法、不正常的處境，以我們的角度認為只要脫逃就能抹去被囚禁的羞辱，然而，俘虜逃跑，是集中營的大事，而且是納粹邏輯所不可容忍的，因為根據定義，這種「生物價值卑賤的奴隸」並且應該臣服的人卻獲得勝利，有粉碎納粹完美神話的挑釁意味¹²²。而當時因著戰爭亦有許多來自軍中的吉普賽人和蘇聯俘虜，這些在納粹世界裡的賤民，如同猶太人一樣面臨極度的壓迫，飽受飢餓、身體羸弱、精神沮喪，同時，一顆顆剔得光亮的頭和骯髒的衣服是如此顯眼的標記，腳上的木屐也無法讓他們安靜而快速行動。其次，壓迫（反抗）兩者的相關，就跟囚禁（脫逃）兩者的相關一樣，是刻板印象。雖說，被壓迫者起而反抗壓迫者的情況在歷史上總會發生，然而，受壓迫最深的典型俘虜，如同前面所提到的飢餓、虛弱、傷痕累累（尤其是在腳上），身體的基本反抗能力早已不足，縱然在伯克瑙或華沙曾有過叛變，實乃因為當時的領導者在體能或特權上所擁有的條件，較一般典型俘虜為優，然而，最終仍以無法離開的命運作結。

人為了存活所激發的求生意志在對於困境的逃離中更為顯著，這一連串的奮戰結合了個人的身分建構和家的建構的社會反射¹²³，於此，因著信仰的血液讓人有了認同上的疑慮，而在掙脫之後，換上了另一種新的身分，是否就得到了認同與歸屬呢？此為下一個討論的方向。

二、在逃離中尋求認同與自由意志

這是《安妮的日記》所記下的：「戰爭一結束，我頭一個想的就是做個荷蘭人！我愛荷蘭人，愛這個國家，我更喜歡荷蘭語。我想在這個國家工作，為了要獲得荷蘭籍，如果必須親自寫信給女王我也能夠做到，絕不斷念。¹²⁴」曾經，國籍，是存在已久的身分，卻因著另一種意識的侵入而改變，是不合理，也不願承

¹²² 《滅頂與生還》，頁 174。

¹²³ 《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262。

¹²⁴ 《安妮的日記》，頁 245-6。

認的，這存乎人們天性上與內在的安逸，對於「認定」的變動實是難以扭轉，畢竟，這曾是我所擁有的一切，經歷過流離與動盪，留下紮根的印記，是難得的歸屬感。於是，面對再一次的「離家」，自有其意識上的掙扎與為難，當公民權被剝奪，成為沒有國家的人，不安的感覺逐漸襲來，倘若，連國家也沒了，但起碼也還有自己的「家」，儘管只存在於夾層隔板，卻也維繫了基本的家庭情感。安妮·法蘭克說到：「我們能夠逃過秘密警察的追捕，愉快地在此處安身，真是何其幸運。¹²⁵」，畢竟，情感的認同已被滿足了。

然而，當卡塔琳娜的呼喚再度在耳邊響起：「我想起昨天那些人說過的話：『猶太人是斯洛伐克的敵人。』……我愛我的祖國斯洛伐克，我也愛耶穌呀！可是為什麼我會是『敵人』？¹²⁶」，暫且先不論在信仰意識上的疑惑，失去國籍認同的身份帶給她困惑，因為她不知道究竟該歸向何處，離棄她的蓮娜阿姨和泰歐姨丈，甚或早已缺席的父母，讓她對家的記憶愈來愈模糊，於是，她在天主教、新教、猶太教的宗教信仰中不斷尋找認同的方向，在故事的末了，卡塔琳娜落入回憶，也許可以說是對於回憶的認同感帶給她成長的力量，並作為面對未來的能量。

而《與狼共存》的米夏，在逃離的過程，當她聽見人們喊著「猶太人、猶太人」，彷彿在臉上、在腦海中不斷刻畫貶抑的印記，而死神似乎也不停的追隨其後，內心的自由意志讓她對於母親所認同的上帝提出了疑問：

這天，我相信了我母親的上帝，雖然當我餓得快死的時候，我會找祂理論¹²⁷。

我憤怒地對天吐一口痰：「吃啊，吃泥土，吃下去……讓你知道這是什麼味道……你才不管我們死活，你什麼都不是，你根本不存在。唉，媽媽，為什麼你相信這個！為什麼？」這樣的喊叫，最後都是在淚聲中結束。

¹²⁵ 《安妮的日記》，頁 71。

¹²⁶ 《親愛的卡塔琳娜》，頁 171。

¹²⁷ 《與狼共存》，頁 98。

我重新上路，不知方向在哪裡。我試著往南走……。¹²⁸

這樣的疑問，來自於認同對象的缺席，恐懼的情緒亦覺察了她的失落，然後在絕望的呼喊後，又是被迫上路的開始，面對了無頭緒的方向，她嘗試性的為自己做出抉擇，意味著成長的力量再度為她點燃希望。

在《樓上的房間》與《親愛的卡塔琳娜》中，我們見到另一種因著謊言而做出錯誤的認同：

火車是開往一個荷蘭集中營的，那是一個勞改營，在那裡必須為德國幹活兒。許多猶太人收到像以前蕾契兒收到的那封信，告訴他們已經被解雇了，幾個人握著爸爸的手說：「德利奧，去幹點活兒不是比在家裡閒坐著好嗎？這不會很久的，而且他們告訴過我們，我們會得到很好的待遇，還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棵樹曾召集自願去的猶太人，現在火車上的這些人就是。

樹上還需要更多的自願者到勞改營裡工作，就算六十歲的年紀都還可以參加¹²⁹。（註：「樹上」指的是張貼納粹訊息的佈告處）

一開始，不少人認為集中營不過是個勞改營，失去工作的不安定感，讓人們以為只要在勞改營中好好工作，即能衣食無缺，對於這種滿足基本需求的誘因，令人心動，於是自願地加入團體中生活。在此同時，其實附加的假象，讓年輕人懷有另一種期待，正如卡塔琳娜所說：

「我猜人們可以在集中營裡唱歌，傍晚時可以圍繞在營火旁邊說故事，並且當一天的工作結束之後，我們一定可以每晚都睡得很香甜，不用怕

¹²⁸ 《與狼共存》，頁 154。

¹²⁹ 《樓上的房間》，頁 57-8。

什麼嚇人的怪聲和鬼臉，…¹³⁰」

「我當然知道，我想去集中營裡！我們會憋在這裡發臭發霉，都是因為你們太懶惰而不想去工作，我恨你們！¹³¹」

這景象所營造出愉快氣氛的團體生活，也是意識上渴望的群體認同，更是苦難生活的美好對比，然而，當真相揭露時，人們隨即本能式的尋求生存空間與機會，但是，在這背後更為重要的是一種意識上的幻滅，成為這時代特有逃離動線的新頁。

逃離的背後所浮現的意義在於：縱使逃向了一個庇護所或是一個提供援助的地方，但「那都不是我真正的家」。因著最原始的認同，來自原生家庭的認定，米夏選擇離開瑪格立特自己求生，西妮選擇離開約翰家渴望擁有自己的生活，卡塔琳娜選擇離開孤兒院走向歐哈瓦河，瑪卡冒險進入猶太區，都是為了找回自己心中所認同的家。

一如猶太信仰的人們流散各地後希望回到應許之地，因為，這對於人們而言是其心中所認同的家，而德國人或是歐洲境內的人們之所以選擇與之分化，乃因這些非境內族裔的人們佔據了他們的家園，為此所引發的爭戰，如同安妮在日記上留下的：「其實，不論和什麼樣的一家人共住在一個屋簷下，長期間相處必然會產生摩擦。我常常想，是不是我們自己故意引起這樣的惡劣的氣氛呢？¹³²」，這樣的通則其實在世界各國或國家境內仍可見到，因為人們對於和平共處的想法許多時候也僅存於某些時刻，認同的背後是需要更大的包容，若失去此一部分，則逃離繼續，抉擇繼續，尋求可茲認同的地方。

同樣地，先前提及猶太女性化的特質，若我們將女性的角色進一步確立時，不難發現在歷史進程裡，女性在各個時空環境中居處的地位，實是與猶太人的流

¹³⁰ 《親愛的卡塔琳娜》，頁 74。

¹³¹ 同上註，頁 82。

¹³² 《安妮的日記》，頁 165。

移狀態相仿，因為爲了想掙脫社會文化的框架，非主流、次文化的邊緣性，提供發聲的出口，渴望在跨越的空間凝聚力量。此外，「家庭的譬喻在國族敘事的描繪上很普遍——家鄉、母國、祖國、國族兒女。¹³³」在隱喻的意象裡，「家」爲女性提供再現的場域，繼之，我們將逃離的路線與空間重新概念化，逃離的路線宛如旅行者走過的路徑，因著移動引來注意的目光，在「被迫」離家後，卻也「主動」踏入尋家的路途，如同瑪卡、米夏、卡塔琳娜等，在這段歷程裡產生了流移認同，也就是主體意識的再確立。移動之於空間，有其關聯性，身體上的逃離在於求取生存，倘若，將壁櫥、隱密之家或樓上的房間等實體空間轉化，轉化爲抽象意象，安妮、米夏的書寫或這些女性作家的創作，是爲對於記憶或意識上的掙脫逃離，此過程宛如邊界的消失，然後進一步形成一種意識上的跨越與認同，最終，回到「家」，是希望使女人不再落入成爲「女人」的困境。

面對鐵幕的逃離，流亡生活的他種選擇，或是在夾板中的窄小空間、陰暗的掩體內求生，這段內心成長的歷程是開始與結束之間最重要的價值，一如將此段歷史再度檢視時，透過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留下討論的空間，其實正是它最好的解答。在逃離中，我們見到因著失去家、失去國籍、失去信仰而尋求認同，亦或從既有的認同中逃離，然後再次追尋。但無論是否追尋得到，無庸置疑的是在這些既定的事實中，每一個人各自去發現生命本質的目標，並轉換爲內在意義的自由，並希望能在自我認同中昂首闊步。

逃離，最終而言是因著死亡而起，但是卻能因爲認同的歸屬而有了生的力量，如同普利摩·李維反問的：「我們今天的生活有多安全？……這些新的威脅煞是「無用的暴力」。……今天的恐懼比當時的恐懼來得有根據嗎？對於未來，我們就跟我們的上一代一樣盲目。……那為什麼我們還不走？……爲什麼我們不『事先』逃走？」不論是戰亂時期亦或太平世代，面對生活中的考驗，很容易讓人們陷入渴望逃離的狀態，對於烏托邦世界的想像則常成爲內心認同的一種選擇，然而我們

¹³³ 《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265。

在抉擇中，其實隱藏許多微妙的抵抗，似乎是人類世界裡的一種特有性格，因之演變為成長的力量。在回應對生命所做的提問時，也正是為自己的存在負責，或許，我們都恰如西西佛斯必須不斷的推動巨石，但不同的是，有別於人們所創造出的神話，人選擇了神所不能出走的新動線，即是自由意志的抉擇與成長的力量。



第四章 在陰鬱的天空之後

第一節 國家機器的瓦解

王爾德曾說：「野心，是失敗的避風港。」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蔓延時，我們不禁要想到究竟是何種背景與氛圍塑造出希特勒的造神力量。在這種詭譎的年代中，意識的流動，以一種相當特殊的方式侵入人心，原本稀鬆平常的道德判斷、價值觀認定等，不再是主體的本能反應，一夕之間無意識的爲他者所宰制，成爲一種主流意識，讓邊緣的聲音消弭，對此，透過歷史背景與文本所呈現的內容，試圖在狀似「認同」的背後，尋找原因，並從中探尋除卻的可能性。

希特勒能如旋風般引領人民的思潮，其實不難發現他「回應支持者的偏好，甚至還形塑偏好」，人們煞是無意識的從「自我的單一獨特」趨向另一種「極端的單一獨特」，在「基數」下擴大成「複數」，也就是說，當我們宣稱某人擁有權力不難發現是因著團體而來，力量，於焉形成，如此撼動人心，進而易於掌控，除非失卻了產生權力的群體，「他的權力」才有消散的可能。同時，他將「暴力」的工具性發揮極致，讓見得到的槍桿子、武器先產生有效的控制，有了立即而基本的服從。但槍桿子不見得永遠都能獲得權力，所以，一旦權力有危險，暴力就出現¹³⁴。而展現暴力的主體是不分階級，上自領袖、下至平民，無一不體驗這「瘋狂」的感受。

電視和收音機的性質是它們厭惡寂靜和停滯期，於是，當「戈培爾的嘴巴子」——國民收音機進駐到每一戶人家後，每日的「傾聽」成爲「意識」汲取養分的源頭，然而，大眾傳播媒體的立場影響意識形態的呈現，不可否認除了進行宣揚思想的工作外，有些也肩負傳遞假象的使命，如同我們在《樓上的房間》中

¹³⁴ 史蒂芬·路克斯(Steven Lukes)編著，林葦芸譯，《權力：基進觀點》(臺北市：商周，2006)，頁 p62-5。

見到的：

西妮和約翰在談話——關於戰爭。「你知道嗎，我一直沒把收音機交上去。」

奧斯特威爾德家也有台收音機？那麼又會沒人肯聽我說話了，他們最討厭了，只會說：「噓！」

「我才不交呢，我每天晚上聽英國的荷蘭語廣播，那才是真實的消息，那些可惡的報紙從來不會告訴你一件真實的事！除了撒謊，什麼都不說。我給你舉個例子，報紙告訴我們德國軍隊在俄國怎樣取得勝利，然而當他們不得不放棄一座城市的時候，他們就說是出於戰術考慮，才這麼做。戰術考慮，狗屎！」¹³⁵

面對這樣的消息，對於人們勢必有著截然不同的反應。以納粹政權的支持者而言，因著人們被告知、知道「所有事實」，提供了應該下「決心」認定的「實在」基礎，卻也同時樂意被激起熱情，助長其後所衍生的宣傳。縱然這樣的虛構事件是一個含糊的事實，無疑的，我們可以說宣傳是有感染力的謊言。而相對的一方，在選擇不被構築的意識蒙混時，自然地傾向另一方接收訊息，這即是意識形態成形的一種方式。

爲了建立意識形態該有的「秩序」，除了思想的滲透外，當然也要有「認同」的對應物，方能持之以恆的進行改造工作，於是，舉凡如國旗、國歌、制服、禮節、口號等「儀式化」的表徵，成爲德國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一如往常，在行軍的路上他們高聲唱著進行曲，因為進行曲不但能控制步伐，還能控制思想。『向我們的旗幟敬禮，向我們的標誌敬禮，向創造它們的領袖敬禮，……讓我們成爲

¹³⁵ 《樓上的房間》，頁 127。

旗幟的守護者，無論我們勝利還是倒下，我們的旗幟永遠聖潔。」¹³⁶」這行軍的隊伍來自「希特勒青年團」，他們是納粹政權下重要的生力軍，為日後的滅絕猶太人肩負使命。而這些生活中的行動表徵，當然也成為猶太人覺察德國士兵的一種訊息，就像瑪卡在躲避追查時，「她仔細聽德國人的長統靴、德國人的聲音或是德國人的車子，是從哪個方向傳來，然後溜到隔壁院子……¹³⁷」。而曾經，這群服膺於納粹思想的德國人也是與瑪卡年紀相仿的孩子。當時，年紀小的男孩可以先成為「納粹小傢伙」，當然也有屬於女孩們的「少女團」及「德國女青年聯盟」，這是孩子們的夢想，1934 年底人數近 360 萬人，幾乎囊括了全國介於 10 到 18 歲的青少年。這是一批在納粹政權底下配合度最高的人們，

4 年後，他們再從少年團進入希特勒青年團，我們再留他們 4 年；之後，當然不可能把他們交還給舊式的階級身分教育者，而是讓他們立刻進入黨內，上勞動線，加入衝鋒隊或黨衛軍，……全都利用一個象徵，德意志的鐵錐。…萬一某些地方還存有階級意識或身分自大狂的餘毒，就交由國防軍繼續操練他們 2 年，…為了不使他們重道覆轍，我們馬上再次送他們進入衝鋒隊或黨衛軍等單位，他們有生之年都不會再獲得自由了！¹³⁸

最後的那句話彷彿敲醒了沉睡的腦袋，狀似居處自由天平一端的德國人民，其實也落入隱形集中營，這種渾然不覺的情況連原先尚能逃過國家權力宰制的教會亦無法倖免，家庭、學校、公共場所…等，人們生活的空間都留下行軍者踏過的足跡。

在我們的世界，幾乎每種意識形態和每一個組織形式都認為自己就是宇宙

¹³⁶ 卡蘿拉·史坦(Carola Stern)、英格·柏德森(Ingke Brodersen)編著，李雪媛、呂以榮譯，《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Eine Erdbeere für Hitler*) (臺北市：商周，2006)，頁 71。

¹³⁷ 《瑪卡·麥》，頁 222。

¹³⁸ 《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頁 82。

真諦之所在，都想把自己所認知或內心所欲策畫的視為唯一形式，並以等式推演並加諸於他人身上，如果必要，不惜使用如同武器或集中營式的強制手段。1933年，第一座集中營「達浩」(Dachau)的建立，開啓了日後其他集中營的樣版，然而，重要的不在於樣板的塑造，而是空間意象中死寂與初生的互動氛圍。當集中營建立的開始，對納粹有「生」之喜悅，而「死」之陰霾則降臨在猶太人身上，普利摩·李維回憶起集中營的日子時：「現在看來，那些被關押的歲月就像是一系列的「拍立得」照片、奇怪的滋味和混濁的氣味。茅坑的臭味、汗味、劣質菜湯的味兒、在阿拉赫(Allach)的死人味、四月份來的那批人傷病的氣味、巴伐利亞鄉村鮮花盛開的味道.....¹³⁹」這樣的味道的確令人不舒服，而最後提到鮮花盛開的味道，無疑象徵了一種渴望，渴望再見到自由，渴望讓花香驅除意識上的夢魘。

《與狼共存》中，我們見到米夏另一種嗅覺的記憶：

我能跟隨味道走。我的嗅覺異常靈敏，是一般人所沒有的。對還是小孩子的我來說，每個我所穿越的國家，都有其各自的味道，德國發出恨的臭味，波蘭是死亡的味道，烏克蘭是狼的香味，而對南斯拉夫，我只留下乾燥的石頭味。在義大利，到處是泥濘和雨水的味道。¹⁴⁰

這樣的記憶，其實也呈現出當時的時空裡有一座更大且隱形的集中密室，因著戰爭、因著國家政體本身的集體意識，讓空間的氛圍有了變異，居處期間的人們或多或少已陷入感官麻痺狀態，但對於尋求存活機會的人卻可以在穿越邊境時分輕易地覺察出來。以生存條件而言，遇及看得見的敵人起碼有反擊或自保的可能，但落入「看不見的敵人」——「意識迫害」手裡時，無疑是讓人們「拿預期的恐懼動員」，伴隨著政令的頒布，宛如飲鴆止渴，猶太人亦以漸進式的方式習慣命運

¹³⁹ 《滅頂與生還》，頁 101。

¹⁴⁰ 《與狼共存》，頁 185。

的動線，孤立、遣送、集中、挑選、滅絕，我們可以說正如同暴力一樣，是不需要藉口，而且它以一種「純淨」的形式存在於生活實踐中，彷彿就是吃飯穿衣的一部份。一種縈繞不去佛洛伊德式的「家常的恐怖感」(uncanny)¹⁴¹。當暴力施加在身體時，內心亦承受信仰疑慮，兩者交錯在個體意識形成一種撕裂的抗衡時，其實也正進行另一種意識上認同，「我就是猶太人，這就是我的命運。」因而失去了奮鬥的理由，開始走向死亡。如同《聖經》裡最震撼人心的章節：人們把孩子做為祭品，而猶太人的歷史就是從以撒免遭獻祭開始的。對此，相信這即是猶太人命運的全部寫照¹⁴²，無論經過多少世代的更迭，成為擺脫不去或是習慣性的「意識」獻祭。

那個變成軍人、遭敵軍射中頭部卻大難不死的卡爾，被囚禁在美軍戰俘營中數星期。當他在返鄉路上，穿越滿是斷垣殘壁的土地時，方才恍然大悟，這些他從少年時代便唱慣的、以祖國之名所發生的一切，結果竟是在他小時候的滿腔熱情下所不敢想像到的。¹⁴³

戰爭嘎然而止的那一刻，象徵國家機器暫停運轉，人們從「錯信」(la mauvaise foi)中甦醒，它並不全然為虛假謊言，而是一種介於真誠和欺騙之間的狀態。是故，戰火停息後，廢墟空間留存有散不去的記憶：破敗的家園、粉碎的意識、泯滅的人性……，一連串繼之而起的重建恐懼如同《追憶似水年華》那有名的開場白：「再也沒有比孤獨的無依無靠的呼喊聲更讓人戰慄了，在雨中空曠的黑夜裡。」相對的，塑造這一切的野心家，其實也是陷在自己的意識當中，脫逃不了對權力的渴望，而關乎「權力」的解釋與論定，如同薩伊德曾問的：「一開始時想像出權力這

¹⁴¹ 轉引自王德威序，〈傷痕即景，暴力奇觀——余華的小說〉。余華著，《許三觀賣血記》（臺北市：麥田，2002），頁18。

¹⁴²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 埃利·維厄瑟爾(Elie Wiesel)著，胡洪慶譯，《兩種聲音的回憶：密特朗與維厄瑟爾的對話》（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2000），頁41。

¹⁴³ 《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頁100。

個概念的原因是什麼？某人想像權力的動機與他最後獲致的形象，這兩者之間又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無疑的，對於希特勒納粹政權所欲獲取的，在他內心一開始構築的想像體與最終獲致的那一刻，應是有落差的，而今，我們所能見到的，大概是曝光的史証與欲蓋彌彰的潤飾，再不即是那無止境的託管地所擦撞的新火苗。人們創造了歷史，歷史是社會結構中人類命運的集合體，猶如一頭巨大的怪獸，吸附、收納與消化，甚而漂流在可見與不可見之中。或許我們可以說「懲罰」是因著意識形態遭到反動而起的防衛機制，其中，「死亡」是最合理也是最終的一種。然而，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自然定律裡，當欲以神靈之姿的統治者或野心家讀上波特萊爾的這段文字：在墳墓對面喝了一杯啤酒，抽了一根雪茄煙，徐緩的。然後，一時的意欲促使他走向墓園，那兒的草那麼高，那麼富於誘惑力，在那兒統治著的是富麗的太陽。¹⁴⁴我們不禁要說，命運之於被宰制的個體有其無法擺脫的無奈，而掌權者對於流逝的生命其實也無「永生」可言，或許抬頭見到「這富麗的陽光」，會顯得更為刺眼吧！

假定物質基礎是理解社會現實矛盾的必要途徑，何以知識話語與群眾運動的裂隙卻又成為階級鬥爭之中更大的鴻溝？寫實與敘述的深度，在辯證思維再現的「整體性」之中，是不是可能成為解決「異化」途徑的方法？或者，它會不會使得主觀意識再度陷入另一種幻覺的解決？¹⁴⁵

納粹的自我造神運動乃是以言語所構成的意識鉗制當時的人們，同時挾以武力的迫害，在反動力量開展的同時，抗爭，向來是身體的意象較為顯著，然而此類激進的行動實為以卵擊石，《安妮的日記》等作品所留下的記錄，恰似柔性方式

¹⁴⁴ 波特萊爾，為「射擊和墓園」散文詩中的主角。

¹⁴⁵ 引自李桂芳，〈現代圖式的形變——關於啟蒙、革命與頹廢的辯證，中國 1930〉。

的控訴，如同史實般匯聚正義之聲的力量，走出「房間」，在對話上的書寫，宛如重新使用語言，於意識上進行一場戰鬥，面對國家機器所強行置入的意識形態至此，改以「言論」形塑出抗衡的武器。又或許武力的激進帶來的力量是瞬間而強大的，但是，即使論述的力量緩慢，卻能留下可擴張性的思考，這幽幽之聲所引動的新思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形貌，叩出對生命本質的尊重，是另一種勝利，縱然如同安妮所說：「在一個所有理想均告粉碎、破滅，人人大展劣根性，不知是否該相信事實、公理與上帝的時代，我們年輕人要堅持理想，維護自己的信念，比往常加倍艱難。¹⁴⁶」而這正是企圖回到那夢魘的黑暗裡，找尋呼喊的聲音，或更重要的，「聽到一個出來回答的聲音。¹⁴⁷」



¹⁴⁶ 《安妮的故事：納粹鐵蹄下的純真靈魂》，頁 221。

¹⁴⁷ 轉引自王德威序〈傷痕即景，暴力奇觀——余華的小說〉。余華著，《許三觀賣血記》（臺北市：麥田，2002），頁 22。

第二節 集中密室的開啟

一、面對真相的反應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在他的小說《笑忘書》裡說：「人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鬥爭。」當集中密室開啟時，是陽光灑落的時刻，而這陽光太過耀眼，以致於讓人不敢相信。戰場上的人們頓時失去了敵對目標，走上來時路，迎接的是殘破的家園。也有半路遭攔截踏入相對應於集中營的俘虜營，或者意外得到那曾是眼中釘的人們所伸出的援手，卻在內心盈滿驚呼與錯愕。同樣的，集中營或滅絕營裡的死神影子變得仁慈，揮著手向這一切暫別，人們喜悅的笑容卻帶著滿滿的淚，在無處可去、無所倚靠的惶恐中踏入另一段流離的旅程，抑或，踏入人群的時刻卻自陷在滿是懷疑與不信任感裡，而重新尋找「家」之所在時，甚或將鬱積的能量轉嫁在「安排」的國度上。

對於當時的納粹黨人而言，總是不斷而自信的認為屠殺猶太人這件事一定不會洩漏、傳播出去，因為經歷過屠殺的都死了，而活下來的那些人則因為欲陳述當時的經歷與還原真相，但陷在怖懼的情緒中，哪怕是反覆言說，也會讓聽者感染畏懼後漸而麻木，甚至出現厭煩。縱然如此，如同普利摩·李維在回憶柯立芝於《古水手之歌》的精神：

從那時起，不確定的時刻開始，

那苦痛重返，

除非我可怖的故事被說出，

否則我心的燒灼不能停止。¹⁴⁸

¹⁴⁸ 《滅頂與生還》，頁 15。

一如在戰爭中我們會看到的畫面，《與狼共存》裡，那曾經出現在米夏眼前的殘酷世界，來自德國士兵強暴了女孩、排著隊被射殺的小孩，同時還得一邊避開穿制服的人的追捕，而且逼著自己不去看地上的死人，甚至也不看活人。她說：「我想這是最害怕的一次，害怕被關起來，在死人中間逃不出去，和四周的活人困在這個臭氣熏天的地方，而這些人不喊叫也不哭泣，兩眼空洞地走著，而我害怕地喘不過氣來。¹⁴⁹」而這個在波蘭將猶太人集中的區域裡，所留下的影像，亦如同維克多·法蘭克醫師對集中營的日子產生懷疑，因為不願回憶，甚至刻意壓抑地說出「那會不會只是我的想像」，面對這樣的反應，不啻為蔡麗所言：「創傷記憶往往如鬼魅附身，難以擺脫，生活中它又像一團陰雲時時飄來籠罩在對今天和明天充滿樂觀、希望的個體。¹⁵⁰」在積極的檢視時刻，卻有消極的記憶刪除。

我們透過《瑪卡·麥》，見到瑪卡對於已存在其內在意識的真相所做的反應來看，她試著練習刪除：「她覺得孤單、被遺棄、是多餘的。……瑪卡試著不去回想任何事，希望刪除腦海裡的所有畫面，刪除所有的記憶。她確信自己可以做到，只要努力，練習、練習、再練習，但是她辦不到。¹⁵¹」獨自挑戰困境、獨自求生，不斷的在與人的互動中感受溫暖與關懷卻又混雜冷漠與不信任，唯一能留存的是記憶，而面對記憶所帶來的感受，或許練習刪除並留下全然空白的腦袋，才能不傷痛，也才能讓自己再度出發。於是，戰爭終止時，同是苦難中的友伴拉法爾在此刻其實重新為瑪卡帶來生之意義：

拉法爾不會說話，和安德克一模一樣，不過他微笑地看著她，就像安德克一樣。……「你很特別，拉法爾，你非常特別，不是嗎？你是我們最可愛的男孩，我們很愛你。」拉法爾露出微笑，用他潮濕的手碰觸

¹⁴⁹ 《與狼共存》，頁 130。

¹⁵⁰ 引自蔡麗，〈「文革」敘述中的暴力、情愛與歷史認知〉。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臺北市：麥田，2005），頁 234。

¹⁵¹ 《瑪卡·麥》，頁 198-9。

瑪卡的臉頰。

瑪卡點點頭，將蘋果塞進大衣口袋裡，她想將它帶給拉法爾，他喜歡吃蘋果，但是醫院很少提供。

她走到隔壁有欄杆床鋪的房間，從拉法爾的床上拿起自己縫補的球，將它壓在自己臉頰上，啊，他的口水還濕濕的留在上面。

瑪卡哭不出來，就連西比修女過來握著她的手臂時，她的眼睛還是呆滯、乾枯的。「他們帶走了所有的人，」西比修女繼續說：「只留我們在這裡照顧下一批到這裡來的小孩，然後他們也會被帶走。¹⁵²」

安德克是德蕾莎的孩子，即是那曾經援助過瑪卡的家庭，也是這段日子重要的情感支撐。見到同為戰亂下的孩子，她無畏地伸出援手，藉著照顧他、保護他，瑪卡的成長與情感的歸屬於焉成形。只是，當拉法爾被戰爭餘毒的士兵帶走後，被抽離的痛處讓她吞食自己的聲音，豎起內心防衛的高牆，成為一種不信任的自我隔離，在漢娜請託德蕾莎的母親芭伯卡前去接回瑪卡時，走入森林所產生的空間恐懼與陌生，瞬間釋放不安的因子，瑪卡跑進灌木叢的逃脫，是來自先前因著風吹草動而逃離、藏躲的本能反應，更是擺脫不了記憶所形塑的潛意識，成為一種持續而反覆的行動。「她彎下腰，拔了一些長在鋪石路塊裂縫中的草莖，然後把它們塞進嘴裡。草莖的味道驅除了她記憶中品嚐過的所有味道。她嚼著嚼著，嚼到黏滑的草莖變成苦澀的黏液，然後吞下去。¹⁵³」瑪卡，無疑地正對已存有的事實徹底壓抑，是為被壓迫者不願回憶的渴望。

當德國總理密特朗逃離戰俘營，穿過帶刺的鐵絲網時，他心中的信念認為：

自由，事實上是要爭取的。自由，就是從一種狀態過度到另一種狀態，

¹⁵² 《瑪卡·麥》，頁 290-304。

¹⁵³ 同上註，頁 233。

就是擺脫某種東西。這其實就是一種決裂。...自由的失去可能是很舒適的，即便在不幸之中。舒適很自然地產生於一種已經形成的內部秩序，儘管這種秩序是針對你的。必須選擇另一種舒適，即獲得自由思想上的舒適，為的是能夠衝破這種秩序。¹⁵⁴

這種反向思考的可能，亦如同維厄瑟爾所覺察的：「不自由的自由可能也是一種自由的型態」。好比監獄裡的人犯在另一個人們所熟悉的社會模式裡，其實備受生活的困頓所擾，以至於藉由「反社會行動」投入相對的「不自由空間」，以求取生存的基本條件，轉而成爲另一種自由。對應到集中密室裡，除了直接被逮捕或是在行動下被迫害的，初期有不少人實是因著「勞改營」的宣傳假象而投身於此，甚至被吸納爲管理角色的「基礎幹部」，成爲猶太人迫害猶太人最大的諷刺，但正因爲有滿足「基本生存條件」的誘因，才使這樣的情況成爲可能。無疑的，那詭譎的年代、充滿變數的時空，產生許多我們所無法預料或想像的事物與思考機制，如同《樓上的房間》裡，戰火欲止的當下，人們擺盪在生與死的疑慮中：「在樓上藏了兩年七個月以後，結果卻可能一顆炸彈解決了你，而不是那殺人的集中營，哈！出去！你也許永遠也不能離開防空洞了，聽到這些聲音誰還想要收復家園呢？」¹⁵⁵」這種消極反應，是戰爭下特有的產物，也許，當要走出隱匿的避難之地，卻尚有戰爭的餘毒在等著，「重新出發」的能量亦是不易凝聚，縱然尚有零星的花火在做邊緣的掙扎，對未來仍存有美好的希望，期待新生活的開展，只是，更讓人詫異與不捨的情況是：那囚禁的人們，在集中密室開啓的當下，「離開」竟成爲一種抉擇。因爲，煞似「近鄉情怯」的恐懼襲來，如同安妮·法蘭克所言：「父親與母親恐怕也已經死了，我回家還有什麼意思呢？」¹⁵⁶」雖說在離密室開啓前不久，她因傷寒已靜靜地斷了氣，但那句話卻也道出不少人的心聲，面對親者的亡矣，

¹⁵⁴ 《兩種聲音的回憶：密特朗與維厄瑟爾的對話》，頁 72。

¹⁵⁵ 《樓上的房間》，頁 332。

¹⁵⁶ 《安妮的日記》，頁 324。

與其離開，倒不如選擇死亡，換取生命的解放。人事已非的預知，茫然無所從的失落，竟讓那「不自由的國度」漫出一種詭異的自由氣息。

而另一種嚴重的扭曲是來自壓迫者的畏懼。戰後，一連串的追查與真相的還原，是爲了找出「責任歸屬」，主管「猶太人事務」的納粹保安人員阿道夫·艾希曼進行審判時，承認了策劃遣送猶太人至集中營以及其他相關罪責，於是當判處死刑後，他在給妻子的告別信中寫道：「我是一個錯誤結論的犧牲品，我所犯的錯誤就只是因為我服從。¹⁵⁷」滿是無奈的悲哀外，不難感受其欲減輕罪惡感的意味，「服從」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介乎所處境地與自我身分認知所產生的一種社會化模式，這，難道有錯嗎？因之，許許多多的德國人也許會有相類似的情緒反應，爲此而產生自我緩頰的「不得已」、「被迫」的防衛心態，只是，真是如此的人們有多少？自由意志的抉擇又在哪裡？無怪乎「集體罪責」的聲浪一以概之的欲將其涵括在內。

二、隱藏的正義

當集中密室開啓後，見到人們對於真相的反應時，尙有一股正義之聲是被遺忘的，曾經，他們爲了堅持自己的信念，被主流意識排擠至邊緣場域中發聲，從族裔到性別，抑或猶太到女性，在那部巨大的壓制性國家機器進行「意識形態」加冕禮的同時，不可諱言的，凡事總有例外。先說加冕不成甚至是「失誤」的，成了「遊蕩人」，遊走在模糊地帶，以見風轉舵的姿態隨時嗅聞利益之所在，不分敵我成爲所謂的「告密者」、「從中獲利者」，如《與狼共存》中的瑪格立特、《狗兒沉睡時分》裡約翰娜的祖父等。然而，另有一群是反抗到底的「自由人」，各自在相對立的陣線中捍衛真正的正義，如「白玫瑰」、地下反抗組織，維護人性的最後尊嚴，我們看到《數星星》中安妮的回想：

¹⁵⁷ 《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頁 120。

皮德是真的死了，這個幾乎成為她姐夫的，紅頭髮的青年被德國人捉到，在哥本哈根的藍佛吉廣場處死.....，他在被槍斃以前，曾在獄中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要求把他埋在莉莎旁邊。

但是連這一點最後的請求他們也沒做到，因為德國人不准他們收屍。他像其他犯人一樣就埋在當地，墳上連一個名字也沒有，只有一個號牌。

後來，她曾跟爸爸和媽媽去那個號牌前獻花。墳場又黑又潮濕。從墳場回來，爸爸和媽媽就告訴她姐姐莉莎死亡的真相。

「她也是屬於反抗德國的地下人員。」爸爸說，「這個反抗組織想盡了辦法來替丹麥作戰，打擊敵人。」

.....「她和皮德在一起。他們那些人在一個地下室秘密集會，不幸被德國人發現了。.....」

.....「德軍在車上看見她跑，所以就開車把她撞死。」¹⁵⁸

曾經，安妮的父親說到一個丹麥國王的故事，問過她是否會爲了保護丹麥國王而死，當時大家都說會爲國王犧牲。此刻，她想起自己的責任是保護艾琳時，「全丹麥人都來做猶太人的衛兵。她會為猶太人犧牲嗎？真的？在黑暗中，他不得不承認，連自己都有點兒懷疑這一點。¹⁵⁹」不確定的畏懼所產生的懷疑是人之常情，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在渡送猶太人到瑞典的行動展開時，意外中，安妮有了遞送重要「手帕¹⁶⁰」的責任，大舅告訴她，她很勇敢，

¹⁵⁸ 《數星星》，頁 157。

¹⁵⁹ 同上註，頁 30。

¹⁶⁰ 當德國人用狗來尋找逃亡的猶太人的時候，瑞典的科學家就研究出對抗方法，這是一種以兔子血和古柯鹼的混合品，血吸引狗，狗來嗅的時候就把古柯鹼吸進鼻中，古柯鹼會使牠的嗅覺暫時麻木失靈。《數星星》，頁 162。

「勇敢？」安妮有些驚奇的問，「我不勇敢，我怕得很。」

「你卻冒了生命的危險。」

「那時候我根本沒想到自己，我只想……。」

大舅微笑著打斷她的話。「那就是勇敢——不想危險，只想自己的任務。當然你很害怕。誰不害怕？我今天都很害怕。……很多漁民都在船上做了暗艙，我的船上也有。暗艙在船底。我只要打開蓋子，就可以把幾個人藏進去。皮德和其他地下反抗人士把要逃走的人帶來給我或其他的漁民，我們就把他們運走。沿途都有人照顧這些逃走的人。¹⁶¹」

面對不合理的迫害，在反制的過程中，人們選擇加入另一個對立意識的群體起而抵抗，無論成功與否，其實都已經燃起對於生命主體的思考。

也許「意識形態」的滲入，是如此的無邊無際，並不是可以輕易劃分區別的，如同卡爾·馮·奧西茨基 1930 年在《醒來吧，德國》的詩作中提出的警告「納粹為你編織死亡冠冕：德國啊，你可是看不見？」¹⁶²，身為德國人的他，這股正義之聲雖使他 1933 年被德國除籍後成為集中密室的嘉賓，但是仍有不同的聲浪在邊緣中加入，許多電影正是為了當時的那些聲音留下記錄，並傳播出去讓世人知道。最為人熟知的有《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企業家奧斯卡·辛德勒與巴鐸·拜茲假借申請猶太勞工的實質援救；《帝國大審判》(*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 所獻上的堅毅精神是來自慕尼黑的學生蘇菲·碩爾與哥哥漢斯的「白玫瑰」團體；《玫瑰街》(*Rosenstraße*) 呈現的是玫瑰街的婦女為猶太籍夫婿的抗爭行動；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宗教團體力量同樣加注其中，新教神學家潘霍華曾警惕眾人要為「無權無勢、備受壓迫與受人譏諷者」站出來表達意見；因著冷戰而犧牲其在納粹政權時所發出不平之鳴成就的「紅色小樂隊」；德國軍方反納粹政權派的執行

¹⁶¹ 同上註，頁 146-7。

¹⁶² 《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頁 201。

長——史陶芬伯格上校策劃「女武神行動」等，雖然這當中有不少人逃不過株連監禁的命運，但是這些在當時可能被檯面上的政權關注或隱匿在少數團體裡的反動聲浪，在集中密室開啓後，成為光明的一頁，也讓譴責的手指放下不少。

我們見到這些當時因著捍衛人性尊嚴與反制集體意識所留存的正義，在具體行動的展現中，讓人們對於道德天平的扶正有了信心，此刻，透過文本作品的書寫創作及歷史的再回溯，無疑的，正是透過不斷的反思，保有了清澈的思維。而掙扎是開始，反抗則又是痛苦的歷程，但肯定的是那積累的勇氣展露人性卓絕的美善。然而，對於大屠殺背景的書寫記錄，以目前而言，無論是書寫者或被書寫者，男性仍多於女性。也許是遲來的正義，近來，戰後出版品的發聲權正在移轉，期待能見到更多的女性書寫，如同米爾雅·培斯樂書寫《狗兒沉睡時分》所呈現的手法。她藉由德國女學生約翰娜的一項訪談作業，在歷史的追溯中，對於祖父的過往重新進行檢視，運用的觀點或處理集體罪責的選擇，彷彿是一股後起正義之聲的回應，對此，我們更可以說透過那些方式，希望的是不忘卻人性最基本的尊嚴，找回自由意志的抉擇權，並以正視的目光面對既存的傷痕。

第三節 黃色星星的摘除

當國家機器瓦解，集中密室開啓後，在隨之而來的重新檢視中，人們從大屠殺的劫難走出，然而，世人對於邊緣場域的發聲體是否有了更為開闊的對談空間，這些以女性為主體的書寫作品，是否也有了新的使命，將於此節中進行討論。

《數星星》裡記述了曾經是猶太人身分的黃色星星，那是「大衛之星」，「大衛之星是猶太人的象徵，原來的含意是『大衛的盾牌』。『大衛』也是一個無比的勇士¹⁶³」。然而，希特勒因著生長背景所遭遇的經歷，讓他為猶太人帶來許多意識上的假定與迫害，他曾經很明白地表示過，在時鐘敲第十二下以前，在猶太人聽到最後一下以前，把他們全部都消滅：

「我這一生常常印證預言，而且往往引來他人嘲笑……但是今天我再度成為先知。萬一歐洲，乃至世界各國的猶太財主引發另一波世界大戰，最終的結局將不是布爾什維克分子征服全球，也不是猶太人的勝利，而是歐洲所有猶太人的滅亡。¹⁶⁴」

他所展現的行為如同將自己「神化」，並且將上帝給以色列祖先大衛王的賜與，翻轉形象後給了猶太人標記，我們亦在作品中見到當時的人們試圖擺脫此印記的可能，然而，離開了當時的時空，原本我們以為這就像在文句末了畫下結束的句點或是聽見樂曲終止的未拍，只是，這一切似乎尚未結束，我們從《與狼共存》裡看見：

我們搬家了，因為鄰居在我們的大門上及信箱刻上大衛之星。……莫

¹⁶³ 《數星星》，頁 49。

¹⁶⁴ 《安妮的故事》，頁 104-5。

里斯知道這種情況下的我，會氣得把槍拿出來。...我敏感到只會用暴力來回應暴力。我一直很怕恐怖的納粹再度回來，而且人性竟然能製造出這種恐怖，所以必須要徹底屏棄任何類似的情境。¹⁶⁵

戰後多年，米夏的生活仍舊湧入這表徵的印記，人們改變嘲弄的方式卻又能輕易喚起恐懼，這顆黃色的星星也許只是從外表的衣物上拆卸，卻未徹底從內心摘除。除了有來自人們尚存的貶抑意識，但更為需要留意的是米夏對於這些意識的恐懼亦未撫平，是否，我們可以像個勇士，為自己出征，找回邊緣的發聲權。於是，我們要說，角度的辨證，是一種思考的可能，是引領逃離動線的熱情，或許就像斯賓諾沙《倫理學》的結語：「引領向自由的道路現在看來似乎很困難，但是還是可以找得到的。」當然，不容易找到的事物必然是困難的。只是，解放就在眼前，可以毫不費力地到手，人們卻又對它視而不見。不難想像殖民者（迫害者）不斷為被殖民者（受害者）塑造形象，而被殖民者（受害者）竟也因之塑造自己的形象，這當中的微妙關係，存在黑人與白人的世界，存在猶太與納粹的思維，也存在我們念茲在茲的這片土地，為了掙脫「被殖民者（受害者）的集體無意識」，與其讓新的語言、文化、記憶甚至是人格進行翻轉，或許，除卻內心自卑、毫無自主的意識抑或微妙的依賴情結才是最為主要的。對此，筆者認為意識的翻轉是可行的，所以人們應當嘗試逃離社會體制或意識上的階層體系，嘗試「離開」既定的社會階層，改變當中的從屬位置。

一如《安妮的日記》，我們看到她正為自己發聲：人可以保持沉默，卻不能禁止他的意見，就是年齡還太小，也不能禁止他說出心裡的話¹⁶⁶。一個時代的真實印記與面貌常是留在那吃盡苦頭卻少有發言權的人們身上，相較於該時代興起的中產階級，位居社會底層的人們其實勞勞碌碌於生活當中，單純的只渴求能維生

¹⁶⁵ 《與狼共存》，頁 232。

¹⁶⁶ 《安妮的日記》，頁 192。

的機會，也或許是這種「向來如此的」的心境，縱然他們必須佩帶起黃色星星，依舊對生活充滿信心，畢竟就只是想「活著」。於是，我們從安妮的身上看見那曾經屬於人們該有的熱情與堅持，

我太傻，自己的理想無法實現，卻也不能全部割捨，想想真是不可思議。我一直抱著理想也是因為相信人類本善，固執著善有善報。我實在不能夠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混亂、不幸與死亡的基礎上。

我看到世界正在逐漸地荒廢，說不定我也會被破壞，我聽到暴風雨逐漸逼近的聲音。我的身體能感受到數百萬人的痛苦，雖然如此，當我仰望天空時，所有的一切又恢復正常，此種殘虐也已結束，和平與安靜將會再度降臨人世吧。

為了等待那個時刻，我必須堅持我的理想。不久，實現理想的時機也會到來的。¹⁶⁷

縱然外在的空間留給人們邊緣的區塊，甚至在行動與意識中進行一場場的迫害，也許安妮感受的痛苦像是隱形的，但在隱密之家外的空間中留下的卻是無法抹去的記憶，她試著在自我意識中以堅持的勇氣面對並捍衛這一切，或許如她所說「年少比年老孤獨」，但是，因著她的誠實，對自己的誠實、對每個人誠實。她什麼都想知道，任何事都看得很透徹，在她的文字書寫中，真切的留下生命的記錄，也許「誠實」審視的背後總有拆解不完的謎題與謊言，更或者在堅持立場的時刻遭逢反擊，而反擊的力道絕對是一次比一次大，甚或讓人成為荒野孤軍，但如同她在書裡所留下的文字，因著文字而起的思考模式，是對抗人生虛無與孤獨的利器，即使在灰色地帶，也不致茫然。

在《來自無人地帶的明信片》中，潔楚也再次提醒我們：「我沉默地聽著這一

¹⁶⁷ 《安妮的日記》，頁 307。

切，而且越聽越生氣。據說荷蘭人性格中有個特色，就是『商量』。但是這攸關生命的決定——甚至攸關我死亡的決定——他們卻沒人找我商量。¹⁶⁸」此刻，彷彿能聽到另一種個體內的回應，是來自歷史舞台上經常性缺席的女性，這樣的缺席實際上有許多被壓制的成分，是外在環境的既存意識，是內在自我的默許，無怪乎她要說：「樓上我家的斷垣殘壁中，外國士兵正為我的國家奮戰。在這地窖中，我則為我自己奮戰。¹⁶⁹」既定的事物，如女性、猶太人的身分等，在過往的時空中或許難以扭轉，但是許多檢視的角度卻是對主流文化的重新思考，我們也可以說，因著許多被簡化的事物，讓焦點也只匯聚在「多數」上，被邊緣化的民族、文化、生命體等成為被忽視的犧牲品，倘若將密室及身處當中的猶太人、吉普賽人放大來看，其實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生存空間是被壓縮，同時有著許多邊緣的生命體，一不留心就會被遺忘，在後現代的此刻，生命體不斷陷入離散狀態，透過邊緣的場域，從「猶太」、「少女」的意象，「雙重邊緣」的立場鮮明的浮現眼前，於是，將之對應到現今的時空，我們居處的國境、社會角色、個人意識等，因著邊緣化產生反機制，如同政體的不穩定、生活的不安全感、自我的不信任等，築起狀似堅固的防禦堡壘，內部其實是混沌一片，防守線有隨時瓦解的可能，於焉，極有可能敗退在更迭的世代中，改變不了邊緣的命運，進而形塑下一個多重邊緣，抑或成了流離島影，疏離得只剩孤獨。

然而，不能忘記的是，因著「邊緣」的特性，才有對「中心」的探究機會，如同吳爾芙所提到：「但我要堅持的說，只要我們為她而努力，她會來的，我們即使在貧窮、潦倒中苦作也值得。¹⁷⁰」為著自己奮戰，在自己的房間打造著希望，透過記憶書寫與反思，在新的出口上匯聚力量。誠如李桂芳所言：「當語言作為社會各個權力場域泛轉的可能，除了社會機制不同框架的認識與影響外，也是有關

¹⁶⁸ 艾登·錢伯斯 (Aidan Chambers) 著，陳佳琳譯，《來自無人地帶的明信片》(Postcards from No Man's Land) (台北市：小知堂，2001)，頁 89。

¹⁶⁹ 《來自無人地帶的明信片》，頁 93。

¹⁷⁰ 維金尼雅·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著，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臺北市：天培文化，2000)。頁 190。

話語生產模式與社會再生產的之間的差距，話語實踐可以是一種系統，也是一種逾越，同時蘊含了書寫主體與歷史的新的眼光。¹⁷¹」以米爾雅·培斯樂為例，透過她作品中的書寫軌跡，在《瑪卡·麥》與《狗兒沉睡時分》藉由差異的觀點產生不同的思考空間，有別於此研究中的其他文本，《狗兒沉睡時分》試圖從我們所熟悉的猶太受害者反轉至德國人的觀點來做思考，大屠殺事件帶來的影響絕非單向，因為那是德國人與猶太人共同居處的時空，所以當約翰娜對於祖父的過往重新檢視，父親大怒「為何你一定要吵醒沉睡的狗？」，母親的態度則是「你得忍受並原諒許多事、忘記許多事」，法西更老師：「講出來，並去承認它；不公就是不公，罪過就是罪過」，而男友丹尼爾「不要聽、不要看、不要說」，對此，約翰娜還嘗試調換角色，在與雷文女士的孫子多隆發生性關係時：「直到很久之後，當她有能力去思考發生的這一切時，她才了解他們兩個都在玩遊戲，不是那種天真愉快的遊戲，而是去傷害對方心靈的致命性遊戲，一種角色對調的遊戲，彷彿想藉此去抵銷某件事的發生般。¹⁷²」無疑的，我們見到書寫者所傳達的訊息在於誠實的面對已發生的事實，進而以尊重的態度面對人、族群、國家等，因為縱使調換迫害者與受害者的角色，如同目前在以色列境內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只是讓這一切繼續上演。當猶太散文作家兼詩人的愛蓮娜·柯雷普費茲哀悼安妮·法蘭克時，她提到：

我現在相信，尋常性是我們最珍貴的事物，而當年華沙猶太人奮起抗爭的，為的也是這個。我談的不是什麼高貴或抽象的理論，只是主張，人有權繼續過一種有目的感、有自我價值感的生活——一種尋常的生活。我們今天齊聚在這裡哀悼的就是這種尋常性曾經有過的失落。¹⁷³

¹⁷¹ 引自李桂芳，〈現代圖式的形變——關於啟蒙、革命與頹廢的辯證，中國 1930〉。

¹⁷² 《狗兒沉睡時分》，頁 214。

¹⁷³ 馬克·艾里斯(Marc H. Ellis)著，梁永安譯，《一個猶太人的反省》(*Israel and Palestine out of Ashes: the Search for Jewish Ident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新店市：立緒，2005)，頁 52-3。

一種尋常的生活，是單純而輕易即能掌握得到，只是，慾望的擴張將人們推向虛無的置高點，殊不知優越心態帶來的歡愉是短暫的，同時爲了滿足渴望勢必繼續競逐，或許，「尋常性」的回歸可以說是對那個時代的傷痕、對這個時代的失衡最好的療癒。當時，強加的貶抑標記是被迫接受的過程，時至今日，另一種無形的印記正在形塑，恰如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提到資本主義社會整體的關鍵隱喻 (metaphor)，我們在商品交易、流水線的機械生產與媒體密布的過程中¹⁷⁴，其實也成爲被消費的商品，渾然無所覺。然而，生活的本質有其該存有的意義與價值，爲此，黃色星星的印記方能真正摘除，此刻的我們也才有機會從「物化」的個體中走出。

「大量的西藏避難者，在那裡修建了自己的寺廟。尼泊爾村莊的建築是一幅美麗和諧的圖畫，農民們在門窗的柱子刻了花紋，我絲毫未覺得他們的村莊比起在身後的現代城市有什麼不如。我在這個村莊，似乎回到從前，看到我們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¹⁷⁵。」

也許，這是作爲對於不被重視的邊緣尋找可能成爲出口的一種方式，不可否認，歷史一再上演，重複的事件加上新的變異，產生出一種龐大的混合體，反之，尋找解答時，走返孕育的自然本身，進而回溯既往的回應，從中拆解、發現，進而再次組合，透過單純的勇氣所蓄積的信念與力量找回有目的感、有自我價值感的生活，是爲對這頭怪獸最強而有力的反擊。如同安妮·法蘭克所帶來的卓絕勇氣與希望，在時間的沉澱中，遞送更多意義的呼喚，也換回更多信念的認同，爲

¹⁷⁴ 轉引自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市：麥田，2000），頁 345。

¹⁷⁵ 夏帕克(Georges Charpak)、宋笛蘭(Dominique Saudinos)著，邱大環、郭慧貞、李康文譯，《生命有如緊繃的絲弦》（臺北市：臺灣商務，1998），頁 208。

邊緣的角色添上新的色彩，爲此，我們也要從弱勢的一方、碎裂的鏡像中找出「他者」的目光，重建新的、更強烈的主體意識並活出「我們的島」、生生長流！



第五章 1945 尾聲

第一節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傷痕

一、 找回我的名字

因著大屠殺的劫難，藉由文字所建構的影像映入我們眼簾時，許多記憶正在重新拼貼匯集，是為一種震撼，於焉，當我們看見那留在人們身上的傷痕，總會多停留一會兒，然而，視覺之於聽覺，如同看見閃電與聽見雷聲，那看不見的傷痕是注視的目光下更為深層的吶喊，渴望被聽見，進而深深記憶，如同蔡麗在〈「文革」敘述中的暴力、情愛與歷史認知〉中所提及的：「記憶的疼痛顯然也參雜著自己的某種切身體驗，除了身體的，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精神的¹⁷⁶。」曾經，猶太人因為自己的身分而落入這場劫難中，「我是誰」的聲音其實一直擺盪在這之間，也許，是該透過找回自己的身分，修補這未竟完全的生命。

傷痕是記憶的過門，回溯猶太人的歷史時，若以其最初的民族組成而言，開始已然分化，從政治體的以色列與猶太王國，再因為經濟與政治的因素，使教派形成四大派別：撒都該派、法利賽派、艾沙尼派、奮銳派。隨著歷史的流轉，這古老的民族倚靠信仰所留存的文化原型在地域空間中進行既存的「臨難儀式」，走入大屠殺時代，面對上帝隱退所帶來的不安，人們在懷疑中尋找新的解答：

自從蓋世太保來卡爾曼諾夫孤兒院搜查吉普賽人和猶太人之後，我便開始經常懷疑上帝的安排；祂真的是要我來這裡拯救新教的孤兒嗎？……難道上帝會因為他們信奉了新教，就把他們當做異教徒逐出天堂嗎？或者把蓮娜阿姨逐出天堂嗎；只因為她是個猶太人？¹⁷⁷

¹⁷⁶ 引自蔡麗，〈「文革」敘述中的暴力、情愛與歷史認知〉。

¹⁷⁷ 《親愛的卡塔琳娜》，頁 274。

也許在這當中，我們仍能看到堅守信仰的殉道者，以成就其未來的命運，只是，看不見的未來所留存的也可能又是一種假象。於焉，人們的內心分化出另一種意識，畢竟，這種因著宗教意識浸潤的猶太血統，在當時的生活空間有擺脫不掉的死亡陰影，而居處的國家也不願意見到此一族群的存在，神同樣亦離開遠去，留下缺席的猜測，不禁讓人懷疑起自己的身分：「究竟我是誰？」

《鳥街上的孤島》裡，艾力克回憶起母親對他說過的：

我牢牢記著她說過的一件關於樹的比喻：「生為中國人、非洲人或印度人，都沒有什麼不同，但只要你生下來了，就不能不認你的根。如果你把樹連根拔掉，那你也活不成了。」她繼續說：「人類否認過去雖然不會死亡，但他們再也不是他們自己了。即使長大後，人生也是悲傷和扭曲的。他們的小孩也是一樣。¹⁷⁸」

這是對於生命所謂的歸屬與認同，藉此形塑出支撐生命的主體意識，「根」源的認定對每個人的意義均有不同，可以是名字、是家、是族群、是國家、是信仰，這之中，最為清晰也最為基礎的概念的即在於「名字」，失去了身分的界定，也失卻了許多記憶，於是，敵人在對付我們時，總是不忘記同時對付我們的名字，這是我們在《與狼共存》中讀到的：

我六歲的時候，別人偷走我的父母、親情，還有我的名字。

戰爭結束之後，人們才知道那些父母被德國人帶走的小孩，是如何被救援的。參與其中的有地下猶太組織的成員、共產黨員、天主教徒，甚至也有些貴族。這些人偽造比利時身分證給猶太人小孩。有時候他們

¹⁷⁸ 《鳥街上的孤島》，頁 39。

不去通報過世的比利時小孩，再把這些小孩的戶籍資料留給猶太人小孩。或是製造出全新的身分證。約有五千個小孩因此沒有被送入集中營。……沒人告訴過我關於我新身分的來源。我突然被喚做莫尼克，不再是七歲而是四歲¹⁷⁹。

許多特有的名字是可以作為判斷猶太人的方式之一，為此，當時許多猶太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小孩，於是讓孩子改去原有的名字，以躲避德國士兵的追查，然而，一個人的名字其實也是作為生命連結的始末，所以，一旦失去名字，就等於離散了許多記憶，彷彿變成另一個不是自己的人，而敵人們也很清楚，名字就是記憶¹⁸⁰，或者，我們也可以說改變名字，亦是一種解構的狀態，帶來的是散佚與失根的漂流，小自個人，大至社群族裔，都造成認同對象的消失，不同的名字其實更象徵孤獨與異化愈演愈烈。此外，流水號的編碼工作，是將個體物化，並且如同為輸送帶上的商品打印標記，所以，進入集中營時，手臂上的編號取代了原有的名字，是唯一的認定，成為另一個「活動式」印記，讓這批無名者為這段時光留下難以抹滅的烙印，進而轉存在記憶中，成為跟隨「未來」的黑影。

「每名犯人的左臂都要刺上一個號碼。艾笛絲、瑪格特、安妮的號碼，是在 A-25060 與 A-25271 之間。¹⁸¹」這個在集中營裡特有的刺青，或許是自集中營內存活的人一時之間無法從身上擺脫的印痕，而其象徵意義可以是奴隸之身，再不就如同待送屠宰的牲畜，因為，名字早已在人間蒸發。而從早先縫別在衣物上作為識別的黃色大衛之星，延續至一連串繡在衣服上的數字，及至此刻的刺青，非語言的訊息，讓這群無辜的俘虜感覺有罪的判決就寫在他的血肉上，同時這也是返回野蠻的印記，對正統的猶太教徒尤其困擾，因為，希伯來人古律法《摩西律法》(Mosaic Law)〈利未記〉(19:28)禁止刺青，正是為了用以區別猶太人與野蠻人。或

¹⁷⁹ 《與狼共存》，頁 33。

¹⁸⁰ 《兩種聲音的回憶：密特朗與維厄瑟爾的對話》，頁 65。

¹⁸¹ 《安妮的故事：納粹鐵蹄下的純真靈魂》，頁 280。

許能如張曉風作品〈一千兩百三十點〉裡的老兵，將當年「殺朱拔毛」、「反共抗惡」的印子以新式雷射法打上「一千兩百三十點」，然後換來一塊白肉，只是，這一無所有的白並無法對回憶的抹除，取代傷痛，因為，不單單是肉體或外在的表象除卻，尚有記憶留存的籽渣要處理，對此，自我意識的形塑有其必要性，透過主體意識的確認，也才有將被附加的社會意識摘除的可能。

於是，當我們見到米夏為自己做的：「所以，我給自己做了一張個人身分證。米施克，潔綠莎和荷凡之女，出生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二日。¹⁸²」是為對自己的身分認定，也渴望在那依然存留的生命遺痕裡，見到新生的力量。因著名字衍生了連結生命的記憶，同時，尚有另一種意義，「記憶是一種保存身分認同感的有力集體工具。它不只可以透過官方論述和書本來保存，也可以透過非正式的記憶來保存。那是抵抗歷史被擦拭的一座要塞，是抵抗的一種方法。¹⁸³」從某個角度看，正是死亡本身使生命變得有意義，為此，更應徹底展現死者賦予「記憶」的意義，而最重要的是，生命的短暫並不會使生命變得無意義，因為過去的不代表就是消失了。如同〈忘川〉的歌詞：「喝一口忘川的水，就能忘記所有的事；喝一口記川的水，就能記起所有的事。喝一口忘川的水，再喝一口記川的水，就能忘記一切也能記起一切。¹⁸⁴」所有我們的所作所為、所經歷的——所有這些，都存入了「過去」之中，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事物能使它們消失。同時，這也可以說，「記憶」成了修補傷痕的良藥。

二、修補傷痕

曾經，人們過度放大對自我權力的想像，忽略了其他主體，同時覬越其所掌握的，反客為主地進行自我認定的安排，恰如納粹政權或其他群體所行之事，因

¹⁸² 《與狼共存》，頁 226。

¹⁸³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梁永安譯，《文化與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W. Said) (新店市：立緒，2004)，頁 183。

¹⁸⁴ 〈忘川〉為靳鐵章作品，1980 出版，歌詞靈感來自王鼎鈞所著《靈感》。

而有了衝突與分化，從個體對個體、社群對社群、族裔對族裔、國家政體對國家政體等，無時無刻不上演著橫向的抗衡。在此同時，也衍生出神對人、意識形態對人、價值判準對人等，因著縱向的時間體而積累出龐大的混雜物，形成一股不易掙脫的隱形的鉗制，所以，當此番隱形的力量交錯在方才的橫向體時，產生的變異往往超乎想像，看見的會是人殘酷的一面，即是渴望將權力無限擴張，以抑制無法掌握的焦慮，然而，見到更多的是人脆弱的一面，因為在抵抗與屈服中，留下許多待修補的傷痕。

恰如《安妮的日記》中所提到的：

你無法想像，我們時常陷入絕望，因而產生懷疑：「戰爭究竟有什麼作用？為什麼要破壞人類的和平，破壞平靜的生活？究竟是為了什麼？」

雖然我們很了解這個答案，但是，它無法滿足我們。是的，人類為了使生活更舒服而發明了許多東西，但是為什麼要為飛機或大砲、坦克車費那麼大的心血呢？每天為了戰爭，不知要花費多少金錢，卻不肯用點錢做醫療設施，或是捐給藝術家和窮人¹⁸⁵。

因著戰爭，留下的殘破，要花上兩倍甚至更多的時間與力氣重建，不單是發動戰事的一方，無論是勝者或敗者均要在這之中修補傷痕。曾經，那些被視為該被踐踏的生命，化作一車車自火化場送出的骨灰時，甚至用來填塞沼澤地、當作磷肥、或代替碎石鋪在黑衫軍聚集的小鎮道路上，這種純粹而無用的殘酷或許是第三帝國獨一無二的附屬品，而這些受害者在死前被貶低的過程，無疑是讓壓迫者不用背負如此大的罪惡感，這或許是如同普利摩·李維所說的：「無用的暴力唯一的用處¹⁸⁶！」戰後，原屬於猶太人聚居的柏林巴伐利亞廣場一帶，商店招牌、牆上的

¹⁸⁵ 《安妮的日記》，頁 31。

¹⁸⁶ 《滅頂與生還》，頁 142-3。

磚與人行道上的路燈藉由還原當時的景貌留下警醒世人的企圖，例如在商店招牌上，我們讀到這樣的文字：「猶太藝術與古董買賣商，他們的專業能力不合格，必須在四星期以內全部將商店解散——1935 年」、「領導階級的猶太員工可以在沒有理由與償金的情況下被解僱——1938 年 11 月 12 日」¹⁸⁷，是為藉由可看見的傷痕修補那看不見的記憶傷痕。

尚須修補的記憶傷痕，實是意識形態的留存，其不易抹滅，也許，我們要說被殖民者（受害者）的存在是為了證明殖民者（迫害者）的優越，然而，那被漂染的意識形態與現實情境總讓人們陷入無所適從的情結中，正如托馬斯·曼所言：「人類是混合的生物」，亦可如此解讀「人越是處於壓力之下，越可能變得雜亂不清，到我們難以評斷的地步，就像羅盤在磁極會發狂亂轉一樣。」如同法農在二次大戰的反納粹經驗中，代表法國的他贏得戰爭勳章，但大過於這榮耀的其實是種族主義所留下的黑白關係，讓他見到白人世界的偽善，為了修補世人對與此關係的裂痕，而《黑色維納斯》裡提到南非的「種族隔離博物館」¹⁸⁸似乎提供一種可能的方式：在入口處發給入館者「種族分類」的身分證，明明是白人，卻行走走在「黑人專用」的通道，讓人們在歷史的倒錯下，重新體察「被隔離」、「被標籤」的意識清洗，末了，被分隔的人流才重新聚合，只是，「體驗」是短暫的，如何真切的翻轉觀點，或許窮盡一生也不容易達成，反覆的沉澱與透察己身自有其存在必要性。

當然，實踐「徹底的分離」——忘記，無疑的也是一種方式，但人們渴求的也僅僅只是一種公平的對待，為了重塑對話的平台與相容的空間，或許我們可以藉由英國外交官尼科爾森在 1939 年的日記中的這段文字先行反思：「這是本性。有人去世了，而白楊樹依然挺立在那兒，並不關心人類世界所發生的不幸；當我

¹⁸⁷ 沈社杏著，《穿牆故事：再造柏林城市》（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2004），頁 260。

¹⁸⁸ 莊新泉著，《黑色維納斯》（臺北市：文經社，2002），頁 140。

在湖裡洗澡時，我幾乎不敢想像天鵝會對二次世界大戰產生興趣。¹⁸⁹」曾經，人們爲了逃避自然的威脅，於焉改造其，創造出比自然更加穩定的人造世界，浸漬在想像中，爲此扭曲真實的面貌，禁錮在限制的渴望，進而構築了實是「虛無」的烏托邦，或許，我們應當重新走向自然中，立足在更爲廣闊的空間，向群山萬壑或無際海涯叩門，在此同時，也才能有更爲廣闊的胸襟去接納差異的聲音，恰如米夏在《與狼共存》裡提到：

所以，我強迫自己去看四周美麗的景物，來逃避這段恐怖的記憶。

我想我因此這一輩子都活在憂鬱沮喪之中，一直想辦法，要克服它。

在迷霧中，走了好幾年之後，我甚至不再想自己是不是還走在俄國。

我只看樹，而樹就跟我一樣，一點也不在乎國界¹⁹⁰。

在大自然裡，我們不難發現因著人際往來當中會感受到的排斥、冷落、批評和傷害，都能遠遠的被拋棄在外，也許，這樣的退隱，恰如《逃避主義》一書中所說的，是屬於「倒退式的」(regressive)¹⁹¹，但文化價值卻也在這邊界協商後重新形塑「中介空間」(in-between space)與灰色地帶，進一步發現真實的對立面是更爲真實的，於此，將許多如同親人、信仰等「缺席」的支柱摒除，將曾經遭逢的記憶拋卻，進而追尋可茲成長的動力，修補存乎於生命中破碎的傷痕或身分認同的情結。

王德威在《台灣：從文學看歷史》的序中指出：「藉著文學看歷史，我強調兩者之間的主從辯證關係。歷史既非不證自明的存在，也未嘗試洞見一切的主體。無論作為組裝記憶的工程，還是原鄉原道的依歸，歷史的建構不脫虛構。但虛構不僅只是無中生有；虛構總以生命或生活經驗為前提。¹⁹²」生命的本身，早已是

¹⁸⁹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Escapism) (新店市：立緒文化，2006)，頁 127。

¹⁹⁰ 《與狼共存》，頁 153。

¹⁹¹ 《孤獨世紀末》，頁 173。

¹⁹² 轉引自王德威序〈台灣：從文學看歷史〉。王德威編選、導讀，《台灣：從文學看歷史》(臺北

一連串繁複人事物的交融，對某些人而言，人生其實很簡單，只是因為有太多簡單早已在不自覺中形成一種相對的複雜，茫然與不安既之而起。狀似多元的後現代可以說有著太多的紛亂，在我們居處的時空中，不難發現我們亦是離散的一群，這一切可能再發生的歷史，不全然得透過戰爭的形式，其實，小自社群間的意識形態皆能讓人們產生疏離的傷痕，不禁讓人懷疑起蜉蝣般的生命，究竟又該何去何從？修補傷痕的背後，有著認同與歸屬的意涵，縱然，我們深知潛意識中這歸返的目的地是根源之所在，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因著文化的變遷，根源的界定愈發困難，身分的流動性亦漸快速，認同的焦點也面臨到轉移的情況，根源目的的模糊，帶來的是猶疑，唯有試圖將目光轉向追尋認同的「歷程」，才能對於生命或所存在的這個世界能有更跨越一步的認識。畢竟，「形成」認同的過程遠比單一的服膺或投射「存有」的認同更能帶給人們確定感，不至停留在「失根」的無依感中，在這段「不堪跋涉的泥濘」路程，勢必得憑藉更多的勇氣面對真實世界的挑戰，於此，我們抽絲剝繭去觀看，無疑是透過趨附於他者的另一雙眼睛窺探，開展不同的生命視角。

第二節 結論

許多瘋狂都有神聖的感受
對一隻明亮的雙眼而言
許多感受，都是最徹底的瘋狂
這是大多數人
在此，正如所有都將勝利
承認你是正常的
你也是最危險的
被鐵鍊綑綁¹⁹³

艾蜜莉·狄更遜〈許多瘋狂都有神聖的感受〉

曾經，那旋風般的意識席捲人心，進而帶來瘋狂的崇尚，因之，留下許多獨特的歷史元素，當我們試圖逃離這樣的現實時，其實又再次走入另一種現實，戰後這些作品的出版，無疑的，在追溯紀實與重建鋪陳的文字王國裡，我們見到「再造現場」的反動，只是如同那破敗的家園，有其重建的不易，正當其如同馬賽克一般進行拼貼時，其實仍留有片段模糊或無法辨識之處，然而這樣的企圖，是爲了讓人重返當時的情境，重新反思。在那碎裂的結合面上，是爲療癒的記憶，對此，若將之解讀爲一種歷史的創傷，這樣的苦難是在一種痛感與快感的相互拉扯中所產生，我們相信歷史的能量實是具備相當的彈性，反覆再三的讓人類潛在慾望與個體意識能量進行一場角力賽，只是，當個體本身不斷量化成更大的社群，繼之民族、國族等，這種存乎原始叛亂中的遊戲模式將融入更多的實驗成分，以

¹⁹³ 摘錄艾蜜莉·狄更遜原作。潔米·富勒著，吳玲譯，《孤獨是迷人的：艾蜜莉·狄更遜的秘密日記》（臺北市：智達國際，1999），頁 101。

滿足工業革命後的「速食」時代。

霍布思(Thomas Hobbes)曾描述人類「對權力具有永無止境的欲望，至死方休。

¹⁹⁴」同樣的，當我們看到漢娜·鄂蘭對於權力的概念：

權力，不僅相當於人類行動的能力，而且還是一致行動的能力。權力向來不是個人的財產，它是屬於團體的，只要該團體一直維繫在一起，權力就繼續存在。當我們稱某人「擁有權力」，我們是指他被一群特定的人們賦予了權力，並以那群人之名行動。當那群產生權力的團體消失了(沒有人民或團體，)就沒有權力，「他的權力」也隨即消散。¹⁹⁵

對於歷史再思考時，我們見到人們爲了保有各自的權力場域，策動了許多「主義」的產生，例如：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等，然而，因著這些主義，原是人類歷史的一種歸納法則，卻也轉型爲新型態的遊戲規則，在它們面前，不難感受到人權是屬於少數人的，人類自己的命運和尊嚴要靠什麼來保證？同時，這些壓迫的結構面向無遠弗屆，「藉由控制一方的想法與欲望來換取順從」，無疑是爲終極權力的表現，只是，當過往的一切如同泛黃的紙頁褪去色彩、走入過往回憶、甚至權力者遠離當時所營造的發聲舞台，重新翻轉先前的主客位置，重塑一種新的國家關係，將個人的自由權擴大到族群自主與發展等層面時，我們似乎在一個接一個的法案中見到跨越的凝聚，但是如同《黑色維納斯》中所說的：「我們真的邁出了這一步，真的不會再退回去了嗎？」¹⁹⁶

一如希特勒對猶太的迫害，似乎可說這是他潛在慾望的一種實現，然而在形成創傷的過程中，不只猶太人遭受傷害，德國人自身亦在經歷一種煎熬，面對是

¹⁹⁴ 史蒂芬·路克斯(Steven Lukes)編著，林華芸譯，《權力：基進觀點》(臺北市：商周，2006)，頁 102。

¹⁹⁵ 同上註，頁 62。

¹⁹⁶ 《黑色維納斯》，頁 170。

非曲直、信仰的置換，蔓生的傷痕糾結出屬於當時的「特定時空」，對看待這段歷史的我們而言，此刻，像是某種生命能量的交換，我與彼端不存在任何傷害，但是，一段看與被看的凝視下，藉由被看的他端，反視現存時空，在自我生命中蓄積能量，這或許是安妮在撰寫日記時所意想不到的，也許，她曾經渴望成為一個作家，只是場域的不同，讓她所留下的生命記憶除了成為日後其他作品的再生，也為當時的歷史留下見證。《狗兒沉睡時分》裡提到：「我承認，我在這間暗室裡哀號，而我也自問，我的爺爺和外公在年輕時到底做了些什麼事。雖然我自己什麼也沒做，但我還是覺得自己有罪。如果我什麼都沒做，為何我要有罪惡感呢？」¹⁹⁷」時間之流向前行進時，對於「記憶」，有著遺忘的刪除或化成印記的可能，在真實的本體上，也另有曲解的成分，甚至營造出一種新的況味，不禁要問，究竟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但或許我們早已被灌輸某種既有的意識，面對意識而形成的防衛機制，將帶領人們接受並不再提起任何可能造成質變的景況，然而，如同約翰娜檢視歷史過往時所產生的自我愧疚，無疑是一種反芻現象的衍生，其所反芻的可以是個人主體意識的形塑，或者演變成另一種新的反動力量。面對這種「錯不在我們這一代」的情感，跨越時空，回到我們身處的家國中，所謂的漢人與原住民當中所糾葛的情結，亦或省籍的區隔，煞是如此，政治體的意識操弄讓對等互動的平台縮減扭曲，也許得如同剝洋蔥般，在相對複雜的包袱中，在灰色地帶的游移裡，抽拔出道的本質，換來一種新的澄澈。

而「造神」運動想像的破滅，不單是德國人本身對「納粹」、「希特勒」的神格化幻滅，被背棄的「猶太」子民，對上帝的隱退還能有多少堅持，從戰後的分化狀態來看，其實留下更多離散因子，為此，言論建立的過程是說服或是認同，就某種角度而言，不難覺察如同意識形態擴張的壓迫感再度襲來，當他種形式的迫害產生，我們見到人對救贖的渴盼，是可以犧牲另一方，不禁讓人懷疑信仰的本質欲走向何種境地？是爭論也是存疑，或許，在爭辯不休的末了，「灰色地帶」

¹⁹⁷ 《狗兒沉睡時分》，頁 81。

以狀似逃避卻又積極的模稜態度出現，似乎成為最好的詮釋。

當然，許多論調不能獨一，只是這波「全球化」的新浪潮已經深深入侵，因著經濟、科技、政治體制等，人們盲從於「世界脈動」中，「同步」為意識形態造神，至今讓人記憶猶新的「911」事件，其實讓許多人從渾渾噩噩中驚醒，進而重新檢視所持有的觀點，比方對於「接收來源」的質疑等，然而，為何每一回都需要以如此恐怖的方式讓人們記憶？

邊緣，向來有自成主體意識的獨特性，在非主流的位置上，我們才能找回最原始的脈動，重新見到生命的本質。鄭明河：「故事、歷史及文學是一體的，同為原始民族的工具，是最單純的傳遞真理的工具。¹⁹⁸」面對戰後這些作品的出版，書寫者有其期待與企圖，即是對於那應答者，希冀能在此過程中將思維置入較為客觀的天平上觀看之，尤其當個人記憶與集體糾結的記憶互動時，即便我們是撞上一個屬於別人的記憶，那在浩劫下所延伸的力量有些是永遠忘不了的，因為：「我以前待過的地方是真實的。它永遠不會消失。」此外，邊緣的多重化，其實讓少數族裔中的女性文化被消音(silenced)／禁聲(muted)／壓抑(repressed)¹⁹⁹。對應於主流文化所擁有的工具，身居邊緣形象的個體或群體極容易再次落入緘默狀態，也許那曾屬於母親的口傳力量是可以藉由文字的紀錄留下軌跡，如同中國原始部落的「女書村」，是全球文化邊緣的一環，但卻因著創造了「陰性文字」吸引了人們的目光，進一步再行書寫之權，於是，我們見到透過書寫所產生的力道為既存的現實發聲，同時成為言論的抗衡。

「沒有，我沒有逃。我開始寫作，自由地說出剩下來該說的事，只祈願能完完全全地走出來。我是一點也不願意忘記的。我的記憶正是為了這些而記憶。只要我每天仍一直想著我的父母，他們就永遠不會老，也不會死去。

¹⁹⁸ 《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119。

¹⁹⁹ 同上註，頁 269。

這是《與狼共存》的米夏爲了過往所經歷的一切而做的，當然更是爲了自己，因著邊緣，也才意識到「抵抗」的意義，將自己的、邊緣的、種族的歷史透過她們在心理、性別、種族及精神上的跨界(邊界)書寫，個人經驗與集體經驗的交融轉換，即是藉由空間的挪用，做爲發聲的平台，也恰如安妮書寫日記，形成一種基進的文化後，進一步擴大了當時在隱密之家所居處的空間，成爲戰後大屠殺作品的代表，不只讓人們在傷痛中尋找希望，也窺見其有別於當時的時空，爲了逃離迫害與求取生存可能，在實體空間中所行進的舊有路徑，於此，「新」逃離動線正逐漸構築在書寫反制和掌握自我主體意識的發聲平台上。

法國作家海倫·西蘇於七〇年代提出「爲何妳不書寫？寫吧！書寫是爲了你自已；妳的身體是妳自己的。」書寫的過程成就了一個人的主體，無疑的，人的主體意識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形塑出何種言論，亦關乎其個體在身處的時空環境下所被迫接受的集體意識，況且，自我服膺於該集體意識的成分多寡或所認同的觀點，仍舊會對其主體意識有一定的影響。於是，雙重邊緣的發聲方式，是提供相近狀況的我們或她者(他者)一種更爲寬廣的視角，畢竟，人的自主性，不應該被忽略，好比伊索比亞諺語：「當偉大的領主經過，聰明的農人深深地鞠躬並靜靜地放屁。」的確，這是被壓迫者所製造出陽奉陰違的表象，但我們看見的是：主體意識實際上並未放棄抵抗，哪怕能掌握的微乎其微，卻也試圖在黑暗的泥淖中記起曾是光明的一切。

生命探尋的初衷，沒有絕對的一致性，因爲，在開始的那一刻，人與人之間有著或多或少的交集，再不，亦有聯集的可能性與方式。每一個屬於你自己的故事，也是別人的故事之一，在行進與形成回憶的過程，如同「失物招領處」般，等待下一個旅程。

²⁰⁰ 《與狼共存》，頁 238。

參考書目

一、 研究文本：

1. Defonseca, Misha (米夏·狄芳絲卡)著。孫智綺譯。《與狼共存》(*Survivre avec les loups*)。新店市：木馬文化。2006。
2. Frank, Anna(安妮·法蘭克)著。張淑懿譯。《安妮的日記》(*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台北市：志文。1998。
3. Winter, Kathryn (凱瑟琳·溫特)著。鄭文琦譯。《親愛的卡塔琳娜》(*Katarina : A Novel*)。台北市：維京國際。2000。
4. Lowry, Lois (路易絲·羅麗)著。汴橋譯。《數星星》(*Number The Stars*)。台北市：國語日報。1991。
5. Pressler, Mirjam (米爾雅·培斯樂)著。陳慧芬譯。《瑪卡·麥》(*Malka Mai*)。台北市：玉山社。2004。
6. ____。林倩葦譯。《狗兒沉睡時分》(*Die Zeit der Schlafenden Hunde*)。台北市：東方。2005。
7. Reiss, Johanna (尤漢娜·雷斯)著。莫莉譯。《樓上的房間》(*The Upstairs Room*)。台北市：智茂。1995。

二、 對照文本：

1. Chambers, Aidan (艾登·錢伯斯)著。陳佳琳譯。《來自無人地帶的明信片》(*Postcards from No Man's Land*)。台北市：小知堂。2001。

2. Holm, Anne (安娜·洪)著。穆卓芸譯。《我是大衛》(*David*)。台北市：宇宙光。2005。
3. Kertesz, Imre (因惹·卡爾特斯)著。周從郁譯。《非關命運》(*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台北市：天下遠見。2003。
4. Orlev, Uri (烏里·奧勒夫)著。李紫蓉譯。《快跑!男孩》(*Run, Boy, Run*)。台北市：東方。2005。
5. ____。區國強譯。《鳥街上的孤島》(*The Island on Bird Street*)。台北市：臺灣東方。2006。
6. Schmitt, Eric-Emmanuel (艾力克-埃馬紐埃爾·史密特)著。林雅芬譯。《被收藏的孩子》(*L'enfant de noe*)。台北市：方智。2006。

三、中文譯書

1. Anderson, Benedict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臺北市：時報文化。1999。
2. Arendt, Hannah (漢娜·鄂蘭)著。鄧伯宸譯。《黑暗時代群像》。新店市：立緒。2006。
3. Boorstin, Daniel J. (丹尼爾·布爾斯丁)著。梅寅生譯。《隱藏的歷史》。臺北市：麥田。2000。
4. Clough, Patricia Ticineto 著。夏傳位譯。《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Feminist Thought : Desire, Power, and Academic Discourse*)。臺北市：巨流。1997。
5. Cohn-Sherbok, Dan (丹·康-沙塞保)著。傅湘雯譯。《猶太教的世界》。臺北

- 市：貓頭鷹。1999。
6. Ellis, Marc H. (馬克·艾里斯)著。梁永安譯。《一個猶太人的反省》(*Israel and Palestine out of Ashes: the Search for Jewish Ident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新店市：立緒文化。2005。
 7. Fanon, Frantz (弗朗茲·法農)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5。
 8. Fischer, Klaus P. (克勞斯·費舍爾)著。蕭韶工作室譯。《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Nazi Germany: A New History*)。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9. Frankel, Viktor E. (弗蘭克)著。趙可式、沈錦惠譯。《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臺北市：光啟。1995。
 10. Fuller, Jamie (潔米·富勒)著。吳玲譯。《孤獨是迷人的：艾蜜莉·狄更遜的秘密日記》。臺北市：智達國際。1999。
 11. Gay, Peter (彼得·蓋伊)著。劉森堯譯。《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Savage reprisals: Bleak House, Madame Bovary, Buddenbrooks*)。新店市：立緒文化。2004。
 12. Gellner, Ernest 著。李金梅譯。《國族主義》。臺北市：聯經。2001。
 13. Georges, Charpak (夏帕克)、Saudinos, Dominique (宋笛蘭)著。邱大環、郭慧貞、李康文譯。《生命有如緊繃的絲弦》。臺北市：臺灣商務。1998。
 14. Grass, Gunter (鈞特·葛拉斯)著。張筱雲譯。《消逝的德國人》。臺北市：時報。2003。
 15. Haffner, Sebastian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著。周全譯。《破解希特勒》(*Anmerkungen zu Hitler*)。新店市：左岸文化。2005。
 16. Haffner, Sebastian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1914-1933 回憶錄》(*Geschichte eins: die Erinnerungen 1914-1933*)。新店市：左

- 岸文化。2005。
17. Hood, Stuart 著。Litza Jansz 繪。陳家倫譯。《法西斯主義》(*Fascism for Beginners*)。新店市：立緒文化。1996。
 18. Isaacs, Harold R. 著。鄧伯宸譯。《族群：集體認同與政治變遷》。新店市：立緒。2004。
 19. Jenkins, Keith (凱斯·詹克斯) 著。賈士衡譯。《歷史的再思考》。臺北市：麥田。2006。
 20. Koch, Philip 著。梁永安譯。《孤獨》。新店市：立緒。1997。
 21. Kristeva, Julia (克莉斯蒂娃) 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Pouvoirs de l'horreur*)。新店市：桂冠。2003。
 22. Lenz, Siegfried (齊格飛·藍茨) 著。鄭納無譯。《失物招領處》。台北：遠流。2005。
 23. Levi, Primo (普利摩·李維) 著。李淑珺譯。《滅頂與生還》(*I sommersi e salvati*)。臺北市：時報文化。
 24. Lukes, Steven (史蒂芬·路克斯) 編著。林華芸譯。《權力：基進觀點》。臺北市：商周。2006。
 25. Martal, Yann (楊·馬泰爾) 著。趙丕慧譯。《少年Pi的奇幻漂流》。臺北市：皇冠。2004。
 26. May, Rollo 著。龔卓軍、石世明譯。《自由與命運》。新店市：立緒。2001。
 27. McDowell, Linda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臺北市：群學。2006。
 28. Miles, Rosalind (羅莎琳·邁爾斯) 著。刁筱華譯。《女人的世界史》(*The Women's History of the World*)。臺北市：麥田。1999。
 29. Mitterrand, Francois (弗朗索瓦·密特朗)、Wiesel, Elie (埃利·維厄瑟爾) 著。

- 胡洪慶譯。《兩種聲音的回憶：密特朗與維厄瑟爾的對話》。臺北市：麥田。2000。
30. Muller, Melissa 著。張茂芸譯。《安妮的故事：納粹鐵蹄下的純真靈魂》(*Anne Frank: the Biography*)。台北市：遠流。2000。
31. Neusner, Jacob (雅各·紐斯納)著。周偉馳譯。《我們的宗教：猶太教》。臺北市：麥田。2002。
32. Ruasvsky, David (大衛·魯達夫斯基)著。傅有德、李傳、劉平譯。《近現代猶太宗教運動：解放與調整的歷史》(*Modern Jewish Religious Movement*)。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
33. Said, Edward W. (愛德華·薩依德)著。梁永安譯。《文化與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 :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W. Said*)。新店市：立緒。2004。
34. Seiffert, Rachel (瑞秋·賽佛)著。王娟娟譯。《暗房》(*The dark*)。新店市：木馬文化。2003。
35. Sontag, Susan (蘇珊·桑塔格)著。黃燦然等譯。《蘇珊·桑塔格文選》(*Selected writings*)。臺北市：麥田。2005。
36. Stern, Carola (卡蘿拉·史坦)、Brodersen, Ingke (英格·柏德森)編著。李雪媛、呂以榮譯。《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Eine Erdbeere fur Hitler*)。臺北市：商周。2006。
37. Wieland-Burston, Joanne 著。宋偉航譯。《孤獨世紀末》。新店市：立緒。1999。
38. Wiesel, Elie (埃利·維瑟爾)著。謝道峨譯。《夜》。台北市：時報。1983。
39. Wolf, Eric R. (艾立克·沃爾夫)著。賈士衡譯。《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臺北市：麥田。2003。
40. Woolf, Virginia (維金尼雅·吳爾芙)著。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臺北市：天培文化。2000。
41. Tuan, Yi-Fu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Escaptism*)。新

- 店市：立緒文化。2006。
42. Sardar, Ziauddin 著。VanLoon, Borin 繪。陳貽寶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for beginners*)。新店市：立緒。1998。
43. 泰爾朋著。陳璋津譯。《政權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的政權》。臺北市：遠流。1990。

四、中文專書

1. 王安憶著。《紀實與虛構：上海的故事》。臺北市：麥田。2002。
2. 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臺北市：麥田。2005。
3. 王德威著。《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市：麥田。2004。
4. 王德威編選、導讀。《臺灣：從文學看歷史》。臺北市：麥田。2005。
5. 安修·Lee 著。《宗教的故事》。臺中市：好讀。2005。
6. 余華著。《許三觀賣血記》。臺北市：麥田。2002。
7. 沈祉杏著。《穿牆故事：再造柏林城市》。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2004。
8. 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市：麥田。2000。
9. 施叔青著。《微醺彩妝》。臺北市：麥田。1999。
10. 張小虹編。《性/別研究讀本》。臺北市：麥田。1998。
11. _____。《性別越界：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臺北市：聯經。1995。
12. 張錦華著。《媒介文化、意識形態與女性：理論與實例》。臺北市：正中。1994。
13. 畢恆達著。《空間就是權力》。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1。
14. 莊新泉著。《黑色維納斯》。臺北市：文經社。2002。

15. 郭洪紀著。《新國家主義》。臺北市：揚智文化。1996。
16. _____。《文化民族主義》。臺北市：揚智文化。1997。
17. 郭湛著。《主體性哲學：人的存在及其意義》。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18. 彭滂沱著。《天擇：猶太人的故事》。台北市：商務。2001。
19. 齊邦媛、王德威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 臺北市：麥田。2004。
20. 劉紀蕙編。《他者之域：文化身分與再現策略》。臺北市：麥田。2001。
21. 劉新利著。《基督教與德意志民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22. 簡瑛瑛編。《女性心／靈之旅：女族傷痕與邊界書寫》。臺北市：女書文化。2003。
23. 蘇偉貞著。《封閉的島嶼：得獎小說選》。臺北市：麥田。2002。

五、期刊論文

1. 吳錫德編。《世界文學／跨文化與比較文學》。台北市：麥田。2003。